

分裂的自我

——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

[英] R·D·莱恩 著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分裂的自我

——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

〔英〕R. D. 莱恩 著

林和生 侯东民 译
陈维正 校

编者的话

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意在寻求到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先存的根，由此而重识、重铸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对人的宏观研究，即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侧面，如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的研究；一是对人的微观研究，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

为了帮助国内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了解现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潮，以便纵观全局，我们选编翻译了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进行微观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为丛书出版。这些著作从各个领域的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并预测这种精神状态在未来的演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人的主体性研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交汇点，由此形成了哲学人类学、深层心理学、社会生物学、人类行为学等竞相争艳的纷繁格局；另一方面，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较客观地揭示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

深刻的精神危机。当然，由于作者固有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些著作中存在着一些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就需要在阅读时加以分析、鉴别，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这些著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益的成分，为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编委会

1987年5月

健全与疯狂的界线

——代中译序

—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也许能改为：所有幸运的人都是相同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各不相同的不幸，自然不易得到理解和同情。也许正因为如此，不幸者才显得不幸，或者说，不幸者之所以不幸并不在于不幸本身，而在于这不幸没有幸运地得到理解和同情。

生存论哲学（即存在主义）兴起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的可能。与人类传统的认识相反，生存论哲学认为世界并无本质，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虚无、荒诞或永恒的神秘。对于主要以自我意识和理性为特征的人类来说，生存本身就是普遍的、绝对的不幸，生活就是不幸。以这种认识为背景，生活中不同个体各不相同的不幸，就不那么绝对了，而是相对的、可理解或同情的不幸。也许正因为如此，生存论哲学将“理解万岁”写上自己的旗帜，诚如萨特所言：生存论是一种人道主义。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实质上是一位生存论哲学家。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恶”不仅存在于人们内部，也存在于人们外部，精神分析治愈患者的不幸，不过是将其引入生活的普遍的不幸。弗洛伊德在其后期工作中相当成熟地运用这一思想，潜在地完成了生存论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综合。据《反抗死亡》作者 E·贝克尔的意见，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生存论大师克尔凯郭尔通过不同的途径也达到了同样的结果。

沿这一方向的努力，一般称为生存论心理学。克氏和弗氏分别从生存论和心理学出发，沿这一方向完成了天才的建树。不过，他们并未自觉于此。首先自觉地、有意识地将生存论哲学与心理分析相结合并完成系统工作的，正是本书作者 R·D·莱恩 (R·D·Laing)。他也是当代两大重要的生存论心理学家之一（另一位是《爱与意志》一书的作者罗洛·梅）。

二

莱恩 1927 年生于英国格拉斯哥一个相对贫困的工人家庭。据他自己说，当时家中时常笼罩着不幸的气氛，他也非常孤独（莱恩：《生活的真谛》）。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愿意理解或许也较容易理解不幸的人们。

1951 年，莱恩于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医学和精神病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随之应征入伍任军队精神病科医师；1953 年退役后在格拉斯哥精神病院等处任职，1956—1960 年在著名的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任职，1960 年后在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莱恩一直对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深为关注，在工作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观察、病案记录，以此为基础写成并出版处女作《分裂的自我》（1960 年），后又陆续写成出版《自我与他人》（1961）、《理性与暴力》（1964，与人合写）、《健全、疯狂与家庭》（1964，与人合写）、《人际知觉》（1966，与人合写）、《经验的政治·天国之鸟》（1968）、《家庭的政治》（1971）、《生活的真谛》（1976）、《经验的声音》（1982）等书，以及大量文章。

三

《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是莱恩的代表作，

也是生存论心理学的经典作品。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前三章）对精神病问题作了宏观的生存论-现象学讨论。第一、二章相当于全书导论，作者指出对待精神病人的两种态度：传统的临床精神病学将患者从生活中孤立出来，看作单个的人、生物或精神机器；相反，生存论心理学相信患者始终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与他人既相联系又相独立（分离）。后者尊重患者“存在于世”的方式，努力与患者“一道存在”，透过包括早期乃至童年经历的生存状况，去理解患者疯狂言行（它们并非无缘无故，并非真正疯狂）中隐含的现实内容及其意义。莱恩认为前者无法解决问题，后者是希望所在。作为总结，他给出如下定义：健全或疯狂由两人之间联系或分裂的程度所决定；这两人之中，有一人被公共意见认为是健全的——换句话说，把一位患者判断为精神病，主要是因为判断和被判断双方之间缺乏理解，存在分裂。

悲剧性的分裂划开了“正常的”幸者和“反常的”不幸者。在第三章中，莱恩深入探讨不幸的生存论原因：存在性不安。存在性不安从幼儿期即开始形成，它使个体无法跟正常人一样发展出正常的自我意识，正视自己及他人的现实性、生动性、意志自由和身分，正视生与死，与他人保持正常的联系与独立，从而获得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相反，个体感到正常世界的生活威胁着他的生存，使他面临被吞没、被爆聚、被僵化的危险。他无法与他人共有一个经验的世界，只好规避到自身之内，但这并不能否定现实世界的存在，外部世界对他的影响并不会消失或减小，反而更加被扭曲、放大，使他更深地局限在自身狭隘的经验世界之中。

在生存论-现象学的一般背景上，第二部分（第四—八章）进入深层心理分析，探讨“精神分裂性”个体（具有患精神分裂症倾向的个体，亦即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个体）的心-身（自我-身体）关系。作者在第四章指出，陷于存在性不安的个体，其真实自我无法适应充满风险的现实世界，逐渐与其身体相分离，萎缩为非身体化的“内自

我”，失去了与身体的正常统一。身体不再体现真实的自我，它变成假自我系统的载体，缺乏生命力，只能在自身与他人之间进行虚假的人格扮演，获取非真实的知觉。结果，“真自我”被封闭在假自我之内，对外无法通过真实的人际关系丰富自己，而越来越贫乏乃至近乎一团虚空；对内则越来越厌恶和绝望于假自我系统的虚假行为。唯一的慰藉是幻想，但幻想只能使情况恶化。精神分裂性个性从维护自己的自我出发，最终却走向自我的崩溃。

接下来，第五、六章分别讨论内、外（假）自我及其相互关系。第七章讨论自我意识：存在性不安使得个体怀疑自己的存在，于是自我意识被异化为一种强迫性的手段，用以维系虚假的身分感，同时也把自己与他人分离开来。第八章以具体案例为第二部分作出总结。

精神分裂性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进入精神分裂症状态。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后一种状态。第九章特别讨论前者向后者过渡的不同形式和临界点，它实际上是前述讨论的精细化。第十章通过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对全书主要内容加以回顾和总结。作者专门用第十一章讨论一位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他试图表明，即便对于慢性精神分裂症这种绝望的情形，希望的火花也并没有熄灭。

四

在生存论心理学的框架之外，如果再加上个体心理学的眼界，也许能进一步理解本书。个体心理学为著名心理学家 A·阿德勒于本世纪 20 年代创立。阿德勒认为，人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影响其全部心理过程。由于所有重要的生活问题都是社会性的，因而须把个体置于其社会背景中加以考虑。个体独特的人格结构，包括其独特的目标和相应的奋斗方式，组成该个体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在幼儿期形成，一般不为个体自身所觉察；形成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是排行、体质、忽视或溺爱的程度等等（阿德勒：《理解人性》等）。

《分裂的自我》中也有类似的思想。我们不知道莱恩是否受阿德勒影响，但眼下这种相似性却能帮助我们理解莱恩在本书中对弗洛伊德的批评（见原书码，即边码第 19、25、57 页以下等处）。他大概与阿德勒一样认为，弗洛伊德（早期）在具体的分析工作中忽视甚至割裂了患者与其整体的生存环境的关系，从而向泛性论倾斜。

五

与莱恩的后期著作相比，《分裂的自我》有三点重要的特征。了解它们，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本书，进而理解莱恩的整体思想。

首先，对于所引用的神秘主义作家（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蒂利希、布莱克等），莱恩十分注意非神秘化；对非神秘主义作家（如萨特）则注意非道德化（如边码第 95—96 页），而不像后来走向神秘主义和道德化。其次，莱恩出于生存论心理学的人道主义背景，不愿使用“病患”（disease）、“病症”（symptoms）等词，同时却仍以理性的态度正视患者精神混乱的客观现实，而不像后来将精神分裂症患者视为“超现实世界”的先驱。最后，作者将精神混乱状态看作患者自身的属性，而不像后来视为家庭（乃至社会、文明）的属性。

当然，这三点区别并不是绝对的。译者认为，莱恩后来的变化和发展，或多或少都可以在本书找到种芽，只是，他在本书中理智和冷静地对自己加以限制，正如他开篇引用 E·明可夫斯基的话所表明的，这是一本主观性的著作，但作者已为达到客观性的境界竭尽全力。第十一章也很说明问题，莱恩对患者朱莉亚充满了同情，要是按后期的态度，他或许会将她视为“超现实世界”的先驱。但在本书中，他引用高尔基的话指出：真理胜过一切怜悯。通过真理，才能达到有意义的理解和给出有意义的同情。译者认为，这种理性的态度使莱恩的生存论-人道主义获得了一种重要的张力。

六

到后来，莱恩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批判“唯智论”和“唯理论”，质疑科学的本质，认为正是它们从根本上使自我和世界变得虚假，从而异化了西方文明；它们界定的“正常”概念限制和扭曲了人性，而关于反常和疯狂的定义则是社会性的压迫手段；相反，疯狂高于正常，是对病态社会的反抗与突破，是现时代人的福音（读者可从《分裂的自我》1965年版序言中部分地窥见这一变化）。另一方面，在艺术心理学与创造心理学上，莱恩将反常视为创造性的源泉。在为疯狂和神秘主义辩护的同时，他自己的创作也走向神秘主义，其离经叛道之远，使得有人认为他自己已经疯了。他收入《经验的政治·天国鸟》中的《天国鸟》，在译者看来，其内容无疑充满了对现代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但其形式则完全是一篇荒诞派的哲理抒情散文长诗，普通读者恐怕较难理解，现代派艺术家则多半会为之喝彩。《生活的真谛》则由各种隐喻性质的片断组成，是一本启示录式的天书。概而言之，莱恩变成了一个社会激进主义者和个人神秘主义者，远离各种心理学派（包括一般的生存论心理学立场），成为一个极为独特的人物。

这一变化的根源值得略作探讨。译者认为，首先应考虑的是《分裂的自我》内部所包含的种芽：如对科学和“客观”的质疑（第一章），对“正常”与“反常”的重新定义（第一、二章），对西方文明整体特质的社会学反思（边码第180—181页）等。关于疯狂与艺术之相关性的内容更是随处可见，只是未加阐发而已。

其次应考虑外在的影响，其中主要有：萨特的影响（《理性与暴力》即是对萨特的专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特别是激进的H·马尔库塞。可参见本书1964年版序，以及《经验的政治·天国鸟》序）、英国当时各种激进社会政治运动（如要求裁

军)的影响,等等。

七

《分裂的自我》使得莱恩进入了 50—60 年代之交西方激进的、批判的、反叛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青年的行列,在这个行列中有萨特、马尔库塞、布朗(N·O·Brown)、赖希(W·Reich)、金斯伯格(A·Kingsberg)、梅勒(N·Mailer)和迪伦(B·Dylan)等等。这些人关注和研究“异化”问题,呼吁对西方现有文明、制度、道德伦理乃至思维方式进行质疑、批判或反叛,呼唤“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促发了 60 年代后期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激进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如法国的校园动乱,美国的人权、反越战、嬉皮士和性解放运动)。通过这场运动,莱恩确立了自己基本的思想地位和形象:他不仅是一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精神病学家,不仅是卓越的生存论心理学家,更是激进的文化批判家,西方文明的批评者、预言家、反文化英雄。他的读者主要并不是精神病专家(甚至几乎不是),而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艺术家、宗教实践家,以及其他关注思想史与当代文化现象的人们。他的著述多被收入企鹅丛书。他的《分裂的自我》从 1965 年到 1971 年再版重印共 8 次。《经验的政治·天国之鸟》从 1968 年到 1971 年出版重印共 7 次。

现在,《分裂的自我》中译本即将问世,我们认为,无论就精神病学、心理分析、艺术心理学与宗教心理学研究而言,还是就关注当代西方社会、哲学、美学思潮而言,这都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林和生

1993 年 9 月 27 日于成都百花村

目 录

初版序言	1
鹈鹕版序言	3
致 谢	1

第 一 部 分

第一章 人学的生存论-现象学基础	2
第二章 从生存论-现象学理解精神病	15
第三章 存在性不安	32

第 二 部 分

第四章 身体化的自我和非身体化的自我	62
第五章 精神分裂性状态中的内自我	79
第六章 假自我系统	100
第七章 自我意识	115
第八章 彼得个案	133

第 三 部 分

第九章 精神病的发生和发展	152
---------------------	-----

第十章 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和假自我	180
----------------------------	-----

第十一章 荒园之魂：对一位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	206
------------------------------------	-----

初版序言

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作者最初商定，要共同进行一项生存论（*existential*）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系列研究，在这一领域内做出开创性的工作。本书即为这一计划的第一件产品。

本书是对精神分裂性（*schizoid*）个体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其基本意图是想让人理解疯狂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一努力是否成功，读者自有明鉴。只是我想首先说明：本书并不打算发表一套条分理晰的精神分裂症理论，并不打算探讨精神分裂症的体质和器质方面的问题，并不打算描述我与有关患者的关系，也不打算描述我的治疗方法；因而，我希望不要从这些方面对本书加以判断。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想通过朴素的英语，将生存论的词汇用于

existential〔生存（论）的〕一词，在本书副标题中已经出现过了。国内普遍将该词译为“存在主义的”。然而在哲学上，“存在”一词用于表示各种事物（也包括人）的存在，目前在英语中一般以 *being*（译自德文 *sein*）表之；而专门用以表示人之存在的 *existence*（德文为 *existenz*）一词，译为“生存”比较确切。此外，在本书中，以“论”代替“主义”似较好。译者赞同某些翻译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参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附录一。参阅时请注意德文—英文对照），因而将 *existential* 一词定为“生存（论）的”或“生存性的”。——译注

schizoid 一词通常译为“精神分裂（病）样的”、“类精神分裂症的”（作名词时即为“精神分裂病样患者”、“类精神分裂症患者”、“分裂性人格者”）等等。考虑到本书的生存论性质和非临床性质，译本将该词译为“精神分裂性（的）”或“精神分裂性个体”，少数特殊情况视前后文关系另定。——译注

讨论某些疯狂形式。我相信这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在最初几章中,多数作者会发现我对一些术语采用了不合常规的用法。不过,任何这样的用法都经过仔细考虑,最终之所以采用,是因为别无更好的选择。

为避免误解,我还要另作一点声明。熟悉生存论和现象学文献的读者很快会发现,本书并非任何已知生存论哲学的直接运用,它与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宾斯万格和蒂利希等人的工作有着若干重要的歧异。

本书不打算讨论这一类歧异之点或趋同之点,因为那样会偏离眼下迫切的任务,那样的讨论属于另一项工作。但总而言之,生存论思想传统是我的主要思想来源。

感谢本书所涉及的各位患者及其父母,他们欣然同意本书的出版。在本书中,人名、地名,以及所有可辨认其当事人的细节都作了变更;不过本书仍属严肃的学术著作而非小说,读者尽可放心阅读。

感谢麦克尼文(A·MadNiven)博士和罗杰(T·F·Rødger)教授,他们为本书提供了临床基础方面的各种方便,并给我鼓励。

在我成为塔维斯托克诊所的助理医师之前,也就是在1956年之前,上述研究的临床基础工作业已全部完成;萨瑟兰(J·D·Sutherland)博士提供了慷慨的帮助,使本书初稿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1957年本书出版之前,许多人阅读了手稿,许多人给我鼓励和有益的批评,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想特别感谢阿本海默(K·A benheimer)博士、米尔纳(M·Milner)女士、罗杰教授、罗马诺(J·Romano)教授、里克拉夫特(C·Rycroft)博士、肖斯坦(J·Scharstein)博士、萨瑟兰博士,以及温昆卡特博士,他们对手稿作出了建设性的“反应”。

莱 恩

宾斯万格(L·Binswanger, 1881—1966): 瑞士精神病学家和作家, 他将生存论-现象学原理(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理论)用于心理治疗。——译 注

鵝鵝版序言

人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我在 28 岁那年写成这本书，当时首先想表达这样的思想：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在临床上被诊断为精神病的人们；而且，这种理解还可大大超过一般人所敢于设想的程度。当时，我已做到将这种理解归结到对当事人具体社会关系（特别是当事人家庭内部权力状况）的理解，但我现在觉得，我当时恰好未能躲开本打算躲开的陷阱；这一点，即便当我集中思考或努力描绘某种确定的精神分裂性生存之时，也未能避免。现在看来，我当时写他们（Them）太多，而写我们（US）太少。

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文明意味着压抑；我们既需要遵从，也需要满足本能——明确地说即性本能；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由于难于找到解决冲突的途径，弗洛伊德渐渐相信，人与人之间朴素的自然之爱，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的文明不仅压抑“本能”，不仅压抑性欲，也压抑任何形式的超越。在单向度的人群中间，如果谁有自己独特的多向度经验，又无法完全否定或忘却自己的经验，那么毫不奇怪他会被人群摧毁——除非他背叛自己所了解的一切。

今天，被我们称之为正常、健全、自由的疯狂渗透了我们的社会，

莱恩于 1967 年出版《经验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一书，深入讨论了这里提出的问题。该书第四章标题即为“我们与他们”（US and Them）。

——译 注

见马尔库塞的近作《单向度的人》，Beacon 出版社，1964 年。——原 注

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所有的参照系都意义不明，含糊不清。

宁死也不愿与社会抗争的人是正常的；说自己失落了灵魂的人却是疯子。说人是机器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说自己是机器的人，却被称为“人格解体”——这是精神病学的行话。说黑人是劣等种族的人受人尊敬；说自己的白皮肤意味某种不治之症的人，会被视为不可救药。

在一家精神病院里，一位 17 岁的姑娘对我说：她恐惧极了。因为原子弹就在她身内。这属于妄想症。在这个世界上，政治家们夸耀自己拥有毁灭性的武器，并以此恐吓别人；他们比许多被贴有“精神病”标签的人要危险得多，要远离“现实”得多。

精神病学可以走向超越，走向真正的自由，走向人的真正的发展；某些精神病学家做到了这一点。但精神病学也很容易通过（说得好听点）非伤害性折磨而沦为洗脑术、行为诱导调整术。如果我们尽够自己的努力，那么紧身服、铁栅栏、脑白质切断术等等就可能由轻微的手术和镇定药取而代之，后者会在患者内部为他划定界线。我说这些是想强调：我们所谓的“正常”、“调整”状态，绝大多数时候是对欢乐的放弃，是对我们真正潜能的背叛；许多人最终只得到一个虚假的自我以适应虚假的现实，他们的成功仅限于此。

然而由它去吧。这部作品出于一位老年轻人之手。岁月飘逝，今天他更老也更为年轻。

伦敦 1964 年 9 月

致 谢

本书作者荣幸地得到以下作者和出版者的允许从有关著作中引用了若干文字，特致谢意：博斯 (M. Boss)：《性变态的意义和内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贝利 (J. B. Baillie) 译；克雷佩林 (E. Kraepelin)：《临床精神病学讲义》；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见《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第 18 卷；博斯：《梦的分析》；萨特：《想象心理学》；特里林 (L. Trilling)：《反对自己》。

笔者还荣幸地得到海沃德 (M. L. Hayward) 博士和泰勒 (J. E. Taylor) 博士的同意，在本书第十章中引用了他们的论文：《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增强疗法行动的描述》，见《精神病学季刊》，第 30 卷，第 211—266 页；在此一并致谢。

我在这里奉献的是一本主观性的著作，但是，它已为达到客观性的境界尽够了自己的努力。

明可夫斯基

第 一 部 分

第一章 人学的生存论-现象学基础

精神分裂性这一术语用于描述这样的个体，其经验整体经由如下两种主要的方式分裂为二：其一，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其二，他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分裂。他没有能力把自己与他人“一道”加以体验，也没有能力把自己“置身于”环境中加以体验。相反，他在绝望的孤独中体验自己；并且他所体验的自己并非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以不同方式“分裂”了的人；分裂的结果也许是只有脆弱联系的心与身，也许是两个或多个自我（self）等等。

本书试图对某些精神分裂性个体和精神分裂症个体加以生存论-现象学描述。在此之前，有必要把这一描述方式与常规临床精神病学和精神病理学作一比较。

为描述某个人的特殊经验对象，可将他所有的特殊经验

self一词，目前学术界一般译为“自我”、“自己”、“自身”等，如果主要考虑它与 ego（自我）的区别，则以译为“自己”较好。但是，这种译法会带来另一些表达上的混淆和不便。本来，这就是一个值得学术界认真讨论的问题。由于原书很少涉及 ego 概念，因而，译本 self 一词暂译为“自我”，在遇到 eog 一词时则以原文注之。——译注

置于他整个在世 (being-in-his World) 的前后关系 (context) 之内。生存现象学并不完全是这样一种描述方式。生存现象学试图刻画人对周围世界及自身之经验的性质。如果不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疯狂言行的生存性关系，就无法理解这些言行本身。我将描述发生疯狂的一种形式，并将努力表明，在正常的精神分裂性在世方式到精神病的在世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辨认的过渡。我用精神分裂性和精神分裂症这两个术语分指正常状态和精神病状态，当然，这两个术语的运用已超出了通常临床精神病学的范围。我是在现象学和生存论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临床精神病学的眼界局限于考虑精神分裂性存在的某些形式，或由精神分裂性状态过渡到精神分裂症的某些过渡形式。然而，下面对有关个体切身问题的研究将表明，目前状态的临床精神病学和精神病理学方法无法把握这些问题；相反，只有生存论-现象学方法才可能揭示其中真正的人的关联和意义。

在本书中，我尽可能直接面向患者，尽可能避开专门围绕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理论问题，以及实践问题。我们面临着特殊的人的悲剧，这一悲剧从未得到充分清晰的、明确的表述。因此，在进行其他各种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进行纯粹描述性的、说明性的工作。本章将以必要的最简明的文字给出本书的基本定向，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灾难性的误解。本书面临两个方向的任务，一方面，它要面向某些精神病学家，他们非常熟悉各种“病案”，但或许难于以目击者身分接触本书所描述的“病案”；另

一方面，本书要面向另一些人，他们了解或同情“病案”的当事人，但并不视其为“临床病人”。可以肯定，在上述两方面，本书都不会令人十分满意。

作为精神病学家，我一开始便遇到如下的主要困难：如果我所掌握的精神病学语言将患者拒于一旁，我又怎么可能直接面向患者呢？这些精神病学语言是为了特定的临床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专门用来孤立和限定患者生活的意义；如果只能使用这种语言，怎能揭示出患者生活环境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关联及其意义呢？今天，对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语言的不满，已经不限于专业范围之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们普遍感到，这些语言难以表达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但是我们又不应该说非所想，自我欺骗。

因此，预先对人们所运用的某些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语言加以考察，将会有利于我们的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思想即语言。一套专业词汇不过是语言中的语言。考察这一套专业词汇，即意味看去发现有关语言中包藏着的现实。

当前用于描述精神病患者专业词汇系统，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用自己的语言把人从语词上加以分裂，其方式与本书必须讨论的生存性分裂有些相似。但是，要对生存性分裂作出恰当的描述，需要以统一的整体概念作为出发点，而在当前的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语言系统内不存在这样的概念，也无法表达任何这样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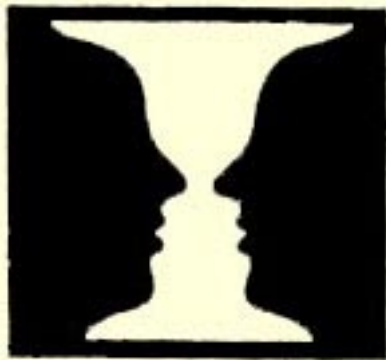
上述语言系统或者只考虑与他人和环境相脱离的孤立的

人——即把人看作与他人和环境没有根本“联系”的整体，或者只考虑这种孤立整体身上被人为地、虚假地实质化了的那些方面。属于这样的语言有：心与身、灵与肉、心理的和生理的、人格、自我，机体等等，全是些抽象术语。我们不是努力去把握我与你的本质联系，却把眼光局限于孤立处境中单个的人，将人丰富的层面概念化为“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id)。他人成为内在的或外在的客体，或者成为这两者的结合，成为一部精神机器。以一部机器与另一部机器之间相互反应的方式，恐怕无法正确谈论我与你关系。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两部机器之间隔起栅栏，自我蒙蔽，自我欺骗，更让人无话可说。这不仅仅是经典的弗洛伊德玄奥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任何把人从与自身世界中之他人的关系中抽象出来（或部分地抽象出来）的理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自身世界中或只有通过自身世界，我们才可能是我们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尽管世界没有我们也照样存在和运转，但“我们的”世界却将随我们一道消失。我认为，个体在自身世界中与他人发生关系，形成一种整体性，只有正确反映这一整体性，才能正确谈论个体自身的根本经验。据我所知，唯有生存论思想采取了这一认识方式。因而，从生存论上说，人的具体存在被看作人的生存，被看作他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要想对精神分裂性个体或精神分裂症个体作出正确的研究，我们必须把该个体首先看作这样的人——他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并且从一开始就处于某个世界“之中”；必须认识到：没有“他的”世界，人就不存在，而没有他，他的世界也不存在。要

是做不到这些，我们的研究就会走上歧途，就会产生语词的或概念的分裂，而这种分裂与精神分裂性在世整体性的分裂刚好一致。一旦走上歧途，就很难对语词和概念碎片进行补救性整合，正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很难将其解体的自我与世界重新整合一样。一句话，被我们破碎了的东西，不可能凭借一些大写的或复合的词汇——心理- 生理的、心理- 躯体的、心理- 生物的、心理- 病理的、心理- 社会的，等等——重新粘合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样一种精神分裂性的理论与精神分裂性经验高度相关，那么，探讨前者的起源也就与理解后者的本质高度相关。下面，我将运用一种现象学方法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人的存在 (being) [后面我将用“存在”一词简单指一个人之所是的一切 (all that a man is)] 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审视，各种不同侧面都可成为研究的焦点。特别地，人可被看作具体的人或物；而即便对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角度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描述，进而导致完全不同的理论，最后决定完全不同的行动。最初认识事物的方式将决定后来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幅两可图形（见图一），图形中的事物，可以看作一只杯子，也可以看作



两张相对的面孔。客观地说，在图形所在的纸面上并不存在两样事物，在那里只有一样事物。然而，不同的观察方式却会看到不同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图形看作面孔，从上到下依次看到前额、鼻子、上唇、嘴、下颌、脖子。换一种观察方式，勾画出两张面孔侧影的线条，又围成了一只杯子的轮廓。在这两个不同的对象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相去甚远。

设想我与你相对而坐。我可以把你看作与我一样的人。然而，即便你保持一切不变，我仍能换一种角度把你看作复杂的生化系统，这一生化系统或许有着自身的特异性，但这些特异性最终也还属于生化现象。这时候，你不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生物体。用生存现象学的话说，他人——无论被看作人还是被看作生物体——是不同的意向行动的对象。在这对象身上，并未并存着两种不同的元素或物质——灵与肉；只有两种不同的经验格式塔——人或生物体。

人与生物体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同的。把图形看作杯子或面孔侧影，会得出不同的描述；与此相似，把人看作生物体或人，也会得出不同的描述，进而得出两种相去甚远的理论，最后导致两种不同的行动。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它从人与他人的关系出发，最终得出对他人的描述；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人始终被看作人而非生物体。

例如，我们听某人讲话的时候，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目的：
(1)通过神经系统的有关过程和发音器官研究语言表达行为；
(2)理解讲话人的话语。在后一种情况，用发音器官变化中的一般规律——这是语言表达的必要前提——对表达行为加以解释，对理解讲话的内容并无帮助。反过来，对讲话内容

的理解,并不能给予我们有关讲话人脑细胞新陈代谢的知识。也就是说,对讲话内容的理解,并未提供对相关生物过程的解释,反之亦然。在这里或其他地方,无疑存在着心-身二元性。对讲话活动或其他可观察活动的两种不同处理方式(在刚才的例子中表现为把讲话活动作为人的活动或作为生物体活动加以处理)是当初不同的意向性行动的结果。每一意向性行动具有自己的方向和结果。在与他人相处“之后”的整个前后关系中,我们选取一定的观点或意向性行动。人作为生物体或人作为人,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视角,分别揭示出人之现实的不同侧面。从方法论上说,两者具有同样的可能性;但必须警惕两者的混淆。

把人看作人,意味着他被认为具有承诺和选择能力,是自我行动者(self acting agent)。把人看作生物体,则意味着其内部一切活动均可被概念化为不同的复杂性层次——原子的、分子的、细胞的、系统的,或生物的。只有从人的经验和人的意图出发,才能理解人的行为。相反,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只能看到肌肉的紧张和松弛等等行为。这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连续的经验,而是一系列生物性的过程。因而,在被看作生物体的人内部,我们无法谈论其欲望、恐惧、希望、绝望,等等;这种看法所考虑的基本元素不是人对自身世界的意向,而是能量系统的能量。

被看作生物体的人是各种事物的综合体,是它的(its)综合体,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从根本上组成一个生物体的那些过程是物过程(it-processes)。在人们中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幻想:只要把对某人的人的理解转换为关于物过程系列或物过

程系统的非人化语言，那么对这个人的理解就会或多或少有所提高。对于作为人的他人，我们有着自己的经验，然而，有人却想把这种人的经验转换成非人化的描述，而根本不考虑这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当我们运用机械类比或生物类比作“解释”时，其实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此。应该指出，我在这里并未反对运用机械的或生物学的类比，实际上也没有反对视人为复杂机械或动物的这种意向性行动。我力图说明的只是：人作为人不同于人作为机器或物过程的生物系统。如果关于前者的理论退化为关于后者的描述，那么它就迷失了方向；反之亦然〔见布里尔利（Brierley），1951年〕。

人化物的世界，把人的意向注入动物世界，这本来是一类倾向；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类倾向却被另一种把人非人化或物化的根深蒂固的倾向所压倒，被关于物过程的物理、生理和生物的科学所压倒。这种现象日益严重，致使真正的人学难于起步。

生活中有的人把自己体验为自动机器、机器人、机器部件，甚至动物，下面我们将特别对他们加以考虑。这样一些人理所当然会被认为精神失常。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不认为那种试图把人变成机器或动物的理论也同样是精神失常的呢？人对自己的体验、对作为人的他人的体验，是基本的

对 depersonalization 一词，译本将依据上下文译为“非人化”或“人格解体”。——译注

此处表示参考布里尔利 1951 年发表的著述，该著述题目及出处列于书后参考文献栏。下同，不再一一注出。——译注

自我肯定。先是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才会出现各种科学的或哲学的问题：这样的经验如何产生？如何解释？等等。

麦克马雷 (MadMurray, 1957 年) 写道：“我们希望看到：随着科学的心理学的产生，生物学的个体概念也将向人的整体概念转变……”（第 37 页）我们应该有能力把单个的人作为人而非物或生物加以思考和体验；特别是，当所论个体是人的整体时，我们应该找到表达这种整体的方法。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坚持麦克马雷称之为“生物学类比”的想法。由于这一点，以下的任务将十分艰巨。我将努力描述一种相当特殊的个体人格解体 and 分裂，对于这种人格解体和分裂，我们尚待发现“这样一种逻辑形式，它能对人的整体作出前后一致的表达”（同上）。

自然，对于人格解体和分裂，精神病理学能够作出各种各样的描述。然而，没有一种精神病理学理论能够避免对人的扭曲，因为，正是这种理论通过它自己的主观愿望（尽管它或许试图反对自己的主观愿望）把扭曲强加于人。名副其实的精神病理学必须预先假定“精神”（精神结构或内心结构）的存在。它必须预先假定，客体化（无论它是否伴随着物化，这物化通过虚幻的“物”或系统的思考方式产生出来，再强加于人）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概念性的关联，其对象是作为人与别人一道行动的他人。不仅如此，名副其实的精神病理学还必须预先假定，它的概念模型不仅能模拟健康的生物体功能，也能模拟生理病态的生物体功能。的确，这类比较中包含着丰富的局部相似性，使得精神病理学具有某种有效性；然而，精神病理学根本的路线方法决定了它无法理解：患

者的人格混乱表明他未能形成特殊的人格统一体。沸水不能成冰。正是精神病理学本身的存在使得上述二元性分裂得以延续下去。大多数精神病理学家都希望避免这一二元性分裂，它的确是一个错误；可精神病理学又无法在自身框架之内解决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元论范畴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能换一个术语，把错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

应该说，不坚持“客观性”，便没有科学性。关于人的生存的真正的科学必须尽可能公正不倚。物理学以及其他关于客观事物的科学，应该帮助人学在自身领域内保持公正不倚。然而如果认为，要公正就要把人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而非人化，那么，这种“客观性”绝非科学的态度。对于一种研究人的理论，这种非人化的企图正是一种意向性行动，这一行动，跟其他人的精神分裂性人格解体一样虚假。这样一种物化过程虽然打着科学的旗号，却产生虚假的“知识”，它与对事物虚假地加以人化一样，是一种幼稚的错误。

不幸的是，个人的或主观的这样一些词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就好像它们没有能力表达任何视他人为人的真正的行动（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回到“客观的”态度）；相反，一提到这些词，就好像我们把主观感觉和态度混进了对他人的研究，歪曲了对他人的认识。“客观的”或“科学的”是可敬的；相反，“主观的”或“直觉的”却声名狼藉，“神秘的”就更不堪言。有趣的是，人们在“主观的”一词前面常常加上“仅仅是”、“不过是”等等，而“客观的”却几乎从未有如此殊荣。

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精神病理学家是弗洛伊德。他是一

位英雄。他进入了“潜意识世界”，在那里遇到彻底的恐怖；他随身带去的理论就像美杜莎的头，把这些恐怖变为石头。我们这些追随弗洛伊德的人，能够分享他从那里带回来传给我们的知识。他成功了。现在，轮到我们证明自己能否成功，而毋需借助于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只是防御性的理论。

与作为人或作为物之患者的关系

生存现象学所讨论的生存，可以是自己的生存，也可以是他人的生存。在他人恰好是患者的情况下，生存现象学便试图帮助患者重建其生活方式，使他在自己的世界里作为自己而存在。当然，在治疗关系中，核心问题也许是患者“与我一道存在”（*being-with-me*）的方式。

患者向精神病医生诉苦，从最明确的难题（如“我不想从飞机上跳下去”）到最含糊的问题（如“我无法说明我为什么真的来了。也许不对的只是我自己”），都可能向医生吐露。不管患者吐露的苦恼是多么明确或多么含糊，有一点始终是清楚的：通过诉苦，患者把他的生存、他整个在自身世界中的存在引入了治疗过程；患者可能有意，也可能无意，这无关紧要。此外我们还知道，患者之存在的这些方面也许都未表达清楚，但其中每一方面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方面相联系。

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其目光能使所见者变为石头。其头后被英雄珀尔修斯割下作为武器。——译注

在这里，生存现象学的任务，是要探讨他人的“世界”是什么，以及他在自身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关于某个人的存在，我的想法也许一开始就与他自己的想法不符，也不同于其他精神病学家的见解。例如，在我看来，任何假定的个人都是一个有限的生命，有始有终，有生有死，同时也有一个身体，使他得以生存于此时此地。我个人认为这些表述适用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因而用不着每一次都给出证明；实际上也无法证明或否定。然而，我的一位患者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却远远超出了生与死的层面。他认为他根本不只属于一时一地；对于他来说，这不是“想象”而是“事实”；换句话说，他认为他拥有超时空的存在。即便我不把他看作精神病人，我也无法证明他错了，虽然我很想证明这一点。在实践中相当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关于某人的存在，我们的概念或经验与他自己的概念或经验可能相去甚远。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定向，作为一个人进入他人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把他人看作我们自己世界中（即自己的整体参照系统中）的对象。我们必须有能力实施这种自我定向，而不被关于谁对谁错的偏见所局限。这样的能力是精神病学家的先决条件。

与别的治疗方法相比较，在心理治疗中，人的存在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层面：每个人都与他人既相独立又相联系；两者互为必要条件。只有当存在者既独立又不孤立，他们之间才会有人的联系。我们既不孤立，也保持独立，这就形成了悖论：我们与他人的联系和独立都是我们存在中的基本层面，但任何特定的个人都不是我们存在的必要成分。这一悖论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质。

重建患者与他人的联系是心理治疗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倾向。一位紧张症患者也许在数小时之内不吐一词，好像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生存；但治疗者并不一定是在浪费时间。这就是治疗者应该遵循的原则。

第二章 从生存论-现象学理解精神病

流行的精神病学行话还有另一个特征。它把精神病说成是患者在调整过程中的社会性和生物性失败，说成是一种强烈的不适，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现实，缺乏内省。正如凡·登·伯格 (van den Berg, 1955 年) 所说，这些行话是不折不扣的“诋毁之词”。至少就 19 世纪而言，说这些话是缺乏道德感的表现。从许多方面说，这实际上想在思想上逃避自由、选择和责任的结果。但是，在这些行话中，包含着某种作人的标准，它正是精神病患者所不能达到的。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些“诋毁之词”中完全没有可取的内容。我只是认为，当我们明确判断某人为精神病时，应该采取比过去更为坦诚的态度。当我判断某人是精神病时，我绝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我看出他头脑不正常，对自己或者对他人都很危险，他需要到精神病院治疗，需要看护。然而我同时也知道，按我自己的观点看来，有些人虽然被认为精神健全，但他们的头脑同样不正常，同样危险。差别只在于，社会没有将他们送进疯人院。我知道，被认为患有妄想症的人，在他的妄想中也许会告诉我真理。我这样说，并非含糊其辞，也不是隐喻，

而是表达相当正式的看法。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许会让光明进入自己破碎的心智，而这光明却不会进入许多正常人的完整的心智，因为这些心智对外是关闭了的。按照雅斯贝尔斯的看法，以西结（Ezekiel）就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作为精神病专家所遇到的一个难题，它也是本书一个重要的背景。我遇到的难题是，在我亲自与之打交道的人们中间，除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外，我难于真正找到精神病的“征兆和症状”。我只能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因为自己不善于处理各种幻觉和妄想等等。把我自己的经验与标准教科书中对于精神病的描述相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描述并不适用于我所接触的患者，这些患者的行为方式与教科书作者们描述的并不相同。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我就错了。也许是他们错了，但那又怎么可能呢？下面所说的也许是事实：

标准教科书是在一个行为场（behavioural field）里描述人们的行为，精神病医生也包括在这个行为场中。在标准教科书里，患者的行为与同一行为场中精神病医生的行为似乎有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后者的结果，即标准患者便是标准医生的结果，是标准精神病院的结果。布

以西结（约公元前 6 世纪初）：古代以色列先知和祭司，《旧约·以西结书》中的主要人物，也是该书作者之一。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译注

洛伊勒 (Bleuler) 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著名描述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点。正如布洛伊勒自己所说, 研究结果发现, 精神分裂症患者比他家中花园里的鸟儿更不可思议。

我们知道, 布洛伊勒并非是以精神病医生的样子与患者打交道的。他怀着尊重、礼貌、关心以及科学的好奇心接近患者。尽管如此, 患者首先还是被视为临床病人, 而布洛伊勒要作的事情, 是通过观察患者的病征, 诊断患者的病情。那么多的精神病专家, 都把布洛伊勒的临床方法视为不证自明, 理所当然。他们会发现很难理解我的思想。不错, 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思想流派, 然而布洛伊勒的方法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它自然也被非医学界人士视为理所当然——在这里, 我所谈论的始终是精神病患者 (换句话说, 就像大多数人直接对他们自己说话, 而不是对你或我说话)。今天, 精神病专家们口头上声称自己采取了全新的观点、眼光和态度, 然而在实践中依然墨守陈规。他们信守的方法被认为是如此完美、如此有价值, 同时又如此安全, 以至任何人都有理由怀疑, 这种临床职业态度可能并非完全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某些情形中, 甚至就是误用。对于一个称职的医生来说, 他必须注意患者的行为所透露出的感觉和感情, 不仅如此, 他还要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 当患者感到焦虑时, 他自己的血

布洛伊勒 (1857—1939): 著名瑞士心理学家, 精神分裂症研究的先驱, 首倡“精神分裂症”一词, 并因这方面的研究而享有盛名。他认为早期精神分裂症并非绝对不可治愈。——译注

此处译作“病征”而不是“病症”, 因为作者用的是 signs(征兆)而不是 symptoms(症状), 以区别疾病的征兆和疾病的症状。——校注

压也可能有所增加，脉搏也可能加快，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一个人像审视机体一样审视“人心”，甚至整个人，他就不会关注自己此刻感情的性质。不管这些感情是什么，它们都被忽视了，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中，他所采取的，仍然是标准化的职业眼光和态度。

自克雷佩林 (Kraepelin) 以来，传统的临床精神病学态度原则上并无改变。随便翻开一本目前英国的精神病学教科书 [例如 迈耶 (Mayer) 和 格罗斯 (Gross)、斯莱特 (Slater) 和 罗斯 (Roth)]，都会看到类似的态度。把它们与克雷佩林的下述演讲相比较，就会明白我们的断言。

下面是克雷佩林就一位患者向他的学生所作的解说，这位患者显示出紧张症的兴奋征兆：

我今天让你们看到的患者，几乎是被架进屋子里的。他用脚掌的外缘撑住身子，罗圈着腿走进屋子。与此同时，他甩掉拖鞋，大声哼唱，并（用英语）喊叫了两次：“我爹，我亲爹！”患者 18 岁，奥伯里尔希勒 (Obererlschule) (高年级现代分校) 的学生，高身材，体格相当健壮，然而面容苍白，时常浮现短暂的红晕。患者闭眼坐着，对周围不加注意。讲话时也不睁开眼睛。开始声音低沉，后来渐渐变成尖叫，越来越响亮。当问他身在

克雷佩林 (1858—1926)：著名德国精神病学家，其精神病分类法在 20 世纪初期影响极大。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内源性的，病因是大脑的器质性改变，因而无法治愈。——译注

何处，他回答说：“你也想知道这个？让我告诉你谁正受审讯。谁受了审讯，谁将受审讯。我全知道，也可以告诉你，但我不愿意。”当问及他的姓名，他尖声回答：“请问你的姓名？他闭上的是什么？他闭上眼睛。他听到了什么？他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怎样？谁？何时？何地？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叫他看，他却不好好看。喂，你，快看呀！那是什么？怎么啦？注意！瞧，他不注意。我再问你，那是什么？为什么不回答？你又要乱来吗？你怎么这样乱来？我来了！让我教你怎么做！你别想耍弄我。你也别想变聪明！你是个乱来的家伙，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乱来的家伙。他又开始了吗？你什么也不懂，一点也不懂。他完全不懂。你愿意照我的话做吗？他不想，他不想做。你还想乱来？你还要乱来？他们怎样注意，他们就能注意。”患者不停地叫骂，直至语不成声。

这里，在诸多现象中，克雷佩林注意到了患者的“不可接近性”：

虽然患者明白一切问题，但他却没有提供丝毫有用的信息。他的话……只是一串不连贯的句子，与正常情况没有联系。（1905年，第79—80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毫无疑问，这位患者表现出紧张症的兴奋“征兆”。然而，对这一行为的解释，还得取决于我们与患者建立的关系。感谢克雷佩林生动的描述，使患者透过这些书页，越过50年的

时光，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患者想干什么？显然，他正在导演一场对话，以他模仿的克雷佩林为一方，以他自己那反叛的自我为另一方。

“你也想知道这个？让我告诉你谁正受审讯，谁受了审讯，谁将受审讯。我全知道，也可以告诉你，但我不愿意。”这些话的意思看来是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认为，患者极端怨恨这一当着全班学生进行审讯的形式。或许，对于那些令他内心痛苦不堪的事情，他无能为力，无法言说。但是对于克雷佩林，那些事情不是“有用的信息”，至多只是进一步的“病征”。

克雷佩林追问患者的姓名，患者用突然爆发的激怒语调回答。此时他所表达的，正是他从克雷佩林对他的态度中所感到的东西：请问你的姓名？他闭上的是什么？他闭上眼睛。……为什么不回答？你又要乱来吗？你别想耍弄我（换句话说，患者不想在全班学生面前羞辱自己，他觉得克雷佩林正在与他作对），等等；……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可怜下流的家伙……等等。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患者的行为至少可以用两种方式加以理解，就像我们从前面那幅图形中分别看到杯子和面孔轮廓一样。这一行为可以看作“病征”，也可看作患者对自身生存的表达。生存论-现象学的解释，是对于他人之感觉和行为方式的推测和理解。上面那位患者经历了什么？显然，他感到痛苦和绝望。他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反抗审讯。他希望被倾听。

阐释：由与患者之关系所决定的活动

当精神病医生希望自己尽可能“科学”或尽可能“客观”之时，他会设想尽可能将自己限制在患者“客观的”可观察行为之内。然而，这根本不可能。

事实上，一个人在观察“病征”时，不会是客观的、中性的。正如一个人不会把微笑客观地、中性地观察为肌肉的收缩[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53年]。只要我们进入与对象的关系，我们就只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认识他，把我们的理解或阐释引向“他的”行为。在有些情形中，患者没有给出应有的相互反应，使我们感觉到他似乎不存在。但是，即便在这些情形中，上述生存论-现象学的观点仍是无可非议的。这一点非常接近我们问题的核心。

我们面对的困难，多少与象形文字的破译者所面对的困难相似（弗洛伊德喜欢探讨这种相似性），只是更困难一些。象形文字或其他古代文献的阐释或破译理论，早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并由狄尔泰(Dilthey)在19世纪将其发展得更为完美，我们的阐释理论（阐释精神病人的“象形”语言和行动）无法与之相比。不过，我们可借此明确我们的位置和任

狄尔泰(1833—1911):德国哲学家。主要贡献是发展了人文科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论，反对人文科学受自然科学的普遍影响。对哲学、历史、文化、文学等研究有重大影响。——译注

务，为此我们只需把我们的问题与狄尔泰所阐述的历史学家的
问题相比较。两者的核心任务都是：阐释。

借助于形式结构、语言特征、语法风格等等，可以对古代文献作出形式化分析。临床精神病学也试图对患者的言行作出类似的形式分析。显然，这种形式主义——历史的或临床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在这样的形式化分析之外，还可能通过一门关于社会-历史诸状况之关系的知识，对有关文献加以理解；因为，这些文献正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与此相似，我们在研究分离出来的临床“征状”时，总是希望将形式化的和静态的分析尽量扩展，以便理解这些“征状”在患者生活中的地位。这样的作法涉及到机能发生学的假说（dynamic-genetic hypotheses）。然而，关于古代文献或关于患者的历史知识，本身就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对古代文献或患者达到更好的理解。为此我们只需引入我们的同情心，或者说得更深刻一点，只需引入我们移情的本性。

狄尔泰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他“把古代文献作者和破译者的关系看作理解文献的条件作用因素。这样，他事实上就揭示出了（所有以理解为基础的）阐释中预先假定的成分”。（引自布尔特曼）

我们通过纯粹理智的过程进行解释（狄尔泰写道），然而，

以下狄尔泰的论述直接引自布尔特曼（Bultmann）的《圣经阐释问题》（见《论文集》，1955年，第234—261页）。——原注

我们的理解，却是通过有理解力的心智中所有能力的合作来进行的。我们的理解始于既定的、活生生的整体之联系，这是为了用过去时代自身的方式去理解过去。

在理解的行动中，我们希望能将自身一切方面的能力都运用起来，这样一种意愿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对于他人的看法。这似乎也是说，我们需要为自己定向于此人，一如我们随时准备接受理解他人的可能性。这两者本身是一致的。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某人之存在的各个层面，正是该人在世方式的表达。理解这些层面是一门艺术，它需要我们将该人的行动与他体验自身情境的方式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一情境中，他与我们发生了联系。同样，这门艺术也意味着，以我们所了解的该人的现在去理解他的过去，同时并不排除其他途径。在有些情形中，该人的行为表明，他拒绝与我们发生联系，拒绝与我们一道生存；这时我们觉得他无视我们的生存，或仅仅以该人所希望和焦虑的方式生存。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中，上述的理解方式仍然是正确的。我们并非以某种僵硬的方式把某些预定的意义附缀于该人的行为之上。相反，如果我们把患者的行为看作“病征”，那才是把我们的思想方式强加于患者，结果正与患者对待我们的态度相似；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解释”患者的现在，把它看作一成不变之“过去”的机械结果，我们也就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用这种错误的方式面对患者，那就几乎无法理解患者希望告诉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再来考虑听某人讲话的例子。设想我面对你讲话，而你试图：（1）从我的讲话中找出不正

常的地方；(2) 推测我的脑细胞中正在进行的新陈代谢，并据此解释我讲话的含义；或者，(3) 通过我过去的生活史以及社会-经济背景，推测为什么我此时此刻要说这些话。然而，这三种方式中，无论哪一种都无法让你真实地理解我的用意。

我们可能充分了解狂郁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性和家庭因素，可能辨认精神分裂性个体的“自我(ego)扭曲”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缺陷，也可能懂得各种障碍，如思维障碍、记忆障碍、知觉障碍等等，总之，我们可能知道有关精神分裂症病理学的全部知识，但是却不能真正理解任何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实际上，这种错误的方式本身就不可能理解患者。它试图“客观地”观察“病征”，这与把患者当作人来关注和倾听的态度有天渊之别！这就好像从前面那幅图形中，有些人看到杯子，有些人则看到面孔！

当然，正如狄尔泰所说，古代文献的破译者有权假定：在他与原作者之间，尽管相隔着漫长的历史年代，世界观也相去甚远，然而，生存环境和经验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他与他人都是生存于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时空中永在。但仅仅是这一个假定的话，还不能用于精神病患者，因为理解与我们同在的精神病患者，比理解古代象形文字的作者可能更为困难。然而，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正如沙利文

(H. S. Sullivan) 指出, 无论怎样, 精神病患者最终仍是“地道道的人”。医生与患者的人格, 并非相互对立, 并不像两件不相关的事情。相反, 两者能够对话, 能够比较, 这与破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并无区别。跟破译者一样, 医生也必须善于改变自己, 以便进入另一个陌生的甚至是错乱的世界。此时, 他将用精神病患者的方式去感受事物, 同时又需要保持清醒。只有如此, 才有可能达到对患者之生存状态的理解。

我所说的“理解”, 并非指单纯的智力活动。要谈理解, 就必须谈到爱。然而, 没有哪个词比这个词受到更多的玷污。我们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必要的(尽管并非充分的)能力: 了解患者如何体验他自己以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患者, 我们就难以付出真正的“爱”。《圣经》要我们爱自己的邻人, 然而如果不知道邻人是谁, 也就无法去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爱他抽象的人性。我们无法去爱一群“精神分裂症症状”。关键在于, 没有人会像得感冒一样得精神分裂症。他并没有“得”精神分裂症, 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只有在充分尊重其本来状态的前提下,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 他自己最后也会发现这是可能的。因而, 治疗者的爱与恨, 都与患者至为相关。我们怎样看待患者及其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患者怎样看待我们。

沙利文(1892—1949): 著名美国精神病学家。对临床精神病学, 尤其是对精神分裂症的心理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证明不管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多么古怪, 只要与之有足够的接触, 要了解他们还是可能的。

——译注

教科书中列举的许多“精神分裂症“征状”，在不同的医院中也表现得不同，这可以说是不同的护理所造成的结果。某些精神病专家所观察到的“征状”，出其他人观察到的要少得多。

因此我认为，弗利达·弗洛姆-赖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n)的下列思想的确是对的，尽管其表述多少有些混乱：

.....现在，精神病专家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从原则上说，建设性的医生-患者关系，是可以与患者一道创造的。如果没有做到，责任应归于医生的人格问题，而与患者的心理病理无关。(1952年，第91页)

当然，正如从前面克雷佩林的那位患者身上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对医生的反应和感觉，只是部分地根据医生自己认可的身分(identity)，另一部分则根据他关于医生(是什么样的人)的幻觉。医生试图使他认识到，他的反应和感觉中包含着某种幻觉，他自己很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处于无意识状态)。然而，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想使这种引导方式变得

时下已有大量文献支持这一观点，例如可见：《在精神病院里》一文(见《柳叶刀》杂志，1955年，第6期)。——原注

identity一词一般译为“同一性”、“统一性”、“身分”等。译本将根据上下文分别译为“身分”或“统一性”；在译本中，两者的基本含义都侧重强调生存论范畴而非社会性范畴。不过，前者较为具体，后者较为抽象。

——译注

有意义，那么，这种幻觉仍然是必要的先决条件。

在两个正常人相处的情形中，可以设想，甲大致会根据乙自己的认可去认可乙，反之亦然。我希望自己的身分大致被对方认可，而不是被认为在煞费苦心模仿别人，也不会被看作伪善、说谎等等。然而，即便在双方都属精神正常的情形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冲突、误会、偏见等等。概而言之，这是因为：在自己认可的身分（为己之存在）和被他人认同的身分（为他之存在）之间，存在着分裂。

这就是说，在双方都属精神正常的情形中，看来需要彼此身分的相互认可，其中包含着下列基本要素：

1. 我根据他人的自我认可去认可他人。
2. 他人根据我的自我认可而认可我。

双方都有自我认可，对自己的身分都有自主的感觉。我期望你认可我，期望看到：你对我的看法，与我自己的看法大体上一致。注意，此处之所以说“大体上”，是因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问题就在于：如果双方的差异足够严重，而且事实上证明又无法调和，那么就只能认为，两人之间必有一人精神异常。例如，只要发生了下列情况中无论哪一条，我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对方视为精神病：

他说他是拿破仑，而我认为并非如此；
他说我是拿破仑，而我认为并非如此；

据说，有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测谎器的检查。测谎器问他是否是拿破仑，患者回答说：“不。”测谎器判定他在撒谎。——原注

他认为我想诱惑他，而我认为，我并未提供任何根据使他认定我有如此企图；

他认为我担心他会谋害我，而我并不担心，而且并未提供任何理由使他这样认为；等等。

在这里，我提出如下的看法：

精神正常和精神错乱，是由两人之间联系或分裂的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两人之中，有一人被公认为是精神正常的。

把一位患者判断为精神病，其关键因素在于，判断和被判断双方之间存在分裂，缺乏协调。

当别人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存在特殊的破裂，我们就叫他“精神病”。仅仅因为这一类人际关系的破裂，我们就着手对别人进行尿检，从他的脑电波图形中寻找反常曲线。

那么，精神正常和精神错乱之间的界线（或分裂），其本质是什么，在此有必要略作进一步的探讨。

设想某人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不真实的人”，如果此人既未说谎，又非玩笑，也不是用某种微妙的方式表达复杂难言的思想，那么，他无疑会被认为患了妄想症。然而，从生存论上说，他的妄想症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他的确没有开玩笑，也并非装神弄鬼。相反，他实际上是想说：他多年来一直自称为真实的人，到今天，他再也无法继续自欺欺人了。

他的整个生活一直被暴露自己和隐瞒自己这两种欲望所撕裂。与他相比，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只是，我们或多或少找到了满意的解决。我们承认有自己的隐秘和需要，我们

或许能忆起自己的童年，那时，父母最初能看透我们的心思。但终于有一天，我们怀着恐惧与颤栗撒了第一次谎，并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孤独，同时也明白了，我们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留下的，只是一些足迹而已。这种真实的隐私为真实的关系提供了基础。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充分实现自己，达到我们所达到的状态。那些被我们称为“精神分裂性个体”的人，在他人面前会觉得比我们暴露，比我们脆弱，比我们孤独。正因为如此，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说，他是玻璃做的，透明而空虚，苍白而脆弱，无力承受他人的注视。他人的眼光会把他看穿，将他粉碎。可以说，精神分裂症患者正是这样体验自身的。

我们将指出，正因为这种极度的脆弱，所谓“不真实的人”才变得那么满足于自我隐瞒。哭喊出于高兴，微笑意味着伤心，皱眉头表示同意，鼓掌喝彩却因为不快。他心里在说：“你看到的都不是我。”然而，问题在于，只有通过我们实际看到的一切，他才可能是现实中的人。如果他的行动没有表现他真实的自我，他的确就是不真实的，这时他完全是象征性的、含糊的，是一个纯粹虚空的、潜在的、想象的人，是一个“神秘的”人；这时没有什么“真的”。但是，如果他不再假装他本来所不是的人，如果他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那么他就会像基督，或者像魔鬼，但不像人。他没有用身体去生存，正因为如此，他是无人（no-body）。

有关他之“生存状态”的“真理”是通过活生生的行为体现出来的。只有表现在生活中的“确实的”真，才是“生存上的”真。

无疑，对大多数人而言，“确实的”真只存在于自然界，或者只存在于我们的语法中。当一个活人说自己已经死了，这听起来的确很奇怪。然而，他已经死了正是他的“真理”。或许，普通的（即公众的）语言规范只允许他这样表达自己；而他想要说的是：他“确实”死了，“名副其实地”死了，而不仅仅是象征性地死了，“在某种意义上”死了，或“好像”死了！不仅如此，他还认真而执着地将自己的真理诉诸人，用自己的真理对公众的真理进行重新评价。为此他必须付出代价，即“成了”疯子，因为公众认可的真正的死亡是生物学上的死亡！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绝望的，是彻底绝望的。就我所知而言，没有哪位患者认为自己像人一样曾得到过圣父、圣母，或其他人的爱。他要么就是上帝，要么就是魔鬼；要么就是地狱里的冤魂，形影孑孓，远离上帝。如果有人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自身存在的经验，表达他那赤裸裸的、触目惊心的真理，极为严肃地告诉我们他不真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死了，那么，这就是疯狂。

我们能做些什么？理解他？我们无法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自身的经验之核心。只要我们依然正常而他还在发疯，我们就始终无法理解。在我们的世界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可能不失败。我们局限于自身世界之内，用我们自己的范畴对他加以判断，以为这样就能理解他。他不需要这样的理解，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彻底承认他的独特和差异，承认他的

独立和孤独以及绝望。

不理解绝望，就无法理解精神分裂症。特别参见克尔凯郭尔：《死亡的疾患》，1954年；宾斯万格：《艾伦·韦斯特病案》，1944—1945年；法布尔（Leslie Farber）：《临床所见的绝望》，1958年。——原注

第三章 存在性不安

(Ontological insecurity)

现在，我们可以对我们临床研究的性质作出较为精确的表述。一个人也许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完整的、在时间上连续的人。作为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切身进入世界，与他人相处。世界和他人在他的经验中也同样真实、生动、完整和连续。

这样一个基本上有着存在性安全感的人，他对自己和他人的现实性和统一性，具有根本上是稳定的感觉，他会带着这种感觉遭遇到生活中一切事件：社会的、伦理的、精神

ontology 一词与德文中 Ontologie 一词同，一般译为“本体论”，但该词原意实为“存在论”（参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附录一）。而且后者也与本页原注的理解相同。译本将 ontology、ontological、ontologically 分别译为“存在论”、“存在论（上）的”或“存在性的”，以及“存在论上”或“存在性上”。——译注

对“存在论”一词，哲学家们（尤其是海德格尔、萨特、蒂利希）有自己的用法。我对这一词的应用，则是依据其现有的经验意义，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它是“存在”一词的最佳派生副词或形容词。——原注

的、生物的。这样的人不仅感到完整的自我身分和统一性，还感到事物的永恒性、自然过程的可靠性和实在性，以及他人的实在性。要这样一个人改变自己进入另一个体的世界，而后者经验也许完全缺乏任何无可非议的、自我肯定的确定性，那多半是很困难的。

我们的研究与这样的问题有关，它涉及到部分甚至完全缺乏安全感的情形，这些安全感产生于某种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我称之为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我们的研究与焦虑与危险有关，我认为，这些焦虑与危险只是基本的存在性不安的产物。我们的研究还与解决这些焦虑和危险的意图有关。

在存在性安全感和存在性不安这两种基本的生存状态之间，我希望作出某种比较，指出它们的对立。然而，文学批评家特里林 (Lionel Trilling) (1955 年) 已经做过这一工作。他比较了两个世界：莎士比亚和济慈的世界，以及卡夫卡的世界。特里林写道：

.....对济慈说来，对于恶的意识，与极为强烈的个人身分感并存，相形之下，恶的意识立即就不那么明显了。而对于这种情况，某些当代读者则会说：相形之下，恶的意识不那么强烈了。同样地，如果比较莎士比亚和卡夫卡对人之痛苦及普遍异化的揭露（而不考虑他们各自的天才），那么当代读者会认为，是卡夫卡而不是莎士比亚作出了更为强烈和更为全面的揭露。这一判断可能的确是对的，而这正好是因为，对于卡夫卡说来，个人身分感并未抵消对于恶的意识。莎士比亚的世界正是帕

斯卡眼里的世界，与卡夫卡的世界大致相同，是一间牢房。在这牢房里每天都在死人。莎士比亚迫使我们看到生活中残酷的非理性力量，通过唱幕人告诉我们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让我们领略那些淘气的诸神，他们折磨我们，却并非出于惩罚，而是因为高兴。他并不比卡夫卡作得差。同样地，跟卡夫卡一样，莎士比亚也被这牢房里的恶臭熏得痛苦不堪，没有谁能比他更为深刻地描写恶心与呕吐。然而，在莎士比亚的牢房中，那些牢友却比卡夫卡牢房中的牢友要好得多。那些船长，那些国王，那些情侣和爱人，那些丑角，那些稚拙的乡下佬，他们一个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完整无缺，到死方休。与此不同，在卡夫卡的牢房中，在死刑判决被执行之前很久，甚至在邪恶的法律程序被确定下来之前很久，某种可怕的结果就已强加在了被告身上。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他被剥夺了作为人的一切，只剩下抽象的人性，就像他自己的骨架，像一具骷髅，那是绝不可能作为人的。他没有父母，没有家，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承诺，甚至没有嗜好；而可能伴随着这些人生内容的权力、美、爱、智慧、勇气、忠诚、名誉、骄傲等等，都与他无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卡夫卡关于恶的认识是完整的；他没有用关于健全而合理之自我的认识与之对立。而莎士比亚关于恶的认识，却存在着极大的内在冲突。（第 38—39 页）

正如特里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发现，莎士比亚的确刻

画了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被各种各样的疑难所困扰，被各种各样的冲突所撕扯；然而不管怎样，他们显然觉得自己始终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完整的。卡夫卡却不是这样。

的确，在这样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活着是什么样子？努力探讨和表达这一点，构成了当代若干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人们活着，仅此而已。

例如，在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作品中，人们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没有与“健全与合理的”自我相冲突的感觉，就这样来缓解生存的绝望、恐惧和厌烦。《等待戈多》中那两个流浪汉就这样无可奈何地、得过且过地活着，等待着戈多：

埃斯特拉根：我们总是在找什么东西，是吗，狄狄？
好让我们感觉自己还活着？

弗拉狄米尔（不耐烦）：是啊，是啊，我们是魔术师！
可还是让我们赶紧抓住——已经抓住了的，趁着我们还没忘记。

在绘画中，培根（Francis Bacon）与其他画家一道，也处理了类似的主题。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将从临床的意义

贝克特（1906— ）：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著名生存论作家，剧本《等待戈多》的作者。——译注

戈多是《等待戈多》中一个完全是莫须有的、始终没有出现的人物。

——译注

上加以讨论的东西，只是问题本身中很小的一部分。问题本身深深地牵涉到人的本性，我们只能达到十分有限的理解。

让我们从头开始。

生物学意义上的诞生是一种确定的行为，它把婴儿抛入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一个新生命产生了，这是一个新的生物实体，它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而且始终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然而，婴儿自己怎么看呢？在一般情况下，生理的诞生开启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结果，在极短的时间内，婴儿就能感觉自己是真实的、活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实体，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确定性。简言之，生理的诞生以及生物学上活着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婴儿就会获得生存意义上的诞生，变成真实的、活生生的。这一发展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它产生出最基本的确定性，这一确定性是所有其他确定性的基础。这就是说，不仅成人把孩子视为真正在生物学上有生存发展能力的实体，而且，孩子也把自己经验为完整的人，是真实的，是活生生的，同时还把他人也经验为真实的、活生生的。这就是经验的自我肯定。

这就是说，个体可以将自己经验为真实的、活生生的、完整的；在通常环境中，他与周围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他的身分和意志自由也都毫无问题；他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在性、真实性，以及内在的价值；他具有空间上的扩张性；最后，他既然降生于世，就决定要走向死亡。要是这样，个体就获得了存在性安全感坚固的核心。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通常环境中生活的个体，更容易感觉不真实；从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说，更容易觉得自

己僵死而不生动；而且，他会发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区别也是不确定、不安全甚至是危险的；以至于，他的身分和意志自由也始终成了问题。他可能会感觉不到自身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感觉不到稳固的内在一致性和内聚性，更容易感觉不实在而不是相反，无法断定自己的禀赋和素质是真实的、美好的、有价值的。最后，他会感到自身自我与身体在某种程度上的分离。

无疑，当个体对自身的经验是如此这般，那么，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中，相反，生活“在他自身之内”倒比较安全。如果把他与另一些个体相比较（那些个体安全地建立起健全合理的自我感觉），与他们的世界相比，他的世界就将整个是另一种“样子”。因而，与他们相联系，进入他们的世界，在他看来就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个体自身的存在在基本的生存意义上是安全的，那么，展望和发展与他人的联系，对他来说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相反，缺乏存在性安全感的人则无法享受这样的愉快，他会坚持自我，固执己见，因为：通常的生活环境威胁到他低阈限的安全感。

如果个体获得了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那么，通常的生活环境就不会构成对他自身生存的持续威胁；反之，个体就会感到持续的、致命的威胁。

这一表述与另一些作者〔特别是沙利文、希尔（Hill）F·弗洛姆-赖希曼，以及阿里尔蒂（Arieti）〕的表述十分相近。费登（Federn）的表述虽然大不相同，但其基本的观点仍然与之相近。——原注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理解某些精神病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如果个体不能把自己及他人的真实性、生动性、意志自由及身分视为当然，那么，他将苦苦挣扎，力图变得真实，力图保持自己或他人的生动，力图维护自己的身分，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努力避免失去自我。就这样的个体而言，大多数人每天都要遇到的那些事情（它们没有特殊意义，因而难以引起注意），对于他却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他存在的本质，也可能使他面临非在（non-being）的威胁。

对于这样的个体，世界的基本成分将具有（或已经具有）与通常情况不同层次的意义。用我们的话说，这样的个体将开始（或已经）“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之中”。然而，如果不经认真细致的鉴别，我们不应轻易下结论说：他与现实“失去了接触”，退回了自身。实际情况是，外部事件对他的影响与对他人的影响不同了：一般说来，它们对他的影响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大了。一般说来，他并未变“冷淡”，并未“退缩”。但是很可能，他的经验世界再也无法与他人共有了。

然而，在探讨这样一些发展过程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三种不同的焦虑形式，它们见于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个体。这三种焦虑分别是：吞没焦虑（engulfment）、爆聚焦虑（implosion）、僵化焦虑（petrification）。

1. 吞没焦虑

在一个分析小组的讨论班上，两位患者正展开辩论。其

中一位突然表示退出，他说：“我无法继续下去了。你是为了得到战胜我的快感而参加辩论的。无论胜负，对你都不过是一场辩论而已。可我参加辩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

患者是一位年轻人，在我看来他的精神是正常的。然而正如他自己指出，他参加辩论的目的，以及他的其他生活内容，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愉快，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他的确认为辩论的失败将危及他的存在，那么他就“完全失去了与现实的接触”，真正成了精神病患者。然而，这种设想只是在搪塞问题，对理解患者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用精神病学教科书所推荐的讯问方法去对付这样的患者，那么不出 10 分钟，他的言行就会表现出精神病的“征状”。在生活中，一些人的基本安全感是那么可怜，以至与他人的任何一种实际联系，都会威胁到他的存在，而无论该联系是多么薄弱、多么“无害”。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很容易诱发出精神病的“征状”。

为了与他人相联系，人需要一种坚实可靠的自主性身分感。然而，在生活中，任何联系都会使个体面临丧失身分的危险。由此产生的焦虑就是所谓的吞没焦虑。在吞没焦虑中，个体畏惧与他人他物的联系，甚至畏惧与他自己的联系。这是因为他没有感到稳定的自主性，因而，他害怕上述联系将导致他之自主性和身分的丧失。

吞没焦虑并未被简单地设想为这样一种状态：哪怕个体尽一切努力加以避免，它也照样发生。在吞没焦虑中，个体把自己经验为这样一个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自己，使自己免于被那最恒久、最有力、最绝望的行为淹没。对

于当事人来说，吞没是一种危险：被理解（即被把握、被了解）的危险、被爱的危险，甚至仅仅是被看见的危险。由于某些其他原因，人害怕被恨；然而，与被爱所淹没、所毁灭相比，被恨就不那么令人不安了。

陷于吞没焦虑的个体，其用以维护自身身分的主要手段是孤立。也就是说，他不是正常的、以个体自主性为基础的独立与联系之间寻找平衡，而是在存在的完全丧失（被他人吞没）或彻底孤立之间走极端。如果个体双方各自都很自信，而且都能“把自己失落”给对方，那么，他们就只能彼此吞没，或彻底孤立；在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第三种安全的、辩证的关系，不可能存在一种健全的存在之融合。只有在一种“本真的”情形，只有当个体双方都有自信并且彼此信任时，才会产生这种辩证的融合。如果一个人恨自己，他就可能希望把自己失落给他人，假借被他人吞没来逃避自己。就眼下的讨论而言，这正是个体所畏惧的可能性，但后面我们将表明，在某一“刻”令人畏惧不已、拼命逃避的东西，到后来可能成为这个人努力追求的事情。

回到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上来。对于正确的心理治疗来说，吞没焦虑说明了一种所谓“负治疗反应”。在吞没焦虑中，被正确地理解，反倒成了被吞没、被包围、被吞食、被淹溺、被吃掉、被笼罩、被窒息，一句话，被他人包容一切的理解所毁灭。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虽然孤立是可怕的，虽然始终被别人误解是孤独的、痛苦的，然而在孤立中，至少有着某种程度的安全。

这就是说，他人之爱比他人之恨更叫人害怕。被他人所

爱，相当于置身于强制性的承诺之下。要治疗这样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装作比原来更“爱”，更“关心”。医生应将“帮助”患者的必要而复杂的动机真正转化为对他的关心，目的是为了“随便他”，而并不是真要吞没他或冷淡他。越是如此，治疗就越有希望。

个体的身分在与他人之联系中受到威胁，人们常用各种意象来刻画这些联系。此处可列举一些与吞没恐惧密切相关的意象：被埋葬、被淹溺、被流沙活埋，等等。火的意象一再出现。火，或许正是个体内在生命之闪烁不定的象征。火，或许正是一种破坏性的异化的力量，它使人失去一切，让人毁灭。某些精神病人激动地向我们诉说：他们着火了，他们的身体在燃烧。一位患者说他冰凉又枯干，但同时他又畏惧温暖和潮湿。他害怕被火或水淹没，那同样是一种毁灭吗？！

2. 爆聚 (implosion)

我用“爆聚”这个词来表达温尼卡 (Winnicott) 所谓“现实冲击”(impingement of reality) 的极端形式，我认为再也找不到比爆聚更强烈的词了。在某些患者看来，世界注定要在某一时刻坍塌，使他失去全部身分，就好像突然涌入的空气使一个虚空顷刻消失。我认为，冲击一词未能充分表达这种经验中的恐惧。个体感到自己就像虚空一样。虚空就是他。尽管他也渴望这虚空被填充起来，但他最终仍然畏惧被

爆聚，向内的爆炸，与爆裂 (explosion)，即向外的爆炸反义。也可译为内破裂、压爆等等。——译注

填充，因为他感觉到，他命中注定只能是虚空，只能是可怕的无物、无人。因而，与现实的任何“接触”，对他来说都是可怕的威胁，因为在他看来，现实必然是爆聚性的；从而，对于他自己所能设想的任何身分，现实本身都表现为一种威胁，就像吞没焦虑中与他人之关系是对自身身分的威胁一样。

当现实使个体面临吞没和爆聚的威胁时，它就成为患者痛苦的根源。

事实上，如果以这种经验方式生活，我们都将脆弱不堪，就像一只只能承受两、三度变化的温度计，一个小小的打击、一次低热，就会导致致命的冲击，使我们感到世界末日的降临。

3. 僵化和非人化

对于所用的“僵化”一词，可以先探讨它的几种含义：

(1) 一种特殊的恐惧形式。在这种恐惧中，个体被僵化了，换句话说，被变成石头。

(2) 对上述恐惧的害怕：害怕由一位活人变成或被变成死物，变成石头，变成机器人，变成自动装置，没有行动的自主性。

换句话说，变成没有主体性的东西。

(3) 一种“巫术”行动，施行者试图将某人“僵化”为石头；进一步，还可以指这样的行动，施行者否定他人的自主性，无视他的感情，视他为物，摧毁他的内在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更恰当地说，施行者将他人非人化了，物化了。施行者不把他人看作人，看作自由的主体，而是当成

一样东西。

非人化是一种技术、一种手段。当他人变得太让人厌烦时，就常常用这种手段去对付他。这时，当事人不再让自己对他人的感情作出反应，并准备将他人当作没有感情的东西加以处理。这里谈到的当事人具有两种倾向：感觉自己或多或少被非人化；同时又对他人进行非人化。当事人始终害怕被他人非人化。对于他来说，把他变成一样东西的行动就是僵化。当他自己被当作一样“东西”时，他的主体性就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脸上的血也一样，因而这时他脸色苍白。基本上说来，他需要不断从他人那里证实自身的生存。

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进行部分的非人化，是一种广泛运用的手段，人们即便不着意追求这种手段，也将它视为理所当然。大多数人际关系都以某种部分的非人化倾向为基础。当事人不管他人如何看待他人自己，不管他人本身是什么，而将他人实际看作机器人，正扮演某个角色；或看作一架大机器中的部件，而当事人自己，也许正是其中另一部件。

人们常常抱有美妙的幻想，认为生活中会有这样一个生存空间，虽然有限，但其中却不存在非人化之虞。然而，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空间，我们会感到更大的危险；而在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这一危险存在于下面这种状态之中：如果个体把他人经验为自由的主体，那么他就有可能把自己经验为自身经验的客体，就有可能感觉失去了主体性。这使他面临这样的危险：他可能变成他人世界中的某样东西，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

自身的存在。由于这样一种焦虑的存在，把他人经验为人，对于当事人无疑于自杀。在《存在与虚无》的第三部分，萨特对这一经验作了出色的讨论。

我们的问题总的来说在向前发展。个体可能会发现，他人赋予自己生机，提高了自己的存在感；另一方面，个体也可能发现，他人使自己变得贫乏空洞，死气沉沉。个体可能认为，与他人的任何关系都会导致后一种结果。要是这样，任何他人都是对他“自我”（即自主性行动的能力）的威胁，其原因并不是他人所作的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正是他人的生存。

詹姆斯是一位 28 岁的化学家，他的生活对上面的若干内容作出了说明。

詹姆斯（James）一直抱怨说，他不能成为一个“人”，他“没有自我”。“我仅仅是他人的反应，没有自己的身分。”（在后面第五、六章，我们将有机会详细描述当事人的这种感觉：不是自己真正的自我，只是虚假的自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变成“一个神秘的人”，没有重量，没有肉体，“像只软木塞在海上漂浮”。

詹姆斯最关切的是他没有成为一个人，他把这一点归咎于自己的母亲：“我仅仅是她的标记而已。她从未认可我的身分。”他感到自己渺小，没有确定的身分；与此相应，他感到随时有可能被可怕的现实压倒和摧毁，虽然他人却能容纳这同样的现实。他感觉自己没有重量，感到自己的不确定性、非实在性；相反这些感觉本身却是沉重的、确定的、明显的、实在的。詹姆斯感到，在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他人都比他“高大得多”。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詹姆斯却并不容易被吓倒。他常常用两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感：其一是表面上顺从他人（见第七章）；其二，他在内心深处对他人保持着一种可怕的理智态度，一种僵化他人的倾向。两种手段合起来，维护了他的主体性。他从未背叛自己的主体性，同时，这一主体性也不可能得到直接的、及时的表达。正由于这种隐秘性，所以它是安全的。这两种手段合起来，使詹姆斯有可能逃避被吞没和非人化的危险。

詹姆斯说，他不过是大海上一只软木塞。他用表面上的行为预先防止了随时威胁着他的危险：变成他人的东西。（的确，在大海上，还有什么比软木塞更安全呢？）然而与此同时，他却把他人变成自己眼中的一样东西，悄悄地解除了敌人的全部武装，也解除了自身的危险。在他看来，通过摧毁作为人的他人，他就剥夺了他人的力量，使得他人无法摧毁自己。通过抹煞他人的生动性，将他人视为机器而不是人，他就解除了这种生动性对他的威胁，使得他人的生动性无法吞掉他，爆聚到他自身虚空之中；或将他变为附庸。

詹姆斯的妻子是一位生动活泼的女子，情感丰富，精神高雅，个性有力，头脑清醒。詹姆斯与她保持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关系：一方面，他感到完全孤独和疏离；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像只寄生虫。例如，他梦见自己像只海贝，吸附在妻子身上。

詹姆斯的梦揭示出隐藏在梦境后的更大的需要：将他的

妻子仅仅看作一件东西，一架机器，或者一艘船。他以“临床的”精确性描述妻子的笑声、忿怒和忧伤，甚至把她叫作“它”，听起来真叫人不寒而栗。例如，“然后它便笑起来。”她被看成“它”，是因为在詹姆斯看来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可预见的、确定的反应。例如，他告诉妻子（它）一个普通的笑话，如果她（它）笑了，他就认为这表明了她的（它的）本性像机器人一样，是被“调节”好了的。此时他用以描述的术语，跟某些精神病学理论用以描述人类行为的术语相差无几。

最初，詹姆斯表现出明显的能力，对我所说的内容表示不同意或表示同意。我对此很觉意外，也感到高兴，这似乎表明他有头脑，甚至超过他自己的估计，也似乎表明他并不十分害怕暴露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后来我发现，他这种能力只是表面上的，他的行为看上去像有自主性，实质并非如此。实际上，他是在悄悄运用上面揭示的秘密手段对付我，不把我看作有自我身分的人，而是看作机器人；他只需输入指令，我就会通过快速运算向他输出信息。正是这种秘密手段使他显得像个“人”。显然，詹姆斯没有承受正常的人与人关系的能力。

詹姆斯这一类人常常做这样的梦：它们表达了上面讨论的某种焦虑和畏惧。具有存在性安全感的人们，也会产生被别人吃掉的恐惧。詹姆斯他们的梦与这些恐惧并没有什么不同。被吃掉并不必然意味着丧失身分。约拿 就曾经身陷鲸

海贝常常吸附在船体上寄生。 ——译 者

约拿，《圣经》中的希伯来先知。 ——译 注

腹。很少有噩梦会使人害怕真要丧失身分,从而产生焦虑。这通常是因为,大多数人无论在实际中或是梦中遇到什么危险,他们仍然作为人存在:可能受到攻击或伤害,但基本的生存性内核本身并没有丧失。典型的噩梦总是使人因恐惧而惊醒,但这种恐惧并不是害怕丧失“自我”。一位患者梦见一头肥猪坐在他胸膛上并试图闷死他,他恐惧地醒来。在这个噩梦中,患者最坏不过是有被闷死的危险,但他的存在并未受到解体的威胁。

把威胁到自己身分的母亲或其他女性形象变成一样东西,这也是一种防卫手段,它也常常出现在患者的梦中。一位患者反复梦见屋角有一个小黑三角形,它越长越大,眼看就要把他吞没,在这当儿他总是在极度恐惧中醒来。这位年轻的精神病人与我的家庭一道生活了几个月,因而,我对他有相当了解。就我所知,只有听爵士乐才能使他“放松”,而不为希望重新找回自己的焦虑所折磨。

女性形象即便在梦中也受到如此的非人化,这一事实说明女性形象对患者自我的严重威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大概是女性形象本身受到的各种可怕的非人化,以及正常非人化过程的失败。

博斯(1957年,a)曾给出几个梦作为案例。做梦的人后来都患了精神病。其中一位妇女梦见自己被火吞没:

一位年近30的妇女在患病之前,曾梦见自己在一片马厩里燃烧起来。在她(火)的周围,渐渐形成了越来越厚的熔岩层。半从体外,半从体内,她能看到火怎样

慢慢被熔岩层窒息。忽然间，宛如魔鬼附身，她整个人置身火外，抄起一根棍子打火，试图敲破硬壳，放空气进去。但一会儿，她累了，火（她）渐渐熄了。4天之后，她患了急性精神分裂症。这个梦从细节上准确地预示了患者的特殊病程。她开始变得僵硬，最后完全封闭。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像在梦中一样拼命搏斗，试图使自己的生命之火免于被窒息的命运，直至身心交瘁，变成了一座死火山。几年过去了，她依旧如此。（第 162 页）

在另一个例子中，当事人梦见了他人的僵化，预示了当事人自己的僵化：

……一位 25 岁的姑娘梦见自己做好了晚餐。她摆好饭，叫父母和弟妹用餐，可是没人应答。只有自己的声音传回来，就像是一个深邃的洞穴的回声。她毛骨悚然，感到整个屋子空无一人。她冲上楼，在第一间卧室内，看见两个妹妹分别僵坐在两张床上，毫不理会她焦急的呼唤。她走过去试图摇醒她们，但突然发现她们是两尊石像。她恐怖地逃进母亲的卧室，可母亲也变成了石头，呆坐在扶手椅里，眼睛瞪着半空中。绝望中，她只好逃向父亲的屋子。父亲站在屋子中央。她奔向父亲，渴望得到他的保护，紧紧抱住父亲的脖子。可是，父亲也是石头做的。使她更为恐怖的是，在她抱紧父亲脖子的时候，父亲就从石头又变成了沙子。她在无以复加的恐怖中醒

来，被梦中的经历震撼，久久不能动弹。在以后几天之内，这一恐怖的梦境又接连重复了4次。当时，患者身心健康，堪为楷模，被父母称为家中的阳光，视为全家的骄傲。从噩梦重复4次之后10天开始，患者发作了急性精神分裂症，表现出严重的紧张症状。她陷入僵化状态，跟她梦中家人肉体上的僵化极为相似。她虽然活着，却被彻底打垮了。（第162—163页）

看来，一个普遍的规律是：正是那些最令人害怕的危险，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实际上常常不会发生。因此，放弃自己的自主性，反成了维护自身自主性的秘密手段；而装病、装死，则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生动性〔见奥本多夫（Oberndorf），1950年〕。把自己变成石头，是为了免得被别人变成石头。尼采呼唤：“坚强起来。”但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尼采自己并不想变得硬如石块。也就是说，假装死亡，梦见死亡，或以某种方式演出死亡，其意正在避免被他人变成僵死之物。同理，彻底理解自己（吞没自己），也就预防了被他人吞没的危险。最后，用自己的爱消耗自己，便阻止了被他人消耗的可能性。

采用适当的手段攻击他人，看来也建立在相同的原则之上，也就是说，个体感到，在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之中，隐含着他人对自己的攻击，正因为如此他才攻击他人。因而，当一个人害怕自己的主体性被他人淹没、冲击或封闭，他就会反过来试图淹没、冲击、消灭他人的主体性。由此产生恶性循环；换句话说，想要通过抹煞他人的个体性来维护自己的

自主性和身分，只会越走越远。这是因为，对他人存在性地位的每一种否定，都是对自身存在性安全感的削弱，而他人对自我的威胁则变得更为强烈，因而更需要加以否定。

从个人自主性的意义上说，在上述损害中包含了这样的失败：个体无法与他人一道维持自己之为人的感觉，也无法独自维持这种感觉。同时，个体无法独自支撑他自身的存在感。这是自我实现（to be）的失败，是独自生存的失败。正如前面那位患者詹姆斯所说：“别人提供我的生存。”这似乎与前面讨论的那种畏惧（他人将剥夺自己的生存）相矛盾，然而真正矛盾或者说真正不合理的是，这两种态度在詹姆斯那样的人身上并存，正好形成他们这种人的整个人格。

对自身自主性的经验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意味着自己已经认识到，自己是独立于他人的。无论我对某人的欢乐或痛苦负有多大的责任，他终不是我，我也不是他。无论多么孤独多么悲哀，我仍只能独自生存。他人不是我，相应地，我身上属于他的东西只是部分的我。他也许死了，离开了，走了，但我属于他的东西依旧。只是我无法替他去死，他也一样。正因为如此（正如萨特评论海德格尔这一思想时所说），他不能代我去爱，不能代我去作决定，我也一样。一句话，他无法是我，我也无法是他。

如果个体感觉不到自身的自主性，那就意味着，他无法以通常的方式经验与他人的分离以及对他人之联系。缺乏对自主性的感觉意味着，个体感到自身的存在被束缚在他人身上，反过来他人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越出了人之关系结构中的实际可能性。这意味着，个体用对他人的存

在性依赖（即为了自身的在而依赖于他人），取代了本真的相互关系和依附。在这样的个体看来，如果不是彻底脱离和孤立，就只有像海贝或吸血鬼一样寄生在他人身上。这时，他人之血既是自己生存的前提，又是对自身存在的威胁。换句话说，他不是正常的分离和联系之间寻找平衡，而是在完全孤立或彻底融入之间走极端。他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他就像那些机械的自动玩具，上紧发条后便按既定程序作正向运动，到达某一点后又按既定程序调整为反向运动，直到又作正向运动，如此循环往复，摇摆不已。

患者詹姆斯声称，他人是他之生存的必要前提。另一位与詹姆斯类似的患者则采取如下行为方式：他让自己一连数月与世隔绝，独居斗室，节俭度日，玄思冥想。但他很快便感觉不对头，越来越空虚，“生活是进行性地贫乏”。他的骄傲和自尊大部分来自他自己的独立生存，然而，随着自身非人化状态的加重，他会突然闯入社会生活，来一次短暂的放纵，靠他人过一次“瘾”但“绝不过量”。就像一个酒鬼，实在熬不住戒酒的日子，便突然破戒狂饮一次，如此周而复始。跟酒鬼或吸毒者一样，他也对自己的瘾癖感到害怕、害羞和忏悔（差别只在于，他的瘾品不是酒精或毒品，而是他人）。他很快会感到，他又将掉入过去的泥坑，于是，怀着可怕的无助、疑虑和羞耻，他又会慌忙回到自己的孤立状态中去。

上面讨论的某些要点将在以下两个个案中得到说明：

个案 1，孤独感焦虑。R 女士遇到的麻烦是害怕上街（广

场恐怖)。通过较细致的观察发现，在大街上或类似的什么地方，只要她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就会产生孤独感焦虑。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只要她没有觉得自己真正是孤身一人，她就会自在起来。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她的过去。她是独生女，自幼孤单。家庭中没有公开的轻视、粗忽和敌意。然而她感到，父母彼此倒是十分关注，对她却不甚留意。长大后，她渴望弥补这一情感的空缺，可始终没有成功，无法自信。她希望在别人眼里自己总那么重要，不可忽视。她生活中不能缺少这样的人。爱和赞美当然最好，如果没有，憎恨也行，因为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被人忽视更糟糕的了。无论干什么，她都希望别人注意到她的重要性。她无法忘记自己的童年，那时，她在父母眼里真是轻描淡写，他们既不爱也不恨，既不赞美也不羞辱。

结果，她经常从镜子里面打量自己，但始终无法相信自己已是某人，始终担心镜子里并没有人。

直到她后来长成一位动人的少女，在 17 岁那年嫁给一位军官，这位军官真正注意到了她的情感 and 心理状态。对于她来说，特别具有意义的是，父母一直没有注意到女儿内心日益成长的不安，直到她宣布订婚为止。在丈夫温暖的关注之下，她感到满足和自信。可是不久，丈夫要去国外短期执勤，她无法随往。分离期间，她经历了严重的恐慌。

应该看到 R 女士当时对丈夫暂时离别的反应，并非是因渴念而导致的忧郁和悲伤。我认为那是一种恐惧：本来，她内心的某种东西已经开始得到丈夫持续的关注，赢得了生存

的权利，可随着丈夫的离去，那种东西又开始消散了。她好像一朵花，一日无雨，芳命其萎。然而，就在那时她母亲突然患病，使她摆脱了困境。父亲急切请求她帮助，希望她回家照看母亲。正如她自己所说，这一年，她与过去判若两人。现在她对这个家显得很重要，直到母亲去世，而她盘算离家与丈夫团聚为止，再没有表现一点恐慌的迹象。不管怎样，在最后这一年她终于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父母的孩子。现在，作为丈夫的妻子倒不是非要不可的事情了。

我们再一次看到，R 女士当时对母亲的逝世并没有什么悲哀。她当时注意的焦点仍然是对自己孤独的担心。母亲去世了；剩下的还有父亲；或许再加上丈夫，“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一点并不使她忧伤，而是使她恐惧。

在那以后，她到国外与丈夫团聚，过了几年快活的日子。然而，她无休无止地要求丈夫最大的关注，永不满足，但丈夫所能给予的越来越少。终于，婚姻破裂了。她回到伦敦，跟父亲住在一幢公寓里。在此期间，她作了一位雕塑家的模特并与他同居，就这样生活了几年，直到 28 岁。就在这一年我与她相遇。

R 女士这样谈论大街：“在大街上，人们来来去去，各自忙碌，没有人认识你，即便有，也不过点点头，最多也就聊几分钟。没人知道你是谁。大家只对自己感兴趣。没人关心你。”她曾看见有人在大街上晕倒，而其他人都漠不关心。“没人在乎。”正是这样的背景，这样一些想法，使她感到焦虑。

在父亲家里，虽然她经常也独自一人，但情况就不同了，

因为这时她从没有真正感觉到自己。她做早餐，收拾床，洗刷，要多慢有多慢。白天太漫长，但她并不太在意。“身边的东西都很熟悉。”这儿是父亲的椅子和烟斗搁架；那儿是母亲的像，从墙上望着自己。所有这些熟悉的东西，就好像用某种光辉照亮了这些屋子，而对于拥有或使用它们的人，那本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好像魔法似的，虽然她孤身在家，总感觉有人伴着自己。可是在嘈杂而陌生的繁忙大街上，魔法消失了，她只是一位无名的过客。

如果对这位患者盲目运用关于歇斯底里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就会得出结论说，这位女子被无意识的恋父情结所束缚，并且由此产生了无意识的罪感，以及无意识的惩罚需要和/或惩罚恐惧。这种理论会认为，R 女士最终未能摆脱恋父情结的束缚；由此可以解释她的所作所为。她决定与父亲住在一起，实际上是取代母亲的位置。作为一位 28 岁的女子，每天用大部分时间想着父亲，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同理，她在母亲病中所作的奉献是无意识罪感的结果，这一罪感源于她对母亲的无意识的矛盾心理；而她在母亲去世时感到的焦虑，实际上是她对自身无意识愿望（希望母亲去世）的焦虑。等等。

然而，R 女士生活中根本的或者说中心的问题并不是“无意识的”，相反，这一根本问题对她来说（正如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明显的（尽管她认识不到与她有关的很多问题）。

关于明显的“歇斯底里”症状之最有价值的文献，可参见塞格尔（segal, 1954 年）。——原注

她整个生活的根本问题在于，她缺乏存在自主性。如果没有了解她的人在场，或者，如果无法在其人不在时想象他在场，她就会感到自己身分的消失。她的恐慌是因为存在的消失。她就像一口破钟，为了生存，她需要别人相信她的生存。她的情人该是雕塑家，而她该是他的模特儿，这本是多么必要！她的生存需要别人认可，当无人认可时，她被焦虑所淹没，那又是多么必然！对于她来说，生存就是被感知，被注意，而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邂逅，作一位无名的过客。正是这种看法僵化了她。如果她被看作无名之辈、看作无人重视的对象，或被看作一样东西，那么她就什么也不是。她存在于别人眼中。如果此刻没有人注意她，她就只好用想象的魔咒呼唤出什么人（爸爸、妈妈、丈夫、情人，依当时情况而定），想象自己正与他们在一起。对于这些人来说，她感到自己像回事情，是个人。如果这些人离开了或死去，那么她真正感到的不是悲哀，而是恐惧。

R 女士的根本问题无法转换为“无意识的”问题。即便我们发现她还有着当妓女的无意识幻想，那也没有解释她的大街焦虑（广场恐怖），也没有解释她对那些晕倒在大街上却无人相助的女人的关注。相反，只有将这一无意识幻想归于她的根本问题，才能得到解释和理解。换句话说，问题仍在于她的自在（self-being）、她的为己之在（being-for-herself）。她的孤独恐惧并非是对乱伦的性幻想或手淫的“防御”。她的确有乱伦幻想，但这些幻想就跟她对于作女儿有着“固恋”一样，只是对孤独恐惧的防御，而不是别的。它们是克服孤独焦虑的手段。如果她的生存状态是另一个样子，如果她能够

从自身出发并向前发展,如果她像正常个体一样追求满足,追求快乐,那么,她的无意识幻想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然而,从根本上说,她的性生活和性幻想并不是为了追求满足和快乐,而是为了寻找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在作爱时,这种安全感就在幻想中达到了,而在此基础上,满足和快乐也就是可能的了。

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自恋这个词,如果把R女士的状态视为自恋,那都是极大的错误。事实上,她没有能力爱上自己的倒影。如果把她的问题转换成精神性欲的发展问题(口腔的、肛门的以及生殖器的等等),那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她是“一到年龄”,便抓住了性欲这根稻草。她并不性冷淡。在暂时得到存在性安全感的基础上,性高潮也能带给她生理的满足和快乐。与爱她的人(她有相信自己被某人所爱的能力)性交,带给她最美好的时光。但这爱是短命的,因为她无法承受孤独,也无法让她的爱人与她一道承受孤独。

R女士需要他人注意的心理状态,还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说法:她有暴露癖。但是我们再一次指出,只有从生存论的角度加以理解,暴露癖这一术语才是有意义的。而这又需要更详细的讨论。R女士“暴露自己”,然而她绝不“给出自己”。这就是说,她在暴露自己的同时又总是约束自己,封闭自己。因而,表面上她的问题是没有别人在一起,但实质上,即便有人在一起她也是孤独的。换句话说,她始终是孤独的,

自恋一词源于希腊神话,美少年那喀索斯因爱恋自己的水中倒影,结果憔悴而死。——译注

越是与别人在一道，她越是不相信。显然，她对别人自主性生存的认识，与她对自身的自主性的信念一样脆弱。如果别人不在眼前，对于她来说，就相当于不存在。在性高潮中，通过拥有拥有她的男人，她拥有的是她自己。但她无法是她自己，无法靠自己成为自己，从而无法真正成为她自己。

个案2，在这里我们要考虑目前最奇特的人格现象，人们已经对之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观察研究，但至今未有满意的解释。在这种情形中，个体似乎是一个人格容器，其中装着一种非他自己所有的人格。也就是说，另外一个人的人格似乎“占有”了他，并通过他的语言和行动表达自己，在此期间，个体自身的人格却暂时“丢失”或“离开”了。与此同时，个体表现出各种恶意行为。这种人格现象分布甚广，既有简单的、良性的表现（所谓“跟他爸爸学的”，或者“跟她妈妈的脾气一模一样”，等等），又有极端的表现。在后一种情况中，患者极度痛苦，感到承受着可怕的压力，使他被迫要采取一种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征他并不喜欢甚至憎恨，或者与他自己的人格特征完全不一样。

在不情愿和被迫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导致身分感崩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害怕发生这种现象，也是吞没恐惧和爆聚恐惧的因素之一。这时个体会害怕喜欢任何人，他发现自己受到这样一种压力：他会变得跟他喜欢的人一样。后面我将试图指出，这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动力之一。

在这种现象中，个体的自我和人格受到那样一种异己的亚身分（sub-identity）之深刻修饰，以至使个体产生了吞没

焦虑，害怕失去自己的身分和现实感。下面的病案对此给出了说明：

D 女士，40 岁，她对病痛的诉说表面上含糊不清，其实表达了强烈的恐惧。她说她害怕一切，“甚至天空”。她说她对丈夫始终感到不满，无缘无故生气，尤其觉得他“缺乏责任感”。她的恐惧是，她“身体内部好像有什么人要拼命站起来，挣出来”。她十分害怕像自己的母亲，她厌恨她母亲。她说自己“无依无靠”，表达了她感到的挫折、困惑和无可奈何，而她把这些感觉归于这样的事实：她所做的一切从未使父母感到高兴。她无法知道“他们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无法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无法“确切地”了解自己是好还是坏；因为父母的爱或恨、同意或否定完全没有定准，无法预见；对此她极为不满。在回顾过去时她认为：父母亲厌恨她。但同时她又认为：父母对她过度的压抑使她过分焦虑，以至她无法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能力恨他们，也许只能爱他们。她现在认为，她正在寻求“安慰”，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一些指导。对我的非指导性的态度，她特别感到难于容忍，因为这种态度跟她父亲的态度那么相似：“别问！告诉你的都没有假！”她感到迷惑，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强迫性的思维方式：总觉得有必要问：“这是什么意思？”或者“这是为什么？”并只好自己回答自己。她把这一现象解释为：由于她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安慰，因而她只好尽力自己安慰自己。她渐渐感到深深的沮丧，对自己的感情极为失望，认为它们幼稚可笑。她总是希望别人理解她是多么为自己而悲哀。

我认为，“她”并未真正为她真实的自我悲哀。在我看来，

她倒极像爱发牢骚的母亲老是在抱怨淘气的孩子。实际上，她母亲看上去总是“跟她一模一样”，始终在数落“她的”幼稚。她与母亲的相似，不仅体现在这抱怨、数落上，也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例如，跟她母亲一样，她老是冲着丈夫孩子大喊大叫，老是厌恨一切人，老是掉眼泪。事实上，生活对她来说的确苦不堪言，因为她无法成为自己，只能像她母亲。然而她知道，她越是感到孤独、失落、害怕和迷惘，她就越是她真实的自我。她也明白，生气、厌恨、喊叫、掉泪、抱怨等等，都是她自己的缘故，因为，她越是让自己像这样（即像她母亲），她就越不感到害怕（这倒的确如此，不过其代价是放弃真实的自我）。然而，越是如此，她后就会越是烦恼；情绪的风暴过去之后，她会深感自己没有出息（没有保持她的自我），并因而厌恨那个影响她的人（即她母亲），厌恨自己的自我的两重性。这位患者的问题是，如果她要保持真实的自我，她就会感到焦虑；但是，她用以克服这种焦虑的手段却是错误的。当患者认识到这一点时，她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判断清楚：通过放弃自我来克服上述焦虑是否值得。她从我这里受到的挫折（使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厌恨情绪），并不能通过性驱力或攻击性驱力在移情过程中所受到的挫折加以充分的解释，而应该理解为生存意义上的挫折。这种挫折产生于这样的事实：我没有提供她希望从我这儿得到的“安慰”，没有告诉她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迫使她认识到：

据她自己所说。我从未见过她母亲，不知道她母亲本人是否真与她所说的一样。——原注

她必须自己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她的父母没有尽其责任，没有让她对自己有正确的了解，即没有给她提供生活的出发点。由于这一点，她就否定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我拒绝提供“安慰”，则强化了她的敌对情绪。但唯有拒绝，方有可能使她自身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

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理治疗的任务，恰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是对患者自由的呼唤。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则是心理治疗取得成功的标志。

第 二 部 分

第四章 身体化的自我和非身体化的自我

到此为止，我对若干形式的焦虑作了描述，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基本的存在性不安。这些焦虑产生于基本的存在性不安这种特殊的生存情境，是这一情境的作用产物。当自身存在具有安全感时，这些焦虑就不会如此有力和顽强地表现出来。

然而，即使缺乏这种基本的安全感，人还是必须生活下去。因而，研究者现在必须努力回答的问题是：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人，发展了怎样一种与自身的关系。我将尽力指出，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人看来没有基本的整体感，这种整体感能经得住最剧烈的自我冲突。这种人对自身的体验，是根本的心 - 身分离。通常，在分离的心、身两者之间，他们对“心”具有最接近的认同感。

上述基本的路径会引出某些确定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个人的存在能够在其自身之内组织起来。从原则上说，本书以下的部分与这些结果有关。心 - 身分离将被看作一种意图，其目的是要解决基本的潜在的存在性不安。在某些情形，心 - 身分离也许是一种手段，使得即便有着存在性不安也能有

效地生活；也许是一种企图，目的是要超越存在性不安。然而，心-身分离也容易使各种焦虑感持续下去，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心-身分离正是针对焦虑感的防御机制；同时，心-身分离也有可能提供一个出发点，导致精神病的发生。如果个体身上存在着令人感觉是非身体化的部分，而个体又过于专一地力图将自己认同于这一部分，那么，上述最后一种可能性就始终存在。在本章中，我将首先用最通常的术语，对身体化的自我和非身体化的自我进行对照比较；在后面几章，我将不再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形，而进入实际结果的讨论，较为详尽地分析个体的存在从总体上的严重崩溃，正是这种崩溃可能导致精神病的发生。

身体化的和非身体化的自我

每个人，包括那些最为非身体化的人，都感到自己无可逃避地被约束在自身身体之上或身体之内。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人感觉自身身体是生动的、真实的、实在的，那么，他就会感觉自己是生动的、真实的、实在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身体的开始便是生命的开始，而身体的死亡便是生命的结束。可以认为，他们感到自己是身体化的。

然而，这并非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这些偶尔遇到压力时才部分感受到心-身分离的“普通”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人，他们的生命并没有渗透在身体之中，相反，他们感到（事实上他们一直）或多或少与自己的

身体相分离。对于这样的个体，我们可以说“他”从未实现相当程度的身体化，他自己则会说他或多或少是非身体化的。

在这里，自我在生活中的位置表现出基本的差异。相应于各自得到充分发展的身体化和非身体化而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作人（being human）的方式。大多数人会认为，前者是正常的、健全的，而后者是反常的、病态的。本书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十分中肯。从某些观点看来，身体化可以认为是正常的；然而，另外一些观点则认为，个体应努力摆脱身体的束缚，使自己达到纯粹的精神境界。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两种基本的生存情境。情境的差异并没有排斥共同的基本问题，如好与坏、善与恶、生与死、身分、现实与非现实。这些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情景中都会产生。然而，不同的情境却会决定上述基本问题基本的体现方式。换句话说，我们面临两种极端不同的可能性，当个体的状态大致接近于其中一种时，他就会以相应的方式去感受他与他人及世界的联系；而我们对这两种可能性的考察，则应根据个体这种感受来进行。

身体化的人感到自己有血有肉，筋腱骨骼俱全，感到生

例如，布尔特曼在他的《原始基督教》（1956年）中，曾就诺斯替教的灵（真实的自我）肉分离给予了简短而杰出的说明。忏悔和赎罪是通向灵肉分离之路。布尔特曼引证了诺斯替教的如下教义：“〔肉体是〕黑暗的牢房，是行动着的死亡，是丧失了感觉的僵尸，是你与生俱来的坟墓，是你背负的十字架，是你盗贼般的朋友，他佯作爱你，暗中却妒恨你……”（第169页）关于心-身分离的心理病理学研究，可参见斯各特（1949年）和温尼卡（1945年、1949年）。——原注

物学上的生动与真实：他知道自己是在实在的。他完全内在于他的身体，就此而言，他可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感。他感到自己面临攻击、伤害、疾病、衰朽、死亡等种种危险，它们威胁着他的身体。他被身体的欲望、身体的满足和快乐，以及身体的挫折所纠缠。个体由是有了自己生活的起点；他的身体对他来说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可以作为一个人与其他人交往。

然而，尽管他的存在没有被分离为“心”与身，他的自我仍然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遭到分离。在某些情形中，他的生存状态比那些或多或少与身体分离的个体更为危险。这是因为，在遭到身体伤害的时候，他缺少那种精神神圣不可侮的感觉；而具有非身体化倾向的人，则常常会有这种感觉。

例如，一位因精神分裂而两度长期住院的患者告诉我他的

一次遭遇，从中能看到他在被攻击时的反应。那时他精神尚属健全。一天夜里他路经一条小巷，迎面走来两个男人；在擦身而过的一瞬，其中一个人突然挥起一根棍子向他打来。那一击并不很准，只是令他大吃一惊。他一个趔趄，但很快恢复过来，尽管赤手空拳，仍然迎上去还击入侵者；一阵打斗之后，那两人转身跑开了。

在这个故事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主人公体验突然事件的方式。在打击面前，他首先的反应是吃惊。紧接着，当他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就开始想到，这两个人袭击他真是太没目标了。他身上又没带钱，从他这儿他们什么也捞不到。“他们只能打我一顿，但不能给我造成任何真正的伤

害。”也就是说，任何身体上的伤害都无法真正伤害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种态度是大智大慧的表现，例如苏格拉底就坚持认为，善良的人是不可能被伤害的。回过头来就我们这位患者而言，“他”和他的“身体”是分离的。在打击面前，他远不像一般人那么害怕，因为在他自己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可以失去。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位患者的生活充满了一般人所没有的焦虑。

一般身体化的人，完全被身体的各种欲望、需要和行动所纠缠，他也要面对伴随这些欲望、需要和行动而来的罪感与焦虑，面对身体的挫折和打击、身体的满足和快乐。存在于这样的身体之中，免不了自责，而这自责可能是难于承受的。这样的身体化无法防御绝望和虚空的袭击。在他的身体之外，他依然不得不关心自己是谁。他或许感到自己的身体是衰朽的，是有毒的，正在走向死亡。一句话，身体自我 (body-self) 并非不可侵犯的要塞，无法抵挡存在性怀疑和不确定性的侵蚀；身体自我本身无法消除精神病的危险。反过来，自身存在被分离为非身体化和身体化两部分，与完全的身体化相比，并不更容易导致精神病。换句话说，完全的身体化并非精神健全的标志和保障。

也就是说，即便个体真正以身体为基础（即身体化），也绝不能说他是统一的和完整的人。不过，以身体为基础的生活，至少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出发点。由此出发，可能导致各种可能性。而自我与身体相分离的个体，则只能经历到另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非身体化的自我

在非身体化状态中，个体感到其自我或多或少与其身体分离。个体感到其身体是一个客体，与世界中其它客体一样，而不是自身存在的核心。身体不再是他真实自我的核心，而成为某个假自我（false self）的核心。在这种情形中，被分离的、非身体化了的、“内在的”、“真正的”自我，有可能怀着温柔、体贴、有趣或厌恨的心情，观望着假自我。

这样一种自我与身体的分离，使得非身体化的自我不可能直接参与现实生活的任何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是身体知觉、感觉和运动（表情、姿势、话语、行动等等）之高度专一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因而，非身体化的自我作为所有身体行为的观望者，无法直接参与其中，它的作用只能是观察、控制和批评身体的经验和行为，从事那些通常所谓纯“精神”的活动。

也就是说，非身体化的自我变成了一种过度意识（hyper-conscious）。

它试图安排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和形象。

它与自身以及身体的关系，可能是极为复杂的。

目前，关于身体化的个体，人们已经作了大量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与此相比较，对那些具有严重心-身分离的个体，我们却几乎没有什么可言。当然，人们也研究自我与身体暂时分离的状态，然而，人们通常把这些分离视为正常状态的

产物。在这种正常状态中，自我最初是身体化的，只是在压力下发生了暂时的分离，当压力解除，又回复到正常的身体化状态。

一个“边缘性”案例——戴维（David）

在本节中我将直接给出关于戴维的描述，尽可能不加评论，因为我希望读者明白，像戴维这样的人以及他们面临的问题并非我自己的发明，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戴维的案例也给下一节的一般性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遇见戴维时他年方 18，独生子，10 岁那年母亲去世，此后一直跟父亲生活。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哲学。父亲看不出儿子有什么异常，有什么必要去咨询精神病医生，可导师却为这孩子着急。戴维似乎沉溺于幻觉，他的行为方式总有些古怪。例如，他穿着长长的斗篷到班上听课，肩膀和手臂都全然不见；有时又携着一根手杖；举止十分做作，讲话多半是背诵语录。

戴维父亲对戴维的介绍十分空泛。他认为戴维一直很正常，最近的反常行为不过是一段青春期的插曲；戴维始终是个好孩子，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惹麻烦。母亲在世时全心全意爱他，而他也离不开母亲；母亲去世时，他“非常勇敢”，还帮父亲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料理家务、作饭、购买食品，“取代”了母亲或者学母亲的“样儿”，甚至对于各类室内装饰，也用母亲的眼光来打量。关于这些事情，他父亲谈

得很多。

戴维看上去十分古怪——好像是丹尼·凯 (Danny Kaye) 扮演的青年克尔凯郭尔。头发太长，衣领太大，裤子太短，鞋太大！还披着剧院里买来的二手斗篷，拎着手杖！他哪里只是古怪，在我看来他是在扮演古怪。整个效果是他一手策划和导演的。可是，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做，单是他戴维呢？

戴维的确是一位相当老练的演员。事实上，至少从他母亲去世以来，他就一直在扮演这个或那个角色。在母亲去世之前他曾说：“我仅仅是她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关于母亲的去世他说：“我只记得，我当时相当高兴。也许我有点难过；不管怎样，我愿意这样想。”直到母亲去世，他仅仅是她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母亲死后，他也并不更容易成为他自己。戴维在成长起来的过程中，完全理所当然地把他所谓他的“自我”和他的“人格”看作两件相当分离的事情。他从未严肃地想象过其他可能性。同样，他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人都都大抵如此。他关于一般人性的观点，建筑在他关于自身的经验之上，那就是，每个人都是演员。这一关于人及人性的确定信念或者说假定支配了他的生活。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很容易成为他母亲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因为他所有的行动仅仅是属于他正在扮演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如果说这些行动最终属于他的自我，那也仅

戴维并不像特里林优秀短篇小说《此时彼地》中的“特尔丁”。

——原注

仅是属于一个“假自我”，这个假自我的行动遵从她的意愿，而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他的自我从未通过他的行动直接显现出来。看来，在从婴儿状态成长起来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带着“自己的自我”，另一方面则带着“他母亲希望看到的样子”，带着他的“人格”。戴维就从这样的起点开始，把自己的自我（只有他自己知道）与别人眼中的自己相分离，以此作为目标，并尽心尽力。他在这样的状态中越陷越深，因为他总是感到羞涩，敏于自我意识，易受伤害。通过扮演某一角色，他发现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自己的羞涩、自我意识和脆弱。想到无论自己在干什么都不代表真正的自己，他便感到宽慰。也就是说，戴维也使用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防御手段：他强化了引发焦虑的条件，试图以此来缓和焦虑。

戴维始终铭记的要点是，他在扮演角色。通常，他知道自己在扮演别人。但有时他也扮演自己（他自己的自我）。此时，他并非简单地、自然而然地是他自己，而是在扮演自己。他的想法是：绝不要向他人暴露自己。结果，通过他所扮演的角色，他给他人留下了转弯抹角、暧昧可疑的印象，但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的想法是完全坦然和诚实的。

戴维的整个存在方式，建立在其内“自我”与外在“人格”的分离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态在没有其“人格”（即他与别人打交道的奇特的行为方式）的情况下，也存在了好几年。

表面现象无法揭示这样的事实：戴维的“人格”并非真实的自我表现，而主要是一系列的人格扮演。他认为自己在

中学期间主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早熟的中学生，聪明过人，但多少有点冷漠。然而他说，到 15 岁那年他就认识到，这一角色行不通了，因为“它的声调让人讨厌”。于是，他决定修改这一角色，使它招人喜欢，“取得理想的效果”。

但是，他用以维持自身存在方式的努力受到两种威胁。其中第一种并没有带给他太多的麻烦。这一威胁是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自然起来的危险。作为一位演员，戴维希望自己始终与所扮演的角色保持距离，这样他觉得自己是情节的主人，以完全清醒的意识控制了自己的表情和动作，准确地把握对他人产生的效果。因而，变得自然就是愚蠢，只能让人可怜自己。

第二种威胁就比较具体了，令他感到无可奈何。戴维真正向我抱怨的就是这种威胁而不是别的，它使戴维的整个生存技巧面临崩溃的危险。

在童年时期，戴维一直非常喜欢对着镜子扮演角色，如今依然。但是现在，在这种对镜扮演中，他不知不觉沉浸于一种特殊的角色之中，换句话说，当他在镜子面前扮演这种特殊角色时，就不知不觉变得自然起来。这种特殊的角色就是女人的角色。戴维发现，这是他的败着。在镜子面前，他穿穿母亲遗留下来的服饰，或者扮演著名悲剧中那些女性形象。渐渐地，他开始感到身不由己：不仅走路、说话像女人，甚至也像女人那样观察和思考。这就是他目前的状态，这就是他对自己目前奇装异服、古怪举止的解释。他说，他感到唯有如此，才能阻止自己陷于那些女性角色之中，那些女性角色不仅要吞没他的行动，甚至还要吞没他“自己的”自我，

要否定他所渴望的对自身存在的把握和控制。他厌恨自己目前这种斗篷一手杖式的角色，也知道别人都在嘲笑他，但他身不由己。他知道唯有这一“精神分裂性”的角色能够保护自己，使自己免于被自己内在的女性所完全吞没。他知道，这种女性不仅内在于自己，而且随时都可能跃然而出。

在下面的篇幅中，我们将对这一类人加以讨论，戴维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很明显，如果不深入这种精神分裂性状态的细节，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类人。就戴维的个案而言，我们必须对下述内容作出详尽的描述：戴维“自己的”自我的性质、这一自我与戴维“人格”的关系、“自我意识”和“脆弱”对于戴维的重要性、他精心进行人格模仿的意义，以及一个异己的“人格”是如何让它自己（她自己）入侵了戴维的“人格”（这一入侵显然是自发的，它不受戴维控制，反而要威胁到他“自己的”自我的生存）。

根本的分离存在于戴维所谓他“自己的”自我及其“人格”之间。这种分离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研究者的面前。在戴维这样的人看来，他们所谓“自己的”、“内在的”、“真正的”、“真实的”自我，是与他们所有可观察的行为相分离的，是与戴维所谓“人格”相分离的。出于方便，可以把这“人格”称为个体的“假自我”或“假自我系统”。我之所以建议以假人格系统相称，是因为这样一些个体所拥有的“人格”、假自我、面具、“模样”或面具人格可能存在于各种不同部分自我的混合体之中，而这些不同部分的自我，没有一种因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具有了自身综合的“人格”。对这样的个体进行仔细的了解，可以发现其可观察的行为可能包括相当

精心的人格模仿，与之伴随的是各种可能的强迫性行动。研究者可以明确观察到的不是单个的假自我，而是一组部分自我，其中只有某些是精心炮制的。如果其中任一单个的部分自我都得到充分的变化，那么这些部分自我是可以组成人格的。正因为如此，我建议将这样一种由部分构成的整体称为假自我系统。

存在于这样一种精神分裂性状态的“自我”，通常或多或少是非身体化的。这样的自我被体验为一种精神实体，它进入了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封闭”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的行动没有让人感到是其自我的表达。戴维所谓其“人格”而我建议称为假自我系统的这些行动，是分离的，只有部分是自发的。自我并未感觉到在参与假自我的行动；假自我的行动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假，越来越浮。另一方面，自我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把自己看作“真正的”自我，而将其面具人格视为虚假的。个体抱怨自己虚废并缺乏自发性。然而，与其愿望相反，他的自发性会因此越来越低，他也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虚废。他抱怨自己不真实，脱离现实，不能有效地组织生活。从生存论的意义上说，个体的这些抱怨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他的自我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并且通常以高度批判性的态度注意着假自我。另一方面，他的自我又是其假自我或面具人格所独有的特征，其自我意识是很不完善的。正因为如此，他的自我通常是不完全的。然而，假自我系统会进行全面的扩张，从这种扩张中，或从这种扩张的一部分之中，自我会感觉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参见戴维对女性角色的恐惧）。

如果用“自我意识”(见第七章)一词意指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即那种为他人所观察的感觉，那么，就上述情况而言，个体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可怕的“自我意识”。

上述亦表明，个体对他自身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层面，而不同层面之间关系的变化，又总是与个体的人际关系相联系。这些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与人和人之间发生的现象完全不同。

就所论情况而言，个体的自我关系变成一种假人际关系，而自我则把各种假自我当作他人去处理，这些他人是被自我非人化了的。戴维就是一个例子，他身不由己地扮演了某个他所厌恶的角色，对此他说：“它的声音令人厌恶。”从所扮演的角色中，自我由里向外打量观察角色的虚假言行，并且像旁观者一样感到憎恶。所有这一切表明了一种企图：个体想在完全不依赖外界人事的前提下，在自身内部创造各种人事关系。个体在自身内部创造了一个小宇宙；不过这一孤独的、自我中心的、隐秘的、内在的“世界”当然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不可行的世界，无法与我们共有的、唯一的真实世界相提并论。其实，正因为如此，精神病学才有了存在的必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位精神分裂性个体，将试图努力通过封闭在自身存在之内变得无所不能，而不依赖与他人之创造性的关系，不依赖各种创造性的关系形式，因为这些关系形式本身要依赖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存在。他自己会觉得，他就是一切人和一切事，但这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在他看来，孤独带来了自由、自足和自控。这些想象的好处对

于真实的自我是安全的。

当然，这一投射性的防御机制也有其不利的方面，那就是，它是不可能的，是一种虚假的希望，并将导致持续的绝望；此外，这一防御机制还必然导致持续的、痛苦的虚幻感。这是因为，虽然那隐藏的、封闭的自我参与了假自我系统的各种准自主性的活动，但它本身并不承认这种参与（除非表现为别的面具人格，正如在戴维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一样），因而，它只能获得一种纯“精神性的”存在。进而言之，这一封闭的、孤立的自我无法通过外部经验丰富发展自己，因而，其整个内部世界将变得越来越贫乏，直至个体感觉自己全然是一团虚空。这也就是说，全能感和万有感，原来是无能感和虚无感的孪生物。表现在个体身上，在某一时刻，个体会感觉自己身在此地，内在充实而富有；相形之下，外在的生活在那儿运行，在他眼里是多么贫乏可怜。此时他感到自己的优越性，感觉自己超越于生活之上。可是，在某一时刻，个体又会渴望重新进入生活内部，渴望让生活进入自己内部。此时，个体会感到自己内在的死亡，会产生深深的恐惧。

这样一种精神分裂性个体身上的关键特征，在于他所遭受的各种焦虑的本质；我们已经描述过这些焦虑的表现形式，如吞没、爆聚等等。我们还描述过各种畏惧，如丧失内在自主性之畏、丧失自由之畏等等；还指出了，这些畏惧实质上是害怕由自主的人变为事物，变为机械，变为石头，变为东西，变为它，也即害怕被僵化。

我们还研究过，精神分裂性状态的发展是怎样强化了这

些焦虑。

当自我放弃了身体及其行动，并退入纯精神的行为，它就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实体，这实体或许存在于身体中某处。我们已经指出，个体的自我把与他人的任何一种关系看作是对其身分的威胁，在这种威胁面前，个体将努力维持自身的存在；而刚才提及的向纯粹精神状态的退缩，则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这样的自我只有在隐蔽中和孤独中才会感到安全。当然，对于这样的自我而言，无论他人是否在场，它都能在任何时候进入孤独状态。

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他人的目光面前，精神分裂性患者会比一般人感到更“脆弱”，更不堪审视、不堪暴露。当他尚未尖锐地意识到他人的审视（即所谓“自我意识”），那么，他还能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暂时得以避免自己的焦虑被证实。要么把他人变为事物，并相应地把自己对这一事物的感情非人化和客体化；要么就装作冷漠。非人化的方法和冷漠的态度密切关联，但并不十分同一。被非人化者可被当作使用、操作和行动的对象。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与一个人相对应，一件事物的基本特征在于：事物没有主体性，因而无法具有回应的意向。而就冷漠的态度而言，个体以漫不经心的、生硬无情的方式对待人或事，就好像他或它无关紧要；从根本上说，就好像他或它并不存在。一个人，只要有那么一点儿主体性，他也可能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能很有意义。冷漠的态度否定人和事的意义。我们还记得，僵化正是珀尔修斯用以消灭敌人的手段。用美杜莎之头的目光，他把敌人变为石头。僵化

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手段。当然，如果我们充分确信自身的生存，那么，即便我们感到别人的目光不把我们当人而是当作一样东西，我们也不会害怕。换句话说，对于“正常”人来说，被别人视为物并非灾难性的威胁；只是对于精神分裂性个体而言，他所遭遇的每一道目光似乎都来自美杜莎之头，使他感到隐含着可怕的力量，试图消灭或毁坏他那风雨飘摇的内在生命。正因为如此，他拼命要将他人先变为石头，以为这就是使自己免于被僵化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他感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安全。

概而言之，精神分裂性个体并未致力于防止自身部分身体的失落。宁可说，他的全部努力俱用于维护他的自我；而这种维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不稳定、不可靠、没有保证的。个体将始终陷于这样一种恐惧：害怕消失在非在之中，害怕陷于威廉·布莱克所谓作为最后一着的“混乱的非在”（chaotic non-entity）之中。他的自主性受到吞没焦虑的威胁。他不得不保卫自己，以免主体性和生动感的丧失。正因为他自己感到空虚，因而，与他人有关之饱满的、实在的、生动的现实，对于他就成为一种冲击。他始终无法把握这冲击，它随时可能发展为爆聚，使他的自我面临被彻底压倒和否定的危险，一如突然涌入的空气否定真空，或水注满水库。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其艺术独具慧眼和创造性，新颖、简练，表达思想感情率直而有力，深切关注人的灵魂世界和生存难题，因而对当代哲学和美学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译 注

他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精神分裂性个体害怕与他人之现实的、活生生的辩证关系。他只能与被他非人化了的人建立关系，只能与他自己幻想的产物（心象）建立关系，甚或只能与物、与动物建立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所描述的精神分裂性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企图：企图维护一种结构不稳定的存在。后面我们将进一步指出，存在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结构，在童年早期就已发生和形成。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基本结构和基本要素（例如，时间的连续性、对自我和非自我的区分、幻想与现实，等等）都具有确定的稳定性，因而可视为理所当然。在这种稳定的基础上，我们所谓“人格”中某种可观的弹性或灵活性得以存在。然而，在精神分裂性人格结构中，却缺乏上述稳定性和安全性。这是放弃自身存在基础并在不现实的超结构中寻求脆弱补偿的结果。

如果个体的整个存在未能得到保护，个体就会沿着他的防卫路线一直退缩到底。为了维护他的“自我”，他将不惜否定一切。然而悲剧在于，如此保卫自我，实质是在摧毁自我。在精神分裂症状态中，明显的、实际的破坏和解体，并非产生于外部敌人（实际的或假想的）的打击，而是上述内部防卫机制的毁灭性后果。

第五章 精神分裂性状态 中的内自我

你可以逃避这世上的痛苦，这是你的自由，也与你的天性相符。但或许，准确地说，你唯一能逃避的，只是这逃避本身。

弗兰茨·卡夫卡

在我们所描述的精神分裂性状态中，自我与身体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分裂。个体自认为是真实自我的东西，却或多或少表现为非身体化的；而身体的经验和行为，却转而表现为假自我系统的成分。

对上述分裂中的两种要素，有必要加以更详尽的考虑。此外还需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对精神或非身体化自我加以考虑。

大家知道，在普通人身上，也会发生自我与身体的暂时分离。一般而言，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发现自己被封闭在某种具有威胁性的经验之内，而且从生理上说又没有逃避的可能时，就容易表现出这种分离。这是一种通常的反应。集

中营的囚犯就试图这样生存，因为，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说，他们都看不到出路。唯一的出路是一种生理的撤退：“脱离”身体，“进入”自我。作为一种特征，这种分离通常伴随着这样一些想法：“这好像一场梦”、“这多半不是真的”、“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看起来没有什么”、“我无法相信”、“这与我无关”，等等，并伴随着被分离和被剥夺的各种感受。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会以正常方式继续各种外部行为，但在内部，身体的行为却被感觉是朝向自身的，是自发的。

然而，经验的这种梦的性质或非现实性，以及行为的自发性，并未影响自我的状态：这时候，自我远未“休眠”，相反格外警觉，思考和观察也可能格外清醒。

自我与身体的暂时分离也可以在睡梦中表现出来。

一位 19 岁的姑娘出于某些原因害怕即将来临的婚姻，当婚礼日益迫近时，她梦见自己坐在一辆小车的后座，没人驾驶，小车却自己在行驶。这位姑娘并非精神分裂性个体，但却对特殊情况作出了精神分裂性的防卫反应。

R 接受治疗后不久便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公共汽车上车的踏板上，车没人驾驶，在他跳离以后继续向前行驶，摔得粉碎。经过 4 个月的心理治疗，他作了另外一个梦。“我正在追赶一辆公共汽车。突然，我发现自己站在车的踏板上；与此同时却仍在车后追赶；我竭力想追上自己，但车比我跑得快。对此我感到害怕。”我们情不自禁要把这个梦解释为一个度量，它表明我们希望看到的某种转变。

可以举出很多这种暂时分离的例子，这是一种普通的经验。有时，它被我们有意识地弱化了；但更多的时候，它却

是个体无法控制的。不过，我们讨论的主要对象是非常态的患者。对于他们来说，自我与身体的分离并不仅仅是对特定危险境况的暂时反应——当危险过去以后，这种反应也就消失了；相反，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分离是基本的生活定向。如果追溯这些非常态的生活，通常会发现，它们似乎从婴儿期的最初几个月就开始了——那时，上述分离已在形成和发展之中。对于“正常”个体，如果置身于威胁其存在的处境中，且无可逃避，那么他就会进入一种精神分裂性状态，竭力试图超越这一处境——即便不在生理上，至少也在精神上变成精神的观察者，超然地和漠然地观望着自身身体的所作所为及其遭遇。“正常”个体尚且如此，因而可以设想，那些其在世方式始终呈现分裂状态的个体会感到，对于他——如果不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从每一个方面威胁着他的存在，并且无可逃避。对于这样的人，事情确系如此。对于他们，世界是无形的囚牢，是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

偏执狂患者有着特殊的困扰，他老觉得有人在跟他作对；有人在密谋窃取他的脑子；卧室的墙里隐藏着一台机器发射脑电波软化他的脑子，或趁他睡熟时对他施行电击；等等。在这种状态中，他感觉为现实本身所困扰。世界就其本身而言，他人就其本身而言，对于他都是一种危险。

于是，自我着手寻求安全感，其手段正是力图通过非身体化的存在来超越这个世界。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自我会感到自己脱离了一切经验和行动。其结果，它变成了一个虚空。一切在彼，在外部；但却无物在此，自身内部空无一物。不仅如此，那种把世界拒之门外的需要，非但没有缓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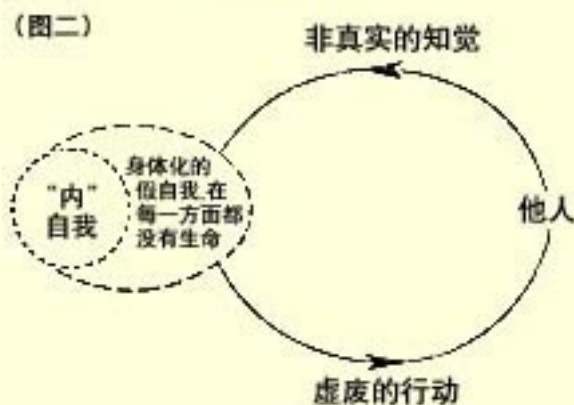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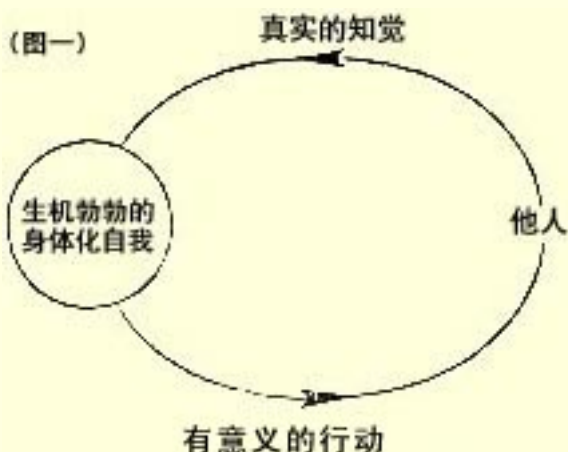
反而强化了自我对于一切在彼的恐惧以及被压倒的恐惧；而在此同时，自我可能超乎一切地渴望参与到世界之中。这样，自我最大的渴望就表现为最大的软弱；而屈服于这一软弱又是自我最大的恐惧，因为，自我害怕它的虚空会因参与世界而遭到否定，害怕被吞没，害怕失去身分，这身分象征着自我的超越——哪怕这是一种虚空中的超越。

自我的这种内在分裂意味着，它从未直接显示于个体的各种表达和行动，它也从未有过任何自发的或当下即时的经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一个僵硬不变的距离。在这样一种基本的知觉和行动方式中，自我与他人以及世界之间任何直接和当下即时的关系，都将变得是无意义的、无用的、虚假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图解的方法帮助我们描述两种不同的状态，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必然遵循其中一种。

在图一中，自我真实地感知对象。自我体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是生动的，让人感觉是有要点、可把握的。自我所承诺的行动是真实的、真诚的。

图二则显示了另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把自己与他人的所有交往都推诿于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在他的存在之内，可并不等于“他”；这个系统只能体验到不真实的世界，而属于这个系统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是虚假的、虚废的、无意义的。

这样一种虚废、无意义和无目的之心态，每个人都会在此时或彼时或多或少感觉到；只是对于精神分裂性个体而言，这种心态特别显著，特别持久。这种心态的根源在于，知觉的大门和行动的大门没有掌握在自我手里，而是被假自我所



左右和控制。这假自我作为一个系统，其有关部分与“真”自我相分离；在个体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中，这一假自我系统阻碍、排斥着真自我的直接参与，由此必然产生知觉的不真实性以及行动的虚假性和无意义性。

这样，在个体自身的存在之中，可以感到一种假二重性。他不是以完整的自我与世界打交道，而是推诿自己与外界人事的当下即时的联系，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存在。可用公式说明如下：

在正常状态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应该是：

(自我/身体) \rightleftharpoons 他人

但对于类精神分裂症个体而言，情况却是：

自我 \rightleftharpoons (身体—他人)

也就是说,自我未能与真实的人和事物建立直接的关系。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患者身上时,患者的自我就会竭尽全力,维护关于其自身的真实感、生动感以及身分感。

再联系图一、图二。在图一所示的正常状态中,我们看到一种良性循环:由于自我与他人建立了直接关系,世界的现实和自我的现实彼此相互强化。在图二中,我们看到一种恶性的循环: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没有生命;爱无法实现,恐惧取而代之;到后来,个体会绝望地感到一切都停滞不前,淤积在一个再也走不动的地方。无运动之物,无生动之物;一切死寂,连自我本身也无法幸免。自我为分离所阻,无法接近真实性和生动性,无法具有饱满的经验。个体无法体验到良性循环中与他人那种创造性的关系,无法体验到自我与他人的相互强化、相互丰富;相反,个体只能作出条件反射,作出机械的反应。这种反应一时看来是有效的、稳定的,但没有“生命”在其中(无生命力的关系)。一种类似它-它反应代替了健全的我-你关系,这种反应只能导向毁灭。

在这种情况下,内自我试图寻求确定的(明显的)补偿。这样的自我会怀有某些确定的观念、希望或幻想,内心的真诚即是其中一种。关于这种内心的真诚,我们已在前面第四章关于戴维的案例中看到过了。正因为与他人的所有交往都充满了伪装、暧昧、虚伪,因而,个体转而追求一种自我关系,这种关系中反过来充满了一丝不苟的真诚和坦率。一切都或许要隐瞒他人,但没有必要隐瞒自己。在其中,自我企

图把自己变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把它自己和它自己联系起来”，同时却排斥其他一切。由此引起自我内部进一步的分裂。个体的存在分裂为“真”“假”自我，真假自我如前所述都丧失了其真实性，但它们都在自身之内破碎成为新的亚系统。因而，在自我所具有的与它自身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二种二重性，那就是，内自我进一步分裂而具有了与它自己的一种虐待-受虐关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内自我甚至就将开始丧失其不得不首先具备的身分——我们已经指出过，内自我最初是作为一种手段产生的，其目的是企图牢牢把握不稳定的身分感（关于此点的临床解释，特别参见罗斯的案例，见后面边码第 150 页）。

当个体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危险和害怕的世界中，其畏惧又未能被爱所缓和，个体就会倾向于用前述类似它-它反应代替健全的我-你关系。此时个体害怕周围的一切。任何一种冲击都可能使他感到是毁灭性的，使他感到爆聚、洞穿、破碎和吞没的威胁。此时他会害怕自身的一切“运作”，害怕任何东西逸出自身，害怕在任何经验中失落自己，等等；一句话，他害怕自己被用竭，被耗尽，被抽空，被夺取，被吸干。

也就是说，自我希望控制；而自我的孤独，则是这一需要的必然结果。他宁可偷取，而不愿被他人给予；宁可给予他人，也不愿——如他所感觉——被他人偷取自己身上任何东西。例如，正如我们在戴维及其他案例中看到，对于谁或

见克尔凯郭尔：《对死的厌倦》（The Sickness unto death, 1954 年），但用于此处含义已大为不同。——原注

者什么进入了自己内部，谁或者什么离开了自己内部，个体都不得不力图加以控制。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一防卫系统是惨淡经营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存在性安全感的缺失。对自身存在确信不疑的个体则无需这样的防卫系统。然而，对那些无法确信自身存在的个体而言，他们想让自己超越性的自我脱离危险，想遥控直接经验和行动；而这种努力将导致各种非希望的结果，由此造成的损害，可能要比实际得到的好处大得多。

处于孤立和分离状态的自我无法承诺与他人的创造性关系，相反被各种先入为主的幻觉、思想、记忆等等（心象）所左右。这样一些心象无法直接向他人表达；相应地，这样的自我也无法直接为他人所感知。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这样的自我一切都成为不可能的了。无论假自我系统经历了什么样的失败或成功，自我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在幻想中，自我可以是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处所，可以从事任何事情，可以拥有一切：无所不能，绝对自由——可惜只在幻想之中。一旦着手任何实际事务，就会遭受痛苦和屈辱——这并非失败和错误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仅仅是因为自我在必然性和偶然性面前放弃了自己，被它们所支配。幻想的无所不能和自由是有害的，越是沉溺于其中，就会变得越软弱、无助、无能。无所不能和自由的幻想，只能在其自身魔幻般的封闭性内才能得到维持。为了使幻想得以维持，不被哪怕最微小的现实所侵扰，自我不得不将幻想与现实分离。

萨特在其《心理学与幻想》（1950年，第165—166页）中，对上述分裂作了出色的描述：

.....我们可以在自身内部辨认出两种不同的自我：心怀各种意向和欲望的幻想的自我，以及真实的自我。对于幻想的自我来说，存在着各种幻想的虐待狂和受虐狂，存在着关于各色人等的狂想。在与现实接触的每一瞬间，幻想的自我碎裂、消失，让位于真实的自我。这两种自我就其各自的本性而言，不可能并存；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客体，其各自的感觉和行动完全无法通约。

因而，可以认为，不同的个体应该归为两种类型，分类的依据是个体的生存趋向：是趋向幻想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幻想型生活的标志，这绝不是对对象的简单比较和选择。例如，我们不应认为，一般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病态的梦幻者是要用非现实的、更诱人的内容去取代生活的现实内容；不应认为，他们力图视自己的幻想为真实呈现的客体，据此决定自己对这些幻想客体的反应，以便忘记它们非现实的性质。不，喜好幻想型的生活，并不仅仅像普通人喜好财富、美，以及其他奢望一样，只要将它们非现实的性质置之不顾就行了。喜好幻想型的生活，还需要对其幻想的性质投之以“幻想的”感受、感情和行动。这不仅仅是选择这种或那种幻想，而且在于幻想的状态。这种状态体现在每一件事情之中；它不仅仅是逃避现实的内容（贫穷、受挫的爱情、事业的失败，等等），而且是逃避现实的形式，逃避现实呈现的特征，逃避现实要求我们所作出的反应，逃避我们自己的行为对客体的适应，逃避无休无止的知觉，逃避它们的独立性，逃避发展它

们的感觉方式。

幻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分裂,正是明可夫斯基(Minkowski)关于孤独症概念的核心。

然而,问题在于,生活在幻想而非现实中的人,他自己变得不现实。对于他来说,实际的“世界”变得萎缩和贫乏了;“现实的”物质世界和他人不再是创造性幻想的源泉,越来越失去其自身的意义。幻想,由于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未落实到现实中,或者没有从“现实”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因而愈来愈空洞和涣散。“自我”与现实的联系本已薄弱,现在,随着它越来越深地卷入与自身幻象(心象)的幻想性关系,它便愈来愈不现实,愈来愈幻想化了。

在幻想和现实之间,如果没有开放性的回路,那么幻想就会失去限制。如果没有补偿性修复的意愿,那么,个体的罪感就会淡化,不再急于回到正常状态。此时,个体将在幻想中走向崩溃。这种崩溃将愈演愈烈,无法控制,直至世界和自我在幻想中化为灰烬。在精神分裂性状态中,世界是一片废墟,而自我则(显然)死亡。无论怎样的行动,恐怕都无力带来新生。

也就是说,欲望带来相反的后果。现实的荒诞进犯幻想的天国,而鬼魂却在人间行走。也就是说,自我的身分再次沦入危险。

见穆尔(M·Moore, 1887—1972, 美国女诗人。——译注):《诗集》。

——原注

对于这种情况，说自我只与自身相联系，并不十分正确。这种说法必须从一方面加以限制，而从另一方面加以引申。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我们此处讨论的，是一种直接的、当下即时的关系（联系）。这就作出了所需要的限制，因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甚至在自我与他人之存在的诸层面之间，这种直接的、当下即时的关系，恰好是不可能的。

例如，一位患者的生活表面上沿着相对“正常的”道路进行，同时却存在着内在的分裂。他诉说了自己深深的苦恼：他无法与自己的妻子性交，除非把妻子另作一番想象。这就是说，他与妻子在肉体上发生了关系，但在此同时，他精神的肉体却只能在一旁观看并幻想自己正与想象的妻子性交。由此引起的罪感，使他寻求精神治疗。

这个例子说明了幻想与现实分裂所导致的后果。自我逃避与现实中的人的直接关系，却代之以自身对自身，以及自身对自身所假想之物的关系。自我可让自己与那种对象发生当下即时的关系，该对象并非现实中人，而仅系其自身幻想或回忆的产物。当然，即便对个体自身而言，这一点并不总是那么明显的，对他人而言更其如是。上述患者的妻子很难知晓，她的丈夫感觉“他”从未直接与她性交；他只是与自己关于她的心象性交——这一心象与现实中的她符合得很好，但他内心却知其有别。

后面第八章我们将看到彼得（Peter）所感受和经历的罪感，它与此处讨论的精神分裂性罪感是相关的。我认为，人们对后者迄今尚无充分的认识。——原注

这是一种逃避，其特征之一在于，自我从中能享有一种自由感。自我害怕失去这自由感，它知道，如果它回归现实，它就会失去这自由感。这一点，对于知觉和行动两方面都一样。就知觉而言，例如，对于上述患者，无论他在作爱时是多么孤独，他的自我感觉总是安全的：心智保有自由，虽然这自由最终令他产生罪感。

就行动而言也有同样的问题。在他人看来，个体的行动可能显得确切无误，得到个体的承诺。但是人们最终会发现，在“他”所进行的行动中，“他”感到他并未“真正”干些什么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上面那位患者说，“他”知道自己从未“真正”性交过，虽然金西 绝不这样认为。如果一位患精神病的百万富翁说，他从未“真正”拥有过什么金钱，那么他与上述患者的情况就明显相似，虽然也很微妙。在后面第十章我们将看到，上述情况的原因大概在于现实感的丧失（当然，这是金西意义上的现实感）。当这种丧失是如此彻底时，个体对其自身“生存性”真理的表达，就会变得跟我们对事实的描述一样；而我们的事实，是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得到一致确认的。

可以设想，如果上述患者不是说他从未与自己的妻子“真正”性交，而是说这个与之作爱的女人并非他真正的妻子，那他就是精神病人。然而，从生存论的意义上说，这一说法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从生存论的意义上说，他“真正

的”妻子是他自己幻想的产物（幻象或心象），而并非床上这个人。

在精神分裂性的个体身上，其非身体化的自我无法真与什么人结婚，它永远存在于孤独之中。当然，患者这种内心的孤独及其对承诺的放弃，并非没有自我欺骗在其中。

上述患者这样的人，对行动始终抱有疑虑。行动最终是局限的。行动是对可能性的否定，是对自由的否定。对于这样的个体，每一行动中必然是包含着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性质；正因为如此，“自我”不可能陷于其中。

关于行动，黑格尔（1949年，第349—350页）早有以下论述：

行动是直截了当的、确定的、有普遍意义的；行动被人们作为抽象的、独一无二的整体加以把握；行动是谋杀，是偷窃，是利益，是勇敢，等等，是任所说之物。它是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表征；它是事实本身。它是如此这般，而个体则是它之所是。行动是直截了当的事实，个体置身于这事实之中。对于他人来说，他是他本身之所是，并且也带着确定的、普遍的人性，而不再仅仅“意味着”这、“假定为”那。无疑，个体并未被迫固守这一精神形式。但是，当其存在作为存在成了问题时，当其存在之身体形态和行动彼此冲突，两者都力争要作为个体真正之现实时，具体行为本身就代表了个体真实的存在——而不是他的形象或形态；后两者会表达他“意欲”由行动所表达之物，或表达他所

能采取的行动，而这是任何人都能“假定”的。同理，另一方面，当他的对外表现受阻时，当他内在的可能性、能力或意图遭挫时，具体行为本身就被视为他真正的现实，即便他在这一点上欺骗了自己，即便——在他由行动转入自身内部之后——他意欲在其“内部世界”中成为别的什么，而不是他在行动中之所是。个体性不得不让自己承诺充当客观成分；当它发展进入具体行为，无疑就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面临着被改变和被滥用、被误解的可能。但是，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行动的性质——无论具体行为是否为（结为一体的）真实事情；或者，无论它是否仅仅假装或“假定为”对外表现（这表现本身是无用的，并且总会消逝）。客观化并不改变行动本身；它只表明具体行为是什么，换句话说，只表明它是否是或是否无。

不难理解，为什么精神分裂性的个体如此厌恶行动；正如黑格尔所描述，行动是“直截了当的、确定的、有普遍意义的……”然而，个体的自我却希望自己变得复杂、不确定，并且独具特质。行动是“任所说之物”，但个体绝不愿成为任所说之物；他一定要使自己始终不被把握和控制，始终变幻不定，并且具有超越性。行动是“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它是如此这般，而个体则是它之所是”。但是，个体却必定要尽一切努力不是其行动之所是，否则他就会孤弱无助，成为最可怜的人。“行动是直截了当的事实，个体置身于这事实之中。对于他人来说，他是他本身之所是……”但是，这又刚

好是他最恐惧之物可能发生之处，并且还刚好是他力图用虚假自我加以逃避之物，这种逃避使“他”绝不是他真正与他人相处时的样子。“他”，他的“自我”，是无休无止的可能性、能力、意图。行动始终是虚假自我的产物。行动或具体行动绝非个体的真正现实。个体希望的是永远不“承诺充当客观成分”——因而，个体的具体行动始终是（或者说至少个体自己相信是）假装，是假定为对外表现的；此外，个体还会尽其所能，主动培养“内在的”消极性——把自己所作的一切说成是“徒劳”。长此以往，“他”身上将没有什么东西能生存于这个世界上，能生存于现实中，生存于“客观成分”中；其自我将留不下一点痕迹。因而，自我在知觉和行动两方面都退回自身，不再承诺充当“客观成分”。正如不存在自发性的知觉，也不存在自发性的行动。由于个体逃避了对行动的承诺，因而，其知觉也就让人感觉像是对行动的承诺，这种承诺危及个体所拥有的自由：成为无物。

由于自我“不承诺充当客观成分”，它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梦，幻想一切。由于不考虑客观成分的存在，自我对自己而言可以意味着一切——拥有无条件的自由、力量、创造性。但是，它的自由、它的无所不能，其实只是虚空中的儿戏；它的创造性，也不过是产生幻想的能力。因而，内在的诚实、自由、无所不能，以及创造性，虽然被“内在的”自我珍视为理想，但却被共生的、扭曲了的自我分裂感、缺乏真正自由之感，以及彻头彻尾的无能感和虚废感所抹煞。

当然，在这里我主要关注的是，精神分裂性状态是如何发展成为精神病，而并非是描绘其中内含的各种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就初始的精神分裂性状态而言，个体精神状态的恶化和解体，仅是一种可能。十分清楚，真正的自由、力量和创造性，是可能达到和实现的。

许多精神分裂性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地远离他人，生活于孤独之中，但他们却同世间诸事物成功地建立了创造性的关系，使之成为他们艺术创造的源泉。不过，这并非本书关注的主题。在本书中，我主要关注精神分裂性状态的发展，我的思考只瞄准范围不大的一片领域。

回到我们的思路，尽管自我有着自由和无所不能的姿态，但是，它对“客观成分”的逃避，却使它陷于无能的境地：“现实”之内它没有自由。而且，即便在它被现实所包围的飞地之中，在远离现实的状态中，它始终无法摆脱（如它自己所感觉）爆聚之“现实”或吞没之“现实”的威胁；并且，虽然它专注于自身及其自身的对象，它仍然高度清楚地认识到，它在他人眼中也是一个对象。就这样，我们所描述过的精神分裂性防卫系统的特殊性质，使精神分裂性个体的悖难处境不断恶化。

当然，上述个体也许始终拥有选择的机会，他或者承认自己脱离现实的状态，或者致力于参与到生活之中。但是，精神分裂性的防御“现实”的机制，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在这种机制中，现实中的危险因素和威胁性质，有被不断延续和强化的趋势。自我参与生活是可能的，但同时必须面对剧烈的焦虑。卡夫卡对此知之甚深，他说：唯有通过焦虑，他方能参与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没有焦虑。对于精神分

裂性的个体来说，直接参与进生活，会使他感到一种持续的危险，那就是被生活摧毁，因为，正如我们说过，自我的孤独状态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努力：在自主性和完整性面临威胁时维护自身的存在。

也就是说，精神分裂性自我必须理解为这样一种企图：陷于基本的存在性不安的个体，面对根本的危险，努力寻求补偿性的安全感。在这种基本的存在性不安中，有一层面与“自我”具有着相当特殊的联系，这一层面即是：个体对自身生动性之主观感觉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他人的感觉；这些他人威胁着个体这种不确定的感受。这一问题将在“自我意识”一章得到更为充分的考虑。

与世界的自发的、自然的、创造性的关系，是一种摆脱了焦虑之束缚的关系。一旦缺乏这种关系，个体的“内自我”就会产生一种全面的内在贫乏感；到最后，个体会感到自己的内在生活中充满了空虚、死寂、冷漠、枯燥、无能、荒凉、无意义等等。例如，个体会强烈地感觉到想象力和情感生活的枯竭。一位患者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他决心把自己与现实相隔离的结果。他指出，他最终未能从现实获取任何东西去补给自己的幻想。

另一位患者则陷于一种摇摆状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感觉体内充满力量，喷薄欲出；随后几个月，他又感到内在一派虚空和死寂。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躁狂”期亦即他感觉自己内在力量喷薄欲出的时期内，他真实的感觉也不过

是：体内装满了高压的炽热空气，此外别无他物，由此产生了他那种膨胀欲裂的感觉。精神分裂性个体经常用这样一些术语谈论自己；而同样这些术语，我们则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合理地用于谈论自我所感觉到的虚空——自我感到：它自己即是虚空。

如果上述患者谈到他自己的空虚、无意义、冷漠、荒凉、枯燥等等，是与丰富、有意义、温暖、友谊相比照而言的；如果他还相信，在这广大的世界上仍存在着这些美好的东西（当然，在患者身上，这种信念通常发展和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幻想，与任何直接的经验相比较，便能看出是不正确的）——那么，在患者身上，就可能产生不同情感的剧烈冲突。本来，他感觉到剧烈的渴望，希望得到他人拥有而自己却无的东西；可后来，他会发展出疯狂的嫉妒，仇恨一切他人拥有而自己却无的东西，甚而希望破坏世上一切善和一切新鲜美好富足的东西。当然，这些感情也可能被另一些相反的心态——如轻蔑、藐视、反感或漠然——所冲淡或抵消。

患者身上这种虚空感，这种内在的贫乏感、虚浮感和无价值感，如果压倒了他那虚幻的全能感，那么，也可能成为巨大的动力，驱使患者去“接触”现实。荒漠枯瘠的灵魂或自我因而渴望新的生机，但是，它不仅仅渴望分离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而且渴望完全被他人所浸泡，所充满。

詹姆斯（参见本书边码第 143 页以下）曾经诉说：一个夏日黄昏，他独自在公园散步，看着一对对情意缠绵的情侣；突然间，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他与整个世界融为了一体，与天空、树木、花草融为了一体，也与那些情人们

融为了一体。恐怖驱使他跑回家里，沉浸到书本之中。詹姆斯对自己说，他无权参与这样的经验；但实质上他是恐惧，他害怕当他的自我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他就会丧失自己的身分。他知道，要么就沉溺于自我，陷于极端的孤独，要么就完全溶化到世界之中，舍此别无中庸之道。他害怕融入自然，被自然吞没，害怕由此失去自我而无法挽回。然而，他最畏惧之物，也是他最渴望之物。正如霍普金斯所说，红尘之美，是危险的。如果上述个体能记取他的忠告，那么无论怎样，事情都会好得多。然而，这正是我们的个体所无法做到的。

丰富在彼，丰富被渴望着；与此相对，虚空在此，在个体内部。然而个体感到，不丧失存在的参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个体必须牢牢抓住他的孤独（缺乏自发、直接之关系的脱离现实的状态）不放，因为这样他就抓住了自己的身分。个体的渴望是完全的融合。然而，这同一渴望又是他恐惧的来源，因为它会带来自我的终结。个体不希望两个“意气相投的”存在者之间那种相互给予和获取的关系，他不接受辩证的关系。

霍普金斯 (G. M. Hopkins, 1844—1889):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富于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所作诗歌把纤细的情感、知识的巨大力量和强烈的宗教情感相结合，对 20 世纪主要诗人艾略特、托马斯等有明显的影响。

——译注

柏拉图认定，友谊只能存在于“意气相投的”存在者之间。然而，《吕西斯》一书中关于友谊之可能性的讨论，却陷于这样的困境：如果两个存在者并不“想要”什么，那么他们为什么想要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呢？正是在这一根本的问题上（他的自我本已充实还是“想要”什么？），精神分裂性个体的生活容易触礁沉没。

——原注

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个体的孤独的自我之失落这一经验，在一定的情形中能得到容忍，而不会有太多的焦虑。可能而非必然的是，个体可以把自己失落在音乐欣赏或各种准神秘主义的经验之中；其时自我感到与非自我融为一体，这一非自我也许是所谓“上帝”。然而，自我逃避其自身单调沉闷之交际的渴望，一般说来会遭遇两种不可克服的障碍：焦虑与罪感，它们正是上述渴望所激发的。前面已多次谈到因被吞没而丧失身分所引起的焦虑。当然，从他人取自身所欲取，同时又保持对获取过程的控制，方法之一即是偷取。

精神分裂性的偷窃和被抢劫幻想，即是上述困境的产物。如果你从他人偷取你之所欲取，那么你还能保持控制；你没有任人给予。但是问题在于，偷窃的意图，会被个体作出病态的推广，即认为自己反过来也会被偷窃。偷窃的欲望会孕育被抢劫的恐怖。通过偷窃所获取的任何东西，又会被他人偷回去，这两种幻想常常是前后相随的〔参见第九章关于萝丝(Rose)的个案〕；自己拥有的任何东西，最终都会失去——不仅是自己所拥有，还包括自身之所是，即包括自己的自我。因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常声称，他们的“自我”被偷走了，甚至防御这一持续危险的机制也被偷走了。

自我的自我封闭，其形成的最后工程，是由其自身的罪感决定的。在精神分裂性个体的罪感中，也有着前述二难困境：万能与无能、自由与奴役、幻想中的无所不是与现实中的虚无。在个体的存在中看来有着各种各样的罪感来源。由于个体的存在被分裂为不同的“自我”，因而必须弄清楚，哪一个自我有着罪感，为什么产生罪感。换句话说，在精神分

裂性个体内部,不存在并且也不可能存在不相互冲突的罪感。一般而言,可以假定,某种罪感也许源于假自我,而另一种罪感也许源于内自我。然而,如果我们把假自我系统可能具有的任何罪感称作假罪感,那么,我们就必须小心避免把内自我视为“本真”或真正罪感的来源。

后面,我将在临床资料(参见边码第129页)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出更深入的讨论;在此,我只希望略作准备。

如果说精神分裂性个体会相信什么的话,那么,他只相信自己的毁灭。他不能相信,自己可以填充自己的虚空而不会丧失什么。在他眼里,自身之爱以及他人之爱是破坏性的,因而是可憎恨的。被他人爱,危及他的自我;而他的爱,对他人也同样危险。他的孤独并不完全是为自己的自我,也出于对他人的关注。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允许任何人去触摸她,但这并非因为他们会伤害她,而是因为她认为自己会电死他们。这种反应不过是精神病性质的表达方式,而精神分裂性个体每天都有感于此。他会说:“我的爱对所爱者是不公正的。”接下来,对于他可能爱及的人或事,他会“在内心”加以摧毁,但是,他的用意正在于保护他(它)们免于被真正的现实所摧毁。因而,如果说,这世上无所向往,无所嫉羨,那么也就无所爱;但是,这世上也不存在什么东西可以被伤害,被他损削为无。这样,他的最后一着,只能是谋杀他自己的“自我”,然而这并不像用刀抹断自己的咽喉那般容易。于是他坠入非在的漩涡以逃避存在,可又拼命在自己面前维护自己的存在。

第六章 假自我系统

“内自我”忙于幻想和观察，全神贯注。它观察知觉和行动的过程。经验并不直接冲击这一自我（或者说，这无论如何总是其意图），而个体的行动并不具备自我表达的性质。建立与世界的直接关系是假自我系统的职责。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一系统的诸特征加以讨论。

必须指出，下面给出的对假自我系统的描述，是特别就

要想不为自己而存在，假自我是一种方式。关于假自我这种非本真的生存方式，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研究，试图对之作出理解。这些研究属于生存论传统，它们是：克尔凯郭尔：《对死的厌倦》（1954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53年）；萨特在《存在与虚无》（1956年）中关于“坏信仰”的讨论；宾斯万格：《生存失败的三种形态》（1952年）和《艾伦·韦斯特病案》（1958年）；R·库恩（Kuhn）：《伪装现象学》（1957年）。在心理分析传统之内，也有一些与此至为相关的研究，如：狄尔茨（Deutsch）：《几种情感紊乱及其与精神分裂症之关系》（1942年）；费尔贝恩（Fairbairn）：《关于人格的精神分析研究》（1952年）；冈特里普（Guntrip）：《费尔贝恩的类精神分裂症反应理论》（1952年）；温尼卡特：《文集》（1958年）（参见各处）；沃尔伯格（Wolberg）：《“边缘”患者》（1952年）；以及沃尔夫（Wolff）：《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中的精神分裂症》。

——原 注

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给出的，也即关于特殊形式的精神分裂性存在。每个人，就其个人而言，都卷入了这样的问题：他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就其真实本性而言为真”。在临床实践中，以癔症和轻度躁狂患者为例，他们都有不作为自己而存在的方式。此处所要描述的假自我系统，是作为“内”自我的互补而存在的；这一“内自我专注于如何维持其身分和自由，其手段是超越、非身体化——亦即保持自己绝不被控制，被固定，被困陷，被占有。它的目的是要成为纯粹的主体，而排除任何客观生存。因此，除某些确定的、可能的安全场合外，个体一般都倾向于将其整个客观生存视为假自我的表达。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也像后面将更深入地看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不是二维的；如果他不具有二维的身分——这身分是为他人之身分 (identity-for-others) 与为自己之身分 (identity-for-self) 相结合的产物；如果他不能既主观地生存同时又客观地生存，而只有一个主观身分，一个为自己之身分——那么，他不可能是现实的。

“不戴面具的人”的确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质疑：世上到底有无这样的人。从某种角度说，每个人都戴着自己的面具；同时另一方面，存在着许多事物，我们并未将自己充分置入其中。“日常”生活看来就如此这般，很难是别的样子。

然而，就一些确定的重要方面而言，精神分裂性个体的假自我有别于“正常”人的人格面具，也有别于作为癔病患者典型特征的假面。为避免三种假我形态的混淆，有必要先作一简单的区分。

就“正常”人而言，他相当一部分行动实际上是机械的。

然而，这些实质上是机械的行为，并非其行为的全部。它们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地排斥自然的、自发的表达，也不会完全“不近情理”，不至于让个体感觉它们是外来的异己之物而试图取消它们存在的权利。它们不会以一种自主的、强迫性的方式，使个体感觉它们是“活的”，甚而至于感到有被它们谋杀的危险，就好像它们已不是他自己的行动。总而言之，“正常”个体不会被痛苦的张力所驱使，去攻击或摧毁自身内部这种异己的现实（即机械行为），就好像这种现实有着几乎分离的（自己的）存在。

然而，与此相反，“正常”人所不具备的上述特征，在精神分裂性的假自我系统中却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癡症患者的特征在于，他把自己与自身的所作所为分离开来，作为对自身行动的规避。对于这种技术，就我所知，最好的描述见于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论述“坏信仰”的一章。在那里，对于这种假装自己不在自身行为“之中”的技术，萨特给出了出色的现象学解释。他指出，这种对自身行动中充分的人格含义的逃避，是癡症人格为自己建立的一套生存方式。当然，萨特的“坏信仰”概念，其内容远非仅此而已。

癡症患者试图通过其行动达到自身的满足，而行动的意义却又是他所拒斥的。他的行动使其里比多欲望和攻击欲望获得满足，这些欲望是针对他人的，他自己无法了解其意义。因而，便产生了他那种随之而来的冷淡，也导致了他与自身言行之意义的荒唐的分离。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状态与精神分裂性个体之存在中的分裂，相去甚远。后者的假自我，并

未作为实现和满足自我的工具。在精神分裂性个体身上，当假自我的欲望明显得到满足时，自我可能仍然处于根本的饥饿状态。这时，假自我的行动并不去“满足”“内自我”。

癔症患者假装认为，他那些具有高度满足性的行为仅仅是假装的，或者没有含义，或者没有特殊含义，或者，他不过是被迫作出这些行为而已。然而，在内心深处，他的欲望正是通过这些行为得到了满足。精神分裂性个体的假自我强迫性地顺从他人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自发的、不受我们控制的，给人的感觉是错乱的！非真实性、无意义性、无目的性等等，渗透了它的知觉、思想、情感、行动；它的彻头彻尾的死寂，并非第二手防御机制的产物，而是个体存在之基本动力结构的直接结果。

例如，一位癔症患者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他爱好数学，轻视文学。后来，学校里演出了一场《第十二夜》，要求每个学生就该剧写一篇文章。当时，虽然他讨厌该剧，但却通过揣度评论权威们的口味和偏好，写出一篇高度赞扬的文章。结果，这篇文章中了奖。“其中没有一个字表达了我的感觉，整篇文章都是为别人写的。”患者当时就这么想。然而，患者后来自己承认，他当时实际上已经真的喜欢这部剧了，而文章中所描述的，也是他的真实感受。但是，他当时不敢承认，因为这会使他陷入剧烈的内在冲突，他过去所建立的价值体系将受到震撼；同时，这还会完全破坏他对自身的认识。显然，这不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这只是癔症性神经症而已。

后来，患者开始在各个方面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所做的事情明明是自己内心希望的，可总要说服自己说，这不过是在做他人之想做而已。通过这种方式，他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尽管他自己难于承认这一点。也就是说，癔症患者的神经症反应，表面看来似乎表明他具有精神分裂性个体那样的假自我系统，但仔细考察就可明白，两者之间实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癔症患者总是假装不在自身行动之中，实际上却通过这些行动实现自己。如果他看到自身内部强烈的罪感，他就会感到害怕，其行动就将受到限制；换句话说，他会进入“癔症性”瘫痪，使其有罪的自我满足行动得不到实现。

关于精神分裂性的假自我，我们有几个特别清楚的案例：詹姆斯（边码第 140 页）、戴维（边码第 69 页）以及彼得（第八章）。

在个人身上，假自我系统总是极为复杂，包含着许多相互冲突的成分。在本章中，我们将试图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述；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上述相互冲突的成分逐一作出描述。

我们还记得，詹姆斯说：在他自己看来他不是人。在行为中，他让自己成为一样“东西”，仅仅为了他人而存在。他感到，母亲从未承认过他的存在。詹姆斯这种想法自有其道理。他感到，母亲从不认为他有自由和权利过自己的主观生活。只有从这种主观生活中，他的行动才可能表达他自己之

自主性的、整体的自我存在。然而，他只是母亲的傀儡，“我不过是她的现实的象征而已”。在詹姆斯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他只是向自身内部发展了主观性，却没有勇气让这主观性得到客观表达。当然，在詹姆斯的案例中，他还没有完全丧失客观表达，因为，詹姆斯能够十分清楚和有力地用话语表达其“真正的”自我。对此，他知道：“我不过说说话而已。”然而，如果注意到，詹姆斯除说话以外的所有行动，都不是由他自身意志支配，而是被一个异己的意志所控制（这一异己意志早已在他自己的存在中形成），那么，詹姆斯的话语就很难说是别的什么，而是反映了他母亲的意志。这一意志来源于与詹姆斯异己的现实，即他母亲的现实，现在通过詹姆斯自身存在内部的源泉发挥着作用。对于詹姆斯来说，他人必然总是首先意味着母亲，即是“作为母亲的那个人”。虽然，詹姆斯这一假自我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人格的扮演或可笑的模仿，但却并不必然是对母亲的模仿。眼下我们试图分析的，是个体对他人意愿或期望（或他觉得是他人意愿或期望的东西）的根本顺从。这通常表现在，个体过分地追求“表现好”，绝不¹做没要求自己做的事，绝不“惹麻烦”，绝不坚持甚至也不流露自己的意志。然而，表现好，并非是按个体自身的主动意愿完成各种事情，被他人所称好；而是被动地与他人而非自己的标准协调，并且还受到下述担心的激励：如果在实际中一旦成为自己，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可以说，上述顺从，部分说来是对个体自身真实可能性的背叛。但总的说来，这是一种隐藏和维护自身真实可能性的手段，而这些可能性绝没有变为现实性的危险。这只要它们完全收缩

到内自我之内就行了；对于这个内自我来说，一切事情在想象中都是可能的，但在现实中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过，假自我产生于对他人意愿或期望（或想象的他人之意愿或期望）的顺从。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假自我是荒唐的好。假自我也可能是荒唐的坏。假自我中这种顺从的基本特征，在詹姆斯这样一句话中得到了表达：他是“一种反应，是对他人说我是什么的反应”。这反应是一种行动，是对他人关于个体之看法的迎合；这反应也是一种逃避：使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意愿免于实现。通过这反应，个体成为他人所期望的样子，只有在幻想中或镜子前，才能成为他“自己”。因而，为了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想象的自己在他人眼中之形象）——或者说那个东西——保持一致，假自我真的变成了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假罪人，也可能是假圣人。但是，在精神分裂性个体身上，就其整个存在而言，并不以这种方式顺应或遵从他人。在他的存在中，基本的分裂表现在，他在外部顺从，在内部却抑制自己的顺从。

埃古 总是假装是他之所不是。事实上，《奥赛罗》这部剧，整个说来充满了这样的内容，亦即该剧所谓的“看上去是这样，实际上是那样”。但是，在《奥赛罗》或莎士比亚的其他剧作中，却找不到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个体。莎士比亚剧中的角色之所以“看上去是这样”，是为了实现他们暗中的谋算。与此不同，精神分裂性个体之所以“看上去是这样”，是因为他害怕不是这样；在他的想象中，这是他人内心对他

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打算，但他只是消极地为自己而努力。换句话说，他对外部的顺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但是，他也可能“一气之下”攻击自身的顺从性（见后面边码第 102 页）。

作为假自我之表达的可观察行为，常常是十分正常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看到模范的孩子、理想的丈夫、勤奋的职员。然而，这种假象在因袭相传中变得越来越僵化，到最后发展形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性格特征。探讨这些性格特征，有着不同的方向和线索，但只能逐一加以讨论。

在假自我对外界的顺从性中，最为清楚的一个方面，是这一顺从性中隐含的恐惧。这恐惧是明显的：为什么别人不照他的意图行动，却照他人的意图行动呢？此外，在这种顺从中，也必然存在着恨：除了那使个体自己经受危险的东西，什么是适当的厌恨对象呢？但是，自我所承受的焦虑，排斥了自我直接发泄其厌恨的可能性。当然，在精神病中情况例外，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所谓精神病，在某些时候，只不过是假自我面具的突然揭去；这一假自我面具是为了维持个体行为的表面正常性，有可能从很久以前开始，它就无法直接反映那隐蔽的自我了。于是，在这样的时候，自我会突然爆发剧烈的责难，其矛头所向，直指假自我过去长期顺从的那个人。

个体会声称，（他的假自我所长期顺从的）这个人（母亲、父亲、丈夫、妻子等）一直企图害死他；或者声称，这个人一直企图偷走他的“灵魂”，或他的头脑。他会说，这个人是独裁者、施虐者、凶手、残害儿童的人，等等。现在对于他

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承认自己眼下的感觉，这样，他这些“妄想”就好像成了真的。

然而，这种厌恨却还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就某种意义说，这种形式与正常状态相当接近。假自我有着这样一种倾向：它会从所顺从的人身上袭取越来越多的性格特征。这种对他人的袭取可能会发展为对他人人格的全面扮演。当这种人格扮演变得可笑时，对人格扮演的厌恨就会显露出来。

假自我对他人的人格扮演，并不完全像它对他人意志的顺从。这是因为，在人格扮演中，假自我可以直接与他人意志相左。假自我的人格扮演可以是竭尽心力的，正如我们前面从戴维所扮演的一些角色所见。但也正如戴维的案例所表明的一样，人格扮演可能是强迫性的。个体可能不清楚，他的行动到底把对他人的人格扮演进行到什么程度。人格扮演可能具有相当的持续性和恒久性，也可能昙花一现。最后，实际完成的人格扮演可能更多针对着幻想的角色而不是针对其人本身，正好像顺从更多是对幻想角色而非对其人本身的顺从。

人格扮演是自居认同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体部分袭取了别的某个人格身分。在人格扮演中，扮演者并不必整个地卷入其中。通常见到的，是一种亚整体的自居认同过程，局限在对他人行为特征的袭取——如他人姿态、风格、表情等等的袭取，一般说来包括他人的各种行动。在更为整体性的对他人的自居认同的过程中，人格扮演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成分。然而它的一个功能看来是：防止发生范围更大的自居认同（那样就意味着个体自身身分的更大丧失）。

参考戴维的情况，从一开始，他的行动就一直是对父母之意愿和期望的几乎完全的顺从。换句话说，他是个顶呱呱的模范孩子，绝不惹麻烦。父母对他的行为完全满意，总是满怀骄傲地向别人谈起——这绝非好兆头。

戴维 10 岁那一年，母亲去世；此后，戴维在广泛的范围之内，表现出对母亲的自居认同：他穿上母亲的衣服，对镜打扮，按母亲的习惯为父亲收拾屋子，甚至为父亲补袜子、织毛衣、缝纫、刺绣、用墙毡装饰屋子、选购椅罩和挂帘等等。戴维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了他母亲，外人十分明了，他父母亲却不清楚。还可以看出，戴维变成他母亲，是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尽管这意愿从未直接表达过；此外，父亲也不大注意戴维的存在。这样，到 14 岁时，戴维的假自我已经发展成为极为复杂的系统。他没有意识到与母亲的自居认同发展到何种程度，但却强烈意识到扮演女性角色的冲动，以及摆脱女性角色的困难。

为使自己免于沉湎于这个或那个女性角色而不能自拔，戴维竭力培养与他人的感情。尽管他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想要维持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形象（这是他苦恼不堪之假自我的朴素理想），他的假自我却仍然整个地成了一个多元化的人格扮演系统。其中某些人格，从社会的角度考虑是“可能的”，另一些却不是；某些人格是强迫性的，另一些却是苦心经营的。但不管怎样，总的趋势是，这种人格扮演越来越难于维持，在这种扮演中总会产生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

一般说来，在完善的正常性和调节能力的固有表现中，会悄悄混进某种反常行为、某种强迫性的过度行为。它会沿着

反常的方向，把正常性的表现变成一幅漫画，导致烦扰、不安，甚至憎恨。

例如，詹姆斯在某些方面“学父亲的样儿”。他父亲身上一个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是：老是要已经吃得很饱的人再吃一点，即便这些人声明不能再吃，也不放过。詹姆斯在这一方面也“学父亲的样儿”。他总是很有礼貌地请别人吃饭，要别人再吃一点儿。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种慷慨大度的关心，希望别人吃饱。可是，这种恳请很快就显示出是强迫性的，让人无法忍受，很快使人觉得讨厌，弄得詹姆斯自己尴尬不堪。结果，詹姆斯认为，在他父亲的行动中，有着攻击性的内涵。他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夸张地表达这些内涵，使之变成揶揄和怒气。他实际上是利用他人激发自身某些感情，这些感情本来是针对他父亲的，只是他无法直接在父亲面前表达，而是通过关于父亲的强迫性的漫画，表达对父亲的讥讽。

精神分裂性的反常行为多系如此，即个体最初表现驯服和顺从，最后却表现相反的意愿乃至憎恨。

假自我系统对他人意志的顺从，在自动服从症、动作模仿症、语言模仿症以及精神分裂性紧张症的腊样弯曲中，表现得最为极端。在这里，服从、模仿、复现等行为越出了正常界线，变成了对服从、模仿、复现对象的滑稽讥讽和隐蔽的控诉。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模仿嘲弄其憎恨或恐惧的对象，作为对这些对象的可行的攻击手段。这或许是患者秘密的玩笑之一。

自居认同作用对象之最可恨的方面，是通过人格扮演中的揶揄、蔑视、嘲笑或憎恨而暴露出来的。戴维对其母的自

居认同，最后演变为强迫性地扮演一位恶意的女皇。

“内在的”隐秘自我憎恨假自我的性格特征，同时它也害怕假自我的性格特征，因为，采用一个异己的身分，总会使个体感觉是对自身身分的威胁。自我害怕被自居认同的扩张过程所吞没。在某种程度上，假自我系统的行为与人体网状内皮组织系统的行为相似，它阻挡和包围入侵的危险异物，从而防止异物在体内进一步扩散。但是，对于人体网状内皮组织系统来说是正确的防卫系统，对于假自我系统却是错误的，因为，内自我并不比外自我更为真实。戴维之隐秘的内自我，变成了精明的控制者，把他的假自我当作傀儡加以操纵；而过去，他觉得自己一直是母亲的傀儡。这也就是说，他母亲的影响既及于内自我，也及于外自我。

关于这一点，一位 20 岁姑娘吉恩的案例给我们以启示。这位姑娘容貌不佳，并为此产生的“自我意识”而苦恼。她为自己浓施粉黛，结果，虽然掩去一些瑕疵，却平添几分滑稽可笑。那面具般的妆容令人不快，根本没有改进她的形象，与她试图掩饰丑陋的初衷不符。仔细考察这一案例，可以发现，这位姑娘对自己容貌的态度，反映了她生活的根本问题：她与自己母亲的关系。

她曾经十分沉湎于对镜细细自量。某一天她突然感到，自己的容貌是多么令人厌恶。多年来，她一直认为自己长得跟母亲一样。“厌恶”这个词包含着模糊的意思。她厌恶镜子里那张脸（她母亲的脸）。她也看到，那张脸从镜中看着她，也充满了厌恶；看着镜中这张脸，她与母亲产生了认同，与母亲合而为一。这时，她既是自己，又是自己的母亲，正看着

女儿脸上的厌恶。这也就是说，她用她母亲的眼睛，从镜中那张脸上，看到了自己对母亲的厌恶；还看到了，并憎恶着母亲对自己的憎恶。

她与母亲的关系，从她母亲一方而言，保护她有些过头了；从她自己一方而言，则过分依赖。实际上，她不能承受对母亲的厌恶，也无法让自己承认母亲对自己的憎恶。她内心世界中得不到直接表达和公开承认的一切，日积月累，导致她目前的状态。问题的核心似乎在于，在她眼里，自己的面容是令人厌恶的（充满厌恶）。她厌恶它，因为它与母亲的面容如此相象。她害怕自己所看到的。她用化妆品掩盖自己的面容，既为隐瞒自己的憎恶，也是对母亲面容的一种替代性的攻击。她生活中其他方面也显示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她身上，孩子对父母应有的礼貌和服从，不仅变成对母亲各种愿望的消极接受，还变成完全的自我隐瞒，并进而变成对母亲所希望于她的一切的嘲弄的模仿。她把自己的顺从变成了攻击，向所有的人展示她真自我的这一滑稽表演，那既是对母亲的漫画，也是对自己礼貌和服从的“丑陋的”模仿。

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当他人与个体的存在不可分割时，个体对他人的憎恶就集中在他人的形象之上；而与同时，暂时或长久地模仿他人的人格，就成为自身存在的方式，这一方式似乎提供了安全感。在他人的性格之下，个体的行动会比过去远为相称、自然、“可靠”——用D女士的话说，个体情愿承受由此导致的虚废感。这种虚废感是上述行为的必然产物。个体认为，坦率表达自己可怕的孤弱无助和迷惑的危险举动，将比虚废感更难承受，因为，那意味着作为自己而

不是他人而存在的开端。

在上述过程中，假自我系统越来越没有生命力。某些个体会发展到这样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生命变成了机器人。这种变化（显然）成了个体存在的前提。

假自我系统展示其“人格”，这“人格”不管怎样总算是长久性的；在此之外，正如我们曾经提及，假自我系统或许还不断企求小规模、暂时的自居认同。个体会突然发现，他突然获得了一种习气、一种姿势、一种语调，他的嗓音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成分，来自别人，不是“他的”。常常，他知道自己特别不喜欢那种新习气。对他人行为特征的暂时获取，并不必然是精神分裂性的问题。但是，在精神分裂性的假自我系统身上，这种现象特别容易发生，并具有特别的持久性和强迫性。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的全部行为不是别的，而是他人之诸般行为特征的大杂烩。唯一的区别是，这些行为特征在患者身上被表现得更为突出，与它们原来的背景不协调。下面的例子出自一位十分“正常的”人。

一位女学生名叫麦克娜姆，她对一位名叫亚当姆斯的男教师产生了强烈而又冲突的感情。有一次，她恐怖地发现，她把自己的名字拼成了“麦克当姆斯”。她回忆说：“我当时恶心得直想砍掉自己的手。”

他人的各种特征置存于个体的行为之中，宛如留在体内的弹片。如果能与外部世界保持明显愉快的关系，那么，个体就会不断挑剔这些异己的碎片，它们（正如他感觉到）不断从内部挤出。这些来自他人的行为侧面置留于属主内部，常常使属主感到恶心和恐怖，并导致憎恶和攻击，正如我们在

刚才那位女学生身上所看到的。她说：“我直想砍掉自己的手。”可事实上，这种破坏性的冲动恰好违背着她自己的手。换句话说，要攻击这种从他人“摄入”的行为碎片，必须以伤害属主自身的存在为前提（正如吉恩掩盖自己的面容，以达到攻击母亲的目的）。

如果个体的一切行为都变成强迫性的，与其隐秘的内自我相离异，而内自我则因此完全放弃自己，投入对他人行为的模仿、扮演、漫画等等，那么，个体就有可能试图剥夺自己的一切行为。这在临床上即是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退缩表现。这就好像为治疗全身性皮肤感染而剥掉自己的全部皮肤。剥掉真正的皮肤虽不可能，但精神分裂症患者却可以剥掉自己行为的皮肤。

第七章 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按照其通常的用法，具有以下两种含义：其一是自己对自己的意识；其二是从他人的角度对作为客体之自己的意识。自我在第一种情况是自己眼中的客体，在第二种情况是他人眼中的客体。

自我意识的两种形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精神分裂性个体身上，两者都受到强化，并且都变得具有强迫性。在精神分裂性个体对自身行为过程的意识中，这种强迫性常常使他苦恼不堪；同样，在一个充满他人的世界中，他对作为客体的自身身体的感觉，也为这种强迫性所左右，这也使他苦恼不堪。个体感到自己始终被人注视，或随时都可能被注视。这种被强化了的感觉，从原则上说，本可归结为身体的事情，但是，觉得自己被人注视的先入之见，却可能凝结为这样一种想法，即：自己精神的自我是易被穿透的、脆弱的；个体会觉得，别人可以看穿他的“心”或“灵魂”。这种“透明玻璃”的感觉，通常是一种隐喻或明喻。然而在精神异常的状态中，他人的凝视或审察，会使个体觉得像是穿透了“内”自我的核心。

强化了自我存在意识（无论这存在是作为自己意识的

客体还是作为他人意识的客体), 普遍见于青春期的个体, 并伴随着众所周知的腼腆、羞涩, 以及局促不安。对于这样一些表现, 一般人容易以“罪感”加以解释, 不过, 如果说个体的自我意识是“因为”其罪感的秘密(例如手淫), 那么也算离题不远。青春期个体大都手淫, 其中为数不少的人害怕这种行为会从自己脸上显现出来。但是, 如果说“罪感”是理解自我意识的关键, 那么它为什么只产生这些特殊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呢? 罪感不是还有许多其他形式吗? 同样, 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他人眼里是一个尴尬的或可笑的客体, 也并非唯一的感受方式。在这里, “罪感”就其本身的内涵而言, 并不能帮助我们。生活中许多人怀有深刻的、毁灭性的罪感, 但他们并不具有格外更多的自我意识。更有甚者, 例如, 有人即便怀有罪感, 也还是能撒谎, 并不害怕会从脸上显出来, 也不怕报应。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 会有一个重要阶段。其时儿童知道, 当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看不到他时, 他们就无法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们也无法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除非他自己告诉他们; 而且, 只要他自己不“露马脚”, 他的“秘密行动”就能始终保持秘密。那些因为各种原始的巫术般的畏惧而不能守秘或不能撒谎的儿童, 其根本问题在于尚未确立自己的自主性和身分。当然,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反对撒谎, 但是, 没有能力撒谎, 肯定不是最好的理由。

自我意识的人感到自己是他人过分关注的对象, 他人对自己的兴趣, 超过了应有的程度。自我意识的人走在大街上, 碰上买电影票的长队, 这时他会“悄悄溜过去”; 多半, 他会

沿着街道另一边绕过去。自我意识的人通常只身进餐馆，选一张没有人的桌子坐下来。在舞会上，自我意识的人要等到别人已翩翩起舞，才有勇气参加进去，等等，等等。

十分奇怪的是，那些被强烈的焦虑所折磨的人，当他们当众表演或行动时，通常都必然不是“自我意识的”；那些通常表现出极度自我意识的人，在当众表演或行动时，则可能失去他们强迫性的先入之见。这种现象令人难以一下子加以理解。

这种自我意识现象的进一步的特征，也许又使人试图用罪感来理解我们眼下的难题。的确，自我意识的个体觉得别人在注视他，在他的想象中，这种注视总是于他极为不利。他害怕自己看上去像个傻瓜，或者害怕别人认为他想炫耀自己。如果某一位患者表达了这样的幻想，那么容易使人想到，他有着隐秘的、未被承认的欲望需要展示，他想引人注目，出类拔萃，使旁人相形见绌。但由于这欲望中充满了罪感和焦虑，使他无法体验。因此，这样一种欲望的幻想，即便得到满足，也无丝毫快感可言。因而，个体将成为隐蔽的裸露癖，在无意识中，他的身体等于他的生殖器。因而，当他裸露自己的身体时，会有潜在的满足，但伴随着神经症的罪感，这使他产生阉割焦虑。从现象学的意义上说，这种焦虑“代表了”个体的“自我意识”。

我认为，以这样一些术语来理解自我意识，是逃避了自我意识个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这样的个体，他们的基本生存状态呈现存在性的不安；他们的精神分裂性的本性，既是其存在性不安的一种（诱因和）直接表达，也是克服存在性

不安的企图。对这企图,还可用稍微不同的术语略加强调:个体想使自己免于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来自争取自身身分之安全感的失败。

在存在性不安的人身上,自我意识起着双重的作用:

1) 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如果他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那么他人就能使自己确信自己的生存,也确信他人的生存。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与恳求者谈》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小说中,恳求者的出发点正是存在性不安的生存状态。他指出:“我始终无法从自身内部找到证据,表明我活着。”也就是说,寻找自身的生动性和真实性,成为恳求者根本的生存难题。为了寻找证据,他把自身看作现实世界中的客体。然而,由于他的世界是非现实的,他只好把自己作为他人世界中的客体,因为,对于他人来说,客体是真实的、现实的,甚至是宁静美丽的。至少,“……事情只能如此,因为,我常常听到人们就是这样谈论这些真实、宁静、美丽的东西。”为此他说了心里话:“……让人们注意我,这就是我生活的目的。听了这话可千万别在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另一个因素是自我在时间上的非连续性。一旦自我的身分在时间上出现了不确定性,个体就会表现出这样的趋势,试图依赖空间的手段来确定自己。也许,对于被看见的人来说,这可以说明被看见的极端重要性。然而,有些时候,最确切的信心也会很快被自我意识所取代;当时间被经验为一系列瞬间的连续时,这一点尤其如是。对于这样的个体来说,如果对自己的时间性自我失之疏忽,而导致时间链条的缺环,个

体就会极度不安。杜雷 (Dooley) (1941 年) 曾举出不同的案例, 来说明这种时间性的自我意识——它是个体“反抗被取消恐惧之斗争”的一部分, 也是个体“反抗被吞没被粉碎之恐惧、反抗丧失……身分……”、维护自身完整性之努力的一部分。杜雷的一位患者说: “狂欢节那天晚上, 我把自己给忘了。我入了迷, 忘了当时是什么时候, 自己是谁, 身在何处。突然间我发现了这一点, 害怕得要死, 随之产生了虚幻感。我再也不敢忘掉自己。从那以后, 我总是边干事儿边看钟, 否则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第 17 页)

2) 在一个充满了危险的世界上, 如果随时都可能为他人所注视, 那就意味着自始至终把自己暴露在危险面前。可以理解, 自我意识正是对这一点的意识。显然, 要预备这种危险, 需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他人无法看见自己。

正因为如此, 在实际情况中, 问题必然总是那么复杂。卡夫卡的恳求者之所以把引人注目作为自己的目的, 是因为这能缓和他的非人化、非现实状态, 以及内在的僵死。他需要他人觉得他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因为他无法从自身内部证明自己活着。然而, 这首先需要对他人的付出信任, 相信他人具有宽厚善良的理解力, 但这种宽厚善良的理解力, 却并非随处可见。一旦他意识到什么, 什么就不再真实, 尽管“我总觉得他们只是昙花一现”。不用奇怪, 这样的人对他人关于他的意识, 多少是不信任的。设想, 如果他人反过来也对他抱有这种“昙花一现的感觉”, 那又会怎么样呢? 那时他还会相信他人的意识胜于相信自己的意识, 从而使自己相信自己活着吗? 恐怕不会! 事实上,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这样的人

会觉得，他危险之至的处境，会成为他人意识的对象。这是一种恐惧，我认为，珀尔修斯和美杜莎之头——那“邪恶之眼”——的神话，以及死亡的困惑，能够解释这种恐惧。

事实上，从生物学上可以认为，如果一只动物把自己暴露出去，它就面临随时被敌人攻击的危险。任何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敌人；暴露自己，就意味着生物学上根本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使用伪装。下面一段文字是一位患者的自述，她在12岁那年，曾使用一种巫术般的伪装来帮助自己克服焦虑。

那时我大约12岁，常常不得不独自一人穿过一座大公园到父亲的商店去。路途漫长而清冷。我想，当时我一定十分害怕。我不喜欢这件事情，天黑时尤其不喜欢，于是便设法做些游戏，让自己容易走完这寂寞的长途。大家一定都记得小时候数石块以及迷路时的感觉——我做的就是这种游戏。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只要久久地凝视周围环境，我就会融化到里面，消失在其中——就好像那儿亮开了一块虚空，我就消失在那虚空里面。就好像，你让自己觉得：你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也就是说，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但是接着你就会感到害怕，因为你无法鼓起勇气。当时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觉得与周围融为一体；然后又因为害怕，只好反复念着自己的名字，直到恢复正常为止。

在人类生活中，人会因为过分引人注目而产生各种焦虑，

这些焦虑使人的注意力转向自身。也许，这些焦虑有着生物学上的对应行为现象。人为了防备过分引人注目的危险，便试图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尽可能使他人难于识别自己。例如，奥本多夫（Oberndorf, 1950 年）就曾提出，非人化是一种防御机制，其目的是“装傻”。在第八章，我们将通过彼得的个案，较为详尽地考察这样一些防卫机制。

像每一个人，成为别人，扮演某人，假名，匿名，成为无人（从精神病学上说，假装没有人）等等，都是一些防卫机制。它们在某些精神分裂性和精神分裂症状态中，有着十分彻底的表现。

就刚才那位患者而言，当她感觉自己融没于周围环境时，便害怕起来。接着，正如她自己所说：“只好反复念着自己的名字，直到恢复正常为止。”由此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位患者那种特殊的焦虑防卫机制，恐怕只能是存在性不安的产物。如果个体的身分感得到牢固的确立，它就不会轻易失去。一位 12 岁的姑娘，不应该那么容易就失落在自己的游戏之中。因而，有可能，首先，正是这种存在性不安至少部分地诱发了她的焦虑；接着，她又以软弱作为逃避的手段。实际上，在詹姆斯、戴维、D 女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个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样的原理。就刚才那位患者而言，她通过融入环境而丧失了自主性的身分，实际上她失落了自己；而那被抛弃在虚空中、在愈益浓厚的夜色中，以及在危险中的孤苦伶仃的东西，正是她的“自我”。

可以对上述原理作出如下最具普遍性的表述：当面临丧失存在的危险，个体的防卫机制便萎缩为一种非在（non-be-

ing) 状态；然而同时，个体内心始终认为，这种萎缩仅仅是一种游戏、一种作假。

关于这一点，蒂利希（1952 年，第 62 页）写道：“神经症是通过逃避存在而逃避非在的方式。”个体的困难在于，他会发现自己一直在作假；他还会发现，他的确萎缩入了非在的状态，其程度比他所能想象的更严重。他本来十分害怕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丧失了自主感、现实感、生命感、身分感；从这种状态，他无法仅仅依靠反复念诵自己的名字，去重新获得他在生活之中的立足之地。事实上，前面那位姑娘的游戏正是这样走火入魔的。在她写下上面那段文字之时，她陷于严重的人格解体状态已经好几年了。

在所论问题范围之内，一切都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在第五章我们曾经指出，自我既害怕也渴望现实的生动性。自我害怕变得生动和真实，因为它害怕由此走向毁灭。“自我意识”就包含在这一矛盾之中。

那位 12 岁的小姑娘融没到环境之中；而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也有人很容易融没到他人之中，也害怕由此失去自己的身分。这样的个体把他对自身自我的意识用作与他人分离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被用来帮助支撑个体风雨飘摇的存在性安全感。对意识，特别是对自我意识的这种强调，分散为许多方面。例如，与癔症患者相比较而言，癔症患者多半只是很高兴能忘掉或“压抑”自身存在的各个方面；而精神分裂性个体的典型特征，则是力图使对自身的意识尽可能深广。

然而，我们已经指出过，在精神分裂性个体容易陷入的

自我审视中，是怎样充满了敌意。精神分裂性个体（此处也可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未沐浴在可爱的自敬自爱的温暖之中。自我审视很不恰当地被视为一种自恋。就此处所论而言，精神分裂性个体或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不属自恋之列。正如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说（见边码第 204 页），她被炙烤在一轮黑色的太阳之下，那黑阳闪着灼热耀眼的光芒。精神分裂性个体就是这样，生存于自我审视的黑太阳之下，那是一只苦痛而不祥的眼睛。自我意识的逼人目光毁灭了他的自发性和新鲜活泼的生机，毁灭了一切欢乐。一切都在那灼人的凝视之下雕谢枯萎；而在这同时，个体仍然强迫性地沉溺于对自身精神和肉体过程的顽强观察，尽管从深刻的意义上说个体并非处于自恋状态。

与此极为相似的一种情况，前面已用不同的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精神分裂性个体将他与他自己的关系非人化了。换句话说，通过对自身存在之生动的自发性的严酷审视，他伤害了这种自发性，把它变成了死气沉沉、了无生气的某物。对他人，他复如此；反过来，他也害怕他人以己之道（僵化）还己之身。

现在我们可以指出，由于个体害怕不死气沉沉、了无生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他畏惧现实的生动性），他也就害怕失去对他自己的意识。对他自己的意识始终是一种保证，使他能继续生存下去，虽然这种生存也许不得不是一种僵死的生存(a death-in-life)。对外界客体的意识变得不那么危险了。这样，意识变成一架雷达、一架扫描装置。这样，个体感到客体是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这种意识发射死光，它具有两种

能力：僵化的能力（把自己或他人变为石头，变为物体），以及透视的能力。于是，只要个体感觉到他人的注视，便会产生持续的畏惧和怨恨，害怕被变成他人拥有之物，害怕被他人洞穿自己，害怕被他人的力量所控制。这样的个体无法达到自由的境界。

为预防上述危险，个体也许会试图将他人变为石头。然而不幸的是，一旦他人被自己的目光僵化为石头，自然就无法继续注视。于是，个体成为唯一能看见自己的人。这一过程走向极端后，便会反过来沿相反的方向进行，个体会焦急地渴望摆脱阴森、严酷的自我意识；而成为被他人洞穿和控制的被动之物，反倒成了一种拯救。在这样的摆荡中，个体别无选择，永无安宁。

这种强迫性的先入之见（觉得自己被他人注视，甚至仅仅是可能被看见），意味着希望不被注视、不可见的幻想。前面已经看到，如果可被看见这件事虽给人困扰，却能为生存提供保证，那么，它就将具有两种同等的意义。

“自我意识”的人陷于困境，进退两难。他可能需要被他人注视和认可，以便维持他的真实感和身分感。然而同时，他人又意味着对他之身分和现实的威胁。为了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个体会作出极为复杂微妙的努力，用我们描述过的隐秘的内自我和假自我行为系统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例如，詹姆斯感到，“他人提供我的生存”。他觉得自己是虚空和无人。“除非他人在场，我无法有真实感……”然而，他人又总让他感觉不安，因为与他人相处（跟与他自己独处一样）使他感到“危险”。

就这样，“自我意识”的人强迫性地寻找同伴，却又绝不允许自己在他人面前“成为自己”。他害怕孤独，竭力避免社会性的焦虑，但又从不与他人真正相处。他之所说与所想很难相符，扮演的社会角色总与真实的自我相去甚远。即便某人开的玩笑没有意思，他也尽力让自己发笑；但内心感到高兴时，却表现得神色厌烦。对“的确”有好感的人，他相当冷淡，却与内心并不喜欢的人交友。因此，没有谁真正了解他，理解他。只有在孤独中，他才感到安全，才有可能成为他自己，当然也伴随着空虚感和不真实感。只要有他人在场，他便竭力伪装自己，扮演暧昧的角色。他的社会角色让人感到虚废。他最为渴望的乃是“一次认可”，但真正面对认可时，他又没准会不知所措，甚至感到害怕，从而“放弃自己”。

他越是隐藏自己的“真自我”，他在别人面前的表现就越是虚假，越带强迫性。结果，他会发展到极端的自恋，极端的裸露癖。他实际上害怕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并因此厌恨自己；然而，他却又强迫性地暴露那些他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他衣着浮华，不停地高声谈论，想引人注目。他总是把注意力引向自己，同时却又把注意力引离他的自我。他的整个行为是强迫性的；满脑袋想的是引人注目，渴望为人所知，同时却对此畏惧不已。

在这里，“自我”变成了一种不可见的超越性的实体，只为它自己所知。行动中的身体不再是自我的表达。自我并未真实地存在于身体之中，它被剥离出来，形影子子。我们回想起 R 女士（参见边码第 54 页），她的行为的含义是：“我只是别人眼中之物。”而詹姆斯的个案则显示了相反的内心世

界：“任何人都无法看到真正的我。”对詹姆斯来说，他的裸露癖是为了避免人们发现他对自己的感觉：觉得自己本来是什么人，是谁。

面对他人，成年人无法把被人看见或不可见作为稳固的防卫机制，因为，虽然这两种手段都能提供各自的安全感，但是也都包含着各自的危险。这其中的复杂性，可以通过最早、最单纯的婴儿状态中的复杂内容揭示出来。

捉迷藏是一种常见的儿童游戏。实际上，这种游戏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既可以独自一人在镜子面前进行，也可跟成年人一道进行。

1920年，弗洛伊德写过一段著名的文字，描述一个小男孩玩线卷。在这段文字脚注中，弗洛伊德谈到了这种游戏。在引用这个脚注之前，有必要先转述这段著名的文字。

这孩子的智力发展，没有任何早熟的迹象。一岁半时，他只能说不多几个可让人听懂的单词，可他能用几种不同的声音表达他的意思，让身边的人理解。他与父母和保姆阿姨相处得很好，常被夸作“好孩子”。他不吵夜，很自觉，不乱动东西，也不乱窜屋子，特别是，即便妈妈离开几小时，他也从不哭闹。可他很依恋母亲，她不仅自己喂养他，也亲手照料他。然而，这个好孩子却不时会表现出一种不安的行为：把能抓到手里的东西扔到角落里或床底下或别的地方，然后寻找，捡起来。当他进行这种行为时，便激动地发出响亮的、拉长的声音：“喔—喔—喔—喔！”同时脸上显露兴趣和满意的神情。笔

者与孩子的母亲讨论的结果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感叹词，而且是德语单词 *fort*（不见了）。我终于认识到，这孩子用手里的玩具或别的什么是在玩“不见了”的游戏。另一次观察证实了我的想法。这孩子有一个绕着线的木线卷，他从不在地板上拖着玩，把它当作马车或其他什么。他总是握住线头，非常熟练地将线卷扔进有围帘的摇床里，眼看着线卷消失在围帘后面，同时嘴里发出“喔—喔—喔—喔”的叫声。接下来，他又把线卷拖出摇床。当他重新看到线卷时，便高兴地发出“*da*”（在这儿哪）。可见，孩子进行的乃是完整的游戏：消失和再现。通常，人们只看到第一个动作，看到孩子不厌倦地重复这个动作，认为这就是完整的游戏。但实际上，第二个动作无疑带给孩子更大的快乐。

在这段文字下面，弗洛伊德加了一条重要的脚注：

接下来的进一步观察充分证实了这一解释。有一天，母亲离家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当她回来时，孩子冲她说：“宝宝喔—喔—喔—喔！”最初还不明白其中的意思，稍后便发现，在这段独自一人的时间里，这孩子找到了让他自己消失不见的方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家中有一面离地面有一段距离的大镜子，通过在镜子面前蹲下的方法，他得以使镜中的自己“不见了”。

也就是说，小男孩不仅是在扮演妈妈消失的游戏，也在

扮演自己消失的游戏。弗洛伊德猜想，两种游戏都应理解为这样的企图：通过不断重复对危险情境的焦虑去把握这种焦虑。

如果的确如此，那就意味着，小男孩对自己不可见的恐惧，对自己消失的恐惧，是与对母亲消失的恐惧密切相联系的。看来，就确定的年龄阶段而言，母亲的失去，会使个体面临失去自我的危险。然而问题在于，妈妈并不只是孩子可以看到的东西，而是可以看到孩子的人。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一个人接受母爱的关注，这一经验是自我发展的必要成分。一般而言，婴儿几乎总是处于成人的关注之下。然而，被注视仅仅是他的整个存在所受的关注之一。他受到注意、爱抚、轻摇、拥抱、抛空、洗浴，就某种范围而言，他的这些肉体经历都不会重复。一些母亲能够认可孩子的“智力”发展过程，并对之作出反应，但却不能富有责任感地接受孩子具体的肉体实在性；另一些母亲则有相反的倾向。很有可能，母亲对婴儿身上“智力”方面或“肉体”方面缺少有责任感的关注，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对上述游戏的进一步观察表明，正如弗洛伊德所设想，孩子能够通过消除自己在镜中的影象使自己消失。这就是说，如果他看不到自己在那儿，他自己就会“不见了”。这样，通过镜子的帮助，他得出一个分裂性的假定：有两个“他”，一个在那儿，另一个在这儿。也就是说，当关注他之存在的人（如妈妈）失去或不在时，为了克服或为了试图克服这种缺失，他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从镜子里面关注着他。

然而，虽然他能从镜中看到的“人”既非他自己也非他

人，而仅仅是他自己的影象，但当他不再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影象时，他自己也就消失了。其方式可能是：当他不再感到为妈妈或他人所关注时，他就感到自己消失了。对于个体来说，现实的他人可能在任何时候离去、死亡，无法回应个体对他的感情，从而让个体感受到威胁；现实的他人也可能更直接地表现为爆聚或洞穿的威胁。无论哪种情况，精神分裂性个体都力图以这个小男孩所遵循的方式成为自己的镜子，把自己尚具整体性的亚二元性的自我变成两个自我，即变为实际的二元体。对于上述这个有“两个自我”的小男孩而言，他自己实际的自我是在镜外；可以想象，这一自我随时准备与妈妈认同。当个体为某人所关注时，个体的自我与此人幻象的认同作用可能对另外那个从旁观察的自我之性格特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前面已经指出，这一旁观的自我常常毁灭和窒息任何为其所注视之物。这种情况相当于在个体之存在的中心存在着一个毁灭性的观察者。上面那位男孩便可能是为异己的、破坏性的观察者所左右，这观察者当其不在时便变坏了，占据了旁观自我的位置，占据了在镜子之外的男孩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像他人一样观察自己，他重新获得对他自己的意识，感到自己是他人眼里的客体。这也就是相当于他把自己的眼睛借予他人，以使自己始终处于注视之下。这样，他变成了自己眼中的客体，他自己身上分化出的部分洞穿他、注视他。然而，这一部分身上已经形成破坏性的特征；而他已经感到，这些特征将为那位真正的他人所有。

上述镜子游戏可以有特殊的形式。一位男人突然发病，即

在他从镜中看到别人——“他”（其实是他自己在镜子中的影象）——之时。在一阵妄想型的精神紊乱中，“他”变成了他自己的杀手。“他”策划了谋杀他（即患者自己）的阴谋，而他（患者）决定“用一颗子弹穿透‘他’”（他之错乱的自我）。

在那位小男孩的镜子游戏中，小男孩充当了他的感知者——他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正在以某种魔法谋杀自己：谋杀他自己在镜子中的影象。在后面研究精神分裂症时，我们还将回到这种特殊状态。小男孩的游戏中有两种成分：让自己消失和再现，以及让妈妈（象征性地）消失和再现。对于他来说，两者必定具有相似的含义。然而，只有当我们相信，他所面临的危险不仅是看不到妈妈，也包括感觉不到自己被妈妈所注视，他的游戏才有意义。在这种情形中，存在 = 被感知，对他人和自我都是如此。

笔者自己的一个女儿在两岁半时也扮演了一种相似的游戏。她命令我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不许看！”然后又命令：“看我！”这时，我就一下子放开手，并在看到她时表现出惊喜的神情。我也曾被要求假装对她视而不见，还让她带着跟别的孩子一道做这种游戏，其内容当然是装着没看见他们干捣蛋事儿。其中的要点看来在于孩子暂时性地感觉自己没被注视，而并不在于孩子没有看见我。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游戏中并未发生实际的生理分离，无论大人或孩子都不必藏起来或真正消失。这是一种魔法般的躲躲猫游戏。

孩子在母亲离开时哭叫，是由于他自己的存在面临消失的危险，因为存在 = 被感知，孩子也不例外。只有当母亲在

场，他才能充分地生存、运动、存在。为什么孩子都希望夜里始终亮着灯，在睡熟之前都不希望父母离去？这一类需要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如果孩子看不见自己，或者说如果他感觉不到在被他人看见，如果孩子听不见他人的声音或被他人听见，他就会感到恐惧。从现象学上说，睡着意味着失去对自身存在以及外部世界的意识。这本身就令人害怕，因而，在他入睡即失去对自身存在之意识的过程中，他需要感到被别的人看见和听见。在睡眠中，照亮自身存在的“内在”光明熄灭了。因而，点燃一盏灯，不仅使他感到醒来时不含有黑暗的恐惧，也提供一种魔法般的保护，使他在睡眠中能受到仁爱的父母、善良的仙女和小妖精，以及小天使们的守望。比起黑暗中可能潜伏的怪诞恐怖之物，或许还有更大的恐惧，那就是，黑暗中空无一物，空无一人。因而，失去对自己的意识，或许正与虚无相同。精神分裂性个体让自己确信，他的生存始终伴随着对自己的意识。然而他正是为他自己的内视之眼和洞穿之眼所困扰。

希望被感知的需要，当然并非单纯视觉上的问题。它还包括为他人所赞美、所鼓励的普遍性的需要，自身整个生存被人认可的需要，以及被爱的需要。生活中有些人无法在自身内部支撑起自己的身分感，或者就像卡夫卡笔下那位恳求者，无法从内心相信自己活着。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只有当他们被别人所感知，他们才会感到自己是真实的活人——就像R女士，当她得不到别人（充分了解她的人）的认可或不能幻想自己得到这种认可时，当她得不到别人（可以对她作出重要反应的人）的反应时，她就会感到非人化的威胁。她

希望被注视的需要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我是他人所知和所认可之所是。”她需要使自己确信：了解自己的人在场。这样的人在场，会暂时减轻她关于自己是谁的不确定性焦虑。

第八章 彼得个案

我不喜欢用“心理”这个词，没有什么东西是“心理的”。让我们说，人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

让-保尔·萨特

此处的个案涉及到许多问题，读者可以看到它们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将在后面两章中得到讨论。

彼得，25岁，身材高大，看上去非常健康。他向我抱怨说，他身上老发出一种讨厌的气味儿。他自己闻得分明，却不大清楚别人是否也闻得出。彼得认为这味儿主要来自下身和生殖器部位。在新鲜空气中，它显得像是燃烧发出的味儿，但通常使他想起什么酸臭腐败的东西；想起铁路小站的候车室——满是煤烟、砂砾，霉气扑鼻；想起他在其中长大的家——贫民区公寓里那几间破烂的房子。他无法摆脱这味儿，即便洗上几次澡也不见效果。

彼得的叔父向我介绍了下面一些情况。

彼得的父母不太幸福，可他们彼此关系密切，两人形影不离。结婚10年后他们生了彼得，这是他们的独子。两人的

生活并未因彼得而有什么不同。从出生到中学毕业，彼得一直跟父母睡在同一间屋子里。父母看上去对他一直很好。然而，尽管彼得总是在父母身边，父母却当他没在那里。

母亲从未能给予彼得任何影响，因为她给不出什么影响。彼得是奶瓶喂大的，身体长得不错，可从未得到抱抚和逗乐。婴儿时，他总是哭叫。不过，他妈妈并不拒绝或忽视他的要求，衣食冷暖都照料得不错。一直到青春期，彼得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只是，他妈妈几乎完全不对他加以主动的关注。她是个漂亮女人，喜欢穿着打扮和自我欣赏。他爸爸喜欢他妈妈这样，一有可能就为她买衣服，非常自豪能让人看见他跟漂亮的妻子一道。

彼得的叔父认为，他父亲对彼得十分喜爱，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使他无法表现这种感情；相反地，他态度生硬甚至粗暴，老挑彼得的错儿，还常常没为什么理由便一顿好打，一阵乱骂：“废物！”“大笨蛋！”等等。彼得在学校里功课不错，后来又找到一个好工作，使得贫困的家庭情况大为好转，他父亲的确“为这孩子深感骄傲”。可是，后来彼得就什么也不愿干了，“让他父亲感到沉重的打击”。

彼得是个孤独的孩子，从不调皮。9岁时，一次空袭夺去了邻家小姑娘的双眼和双亲，这小姑娘也9岁。打那以后有好几年，彼得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和她在一起；他待她无比耐心、和善，教她识别周围的地形，为她讲解图片，与她促膝交谈。后来姑娘部分恢复了视力。她对彼得的叔父说，是彼得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在她双目失明、孤弱无助的时候，是彼得陪她度过了艰难时光。

在学校最后几年，叔父通过巧妙的安排，激发了彼得对律师这个职业的兴趣，可这兴趣又很快丧失了。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干了几个月后，彼得又通过舅舅转到一家航运事务所，在那里一直干到服军役。在军队里他自愿选择了警犬员职务。两年后服役完毕，他干了一件事情，“把他父亲肺都气炸了”：他到一家赛狗场担任看养员，“成天跟狗打交道”。不过他只干了一年就离开了，此后打了5个月零活，闲散了7个月。接下来，他就遇上了“味儿”的麻烦。他身上其实并没发出什么味儿。普通的大夫对此毫无办法，只好建议他找精神病医生咨询。

彼得对他自己的生活作了如下描述：

他觉得，他的出生违逆了父母的意愿，他们都不希望他生下来，并且从未饶恕这一点。他觉得，妈妈厌恨他是因为他在出生时损坏了她的形象和身体。他坚持认为，在童年时代母亲经常因此责难他。他觉得父亲厌恨他，首先仅仅是由于他的存在，“他从不给我一点生存位置……”他还认为，父亲恨他可能是因为他出生时损坏了母亲的身体，使她疼痛，不愿有性生活。他觉得自己犹如窃贼和罪人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

读者记得彼得的叔父说过，彼得的父母彼此很感兴趣，而对彼得，却常常好像没这个人。这种无视必然对彼得的自我意识产生作用，我们第二次谈话的录音记录充分揭示了这一点：

彼得：……打从能记事起我就有一种对自己的意识，一

种自我意识——你知道，从某种意义上看很明显。

我：很明显？

彼得：是啊，很明显。我不过就是在那儿……不过是意识到了我自己。

我：在那儿？

彼得：哦，我想只是在那儿而已。他〔他父亲〕总是说我打生下来就是个碍眼的东西。

我：碍眼的东西？

彼得：是啊，还把我叫作废物、大笨蛋等等。

我：仅仅是在那儿，这让你感到罪过，不是吗？

彼得：这个，我的确不太清楚……但我想，使我感到罪过的，首先只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

彼得说，他小时的确常独自一人，但并不孤独，“独自一人与孤独并不一样”。

彼得有一种或许应该算作“掩蔽性”记忆：大约4、5岁时，妈妈发现他正玩自己的阴茎，便告诉他它会因此而长不大；7、8岁时，他与一位同龄小姑娘有过几次性接触；可是，直到大约14岁，他都还没有手淫行为。所有这些导致了他自我意识的紧张，对于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最初告诉我的就是这些回忆，直到好几个月以后，他才不经意地谈起那位瞎眼的小姑娘吉恩。

掩蔽性记忆——精神分析用语，指一种记忆掩蔽了与其相关的其他记忆。——译注

上中学时，他关于自己的感觉变得更加定形。由于现在有重建对于自身感觉的可能，他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他被大家安放在错误的位置上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了老师和父母而成为什么人，干些什么事，可他又始终觉得，这既不可能，也不公平。他觉得自己被迫要用全部时间和精力去为父母、叔父或老师增光，然而心中却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所有这些努力全是欺骗和虚伪。例如，老师希望他“讲话要有风度”、穿着“要讲身分”，但是，这只能使他不伦不类。他是个手淫的孩子，她却让他给同学们念《圣经》，树他为榜样。当人们谈到他会把《圣经》读得多么好时，他却在心里嘲笑自己。“这只表明我是个多棒的演员。”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所扮演的角色，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人。他觉得自己毫无用处，但又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某个极为特殊的人物，肩负着上帝的特殊使命。但到底是谁？是什么人？……他又说不上来。与此同时，他觉得周围的人都想让他成为圣徒，并对此十分厌恶，“可以说他们只不过是想为自己增光”。这使他无法在工作中感到快乐。他越来越厌恶周围的人，特别是女人。他意识到自己厌恶别人，但他并不害怕这些人。既然“他们无法不让我想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害怕呢？当然，这其中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他们”有某种力量强迫他按“他们”的想法去做，但是由于他对“他们的”意愿明显地表示不满，他就避免了焦虑感，使他不至于迎合别人，压抑自己。

在彼得于航运事务所谋职期间，他经历了最初的焦虑。当时他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做诚实的人还是虚伪的人，是保持本

色还是逢场作戏。他知道自己是个伪君子、说谎者、骗子，但问题在于，他能欺骗到什么时候呢？在学校时，他相信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能干得很顺利。但是，他越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感情，越是向别人随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他就越是想从人们脸上窥出对他的看法和了解。在事务所里，他认为自己是“真实情感”的东西，大部分是对女同事的虐待狂性幻想，特别是其中一位女同事，他认为此人看上去令人尊敬，但暗里却可能跟他一样虚伪。他常常带着这些幻想在事务所的洗手间里手淫，但有一次，就像过去被母亲发现一样，他刚做完手淫便劈头碰上了这位女同事，他刚才还在想象中强奸了她。现在她直视着彼得的眼睛，就好像看穿他的外表，在他的隐秘自我中侦寻真实心理，看他刚才内心深处到底干了些什么。他害怕极了。从此以后，他不再相信能够隐藏自己的真实行为和思想，特别是不再坚信他的表情不会“出卖他”了。与此同时，他变得十分害怕，唯恐精液的气味会出卖他。

到军队服役时，彼得正处于这种状态。不过，他没有显露内在的苦恼，任务也完成得很好。相反，他看来开始变得正常，并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焦虑。然而，他对此没有什么感受。在他身上存在着“内在的”“真”自我与外在的“假”自我之间的分裂，使他感到吃力和紧张，表面上的正常不过是竭力平衡这种紧张带来的结果。这一点在他当时一个梦中得到了表达：他跳出一辆疾驰的轿车，受了点轻伤，而车子却向前摔得粉碎。他对此作了合乎逻辑的、但却是灾难性的结论：他眼下玩的就是这种游戏。最后他终于尽其所能作出了抉择，他让自己与自己脱离，让自己与他人脱离。这立刻

减缓了他的焦虑，让他表面上显得正常。但是，他所做的并不止这些，产生的后果也不止这些。

彼得相信自己“真的”什么也不是，他更加感到漫无目的、缺少方向、一无是处。他感到再也不知道怎样去伪装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谁也不是，因而什么也干不了。”他现在不仅一心要脱离他的假自我，还坚决不让自己保持某种确定的状态。他说：“我不让自己保持自己所想象的或他们所想象的样子，这使我感到一种刻薄的满足……”

彼得一直感到自己只有一只脚踏进生活，而且即便如此也还属于非法闯入。如他自己所说（十分凑巧这也是海德格尔的话），他“处于存在的边缘”。他觉得自己并不是真正活着，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也很难有要求生活的权利。他幻想自己完全脱离生活，然而，一阵子，他又对哪怕一点点希望至为珍视。女人对他来说还有些神秘的力量，女人的爱会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克服无用感。然而这条出路徒有虚名，因为他相信：能跟他厮混的女人只会是与他一样空虚；而他能从女人那里得到的（无论是他主动获取还是被动接受），只能是跟他自己一样的一无是处之物。因而，任何女人，只要她不像他那么一无是处，绝不会跟他有什么交道，特别是在性问题上。他所有真实的两性性行为只有在乱交中才有可能。然而在他经历的那些乱交中，他又无法突破自己的“封闭性”。他与一位他心目中“纯洁的”姑娘保持了几年微妙的、柏拉图式的关系，但无法使这种关系有任何变化和发展。如果彼得读过克尔凯郭尔（实际上他当然没有读过），他就会同意克尔凯郭尔的想法：如果他有信心，就会与他的列琪娜

(Regina) 结婚。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彼得要花这么多时间跟我谈起这段友谊呢？无疑，这是他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件，有可能正是这一友谊，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免于患精神分裂症。然而对于彼得这一类人来说，他们会尽力把这一类事情隐藏在内心深处，不让别人知道。他们不会忌讳的事情，只是幼时混乱的性经验和手淫，以及成年后各种虐待狂的性幻想。

讨 论

就我所知而言，无论在自己的肉体中还是生活中，彼得从不会感到“自在”，而是感到自己笨拙、尴尬、显眼。读者还能回忆起他叔父的介绍：他母亲是个有自恋倾向的女人，既不给予他抱抚，也不跟他一道游戏玩耍，甚至连彼得生理上的存在也很难得到承认。“就当没有他这人似的。”在彼得这方面，他不仅感到尴尬和显眼，还“首先因为自己的存在”而有罪过感。

看起来，他妈妈的眼睛只是为她自己生的。她对彼得视而不见。他不被看见。因而，彼得成为那瞎眼姑娘的好伙伴

列琪娜曾是克尔凯郭尔的未婚妻，后来，克尔凯郭尔主动解除婚约。在他致列琪娜的信中这样写道：“……忘掉写这封信的他吧，忘掉这个人，他可能是这样或那样的人，但绝不可能使一个姑娘幸福。……”

——译 注

(说成为她“母亲”更恰当)，这并非偶然。那姑娘也看不见他。这一友谊有着诸多侧面，但其中重要的是：他跟她在一道时感到安全，其原因是他能看见她而她却无法看见他。不仅如此，她极度需要他，是他给了她眼睛；而他，当然也就能表达自己难过的心情，而这是无法向他妈妈表达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那位瞎眼姑娘、巡逻犬和赛狗们身上，他才有可能自然地显示自己的影响；反过来，也只有她和它们，才可能自然地对他产生影响。

后来，彼得对几乎一切都使用其假自我系统，抱怨别人对他的期望。这种做法使他越来越厌恨别人和自己。他的“真”自我应该包含什么？对此他的感觉越来越退化萎缩，因而，这一“真”自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脆弱；相应地，彼得则越来越感到别人会透过他伪装的人格，看穿他内心各种隐秘的幻想和念头。

现在，彼得能够正常地、审慎地对外界运用两种技巧，他称之为“分离”和“脱离”：前者意味着加大其自我与世界的存在距离，后者意味着切断其“真”自我与其已离异的假自我之间的任何关系。这两种技巧基本上是为了隐蔽自己，它们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当他在家跟父母一道或在外边跟熟人相处时，他就会感到尴尬、不舒服、不自在，一直到他进入某个角色为止。这个角色当然不是他自己，但他感到正是适宜的伪装。接着——如他自己所说——他就能把他的“自我”与他的行动相“脱离”，顺利地、没有焦虑地继续下去。然而，从不同的方面说，这并非是其难题之满意的解决方式。首先，如果他长期不能让自我进入行动，他就会越

来越强烈地感到生活的失败，感到缺少行动的欲望，感到无法缓解的厌烦。其次，这种防卫技巧并不十分可靠，因为彼得常常感到别人的注意或眼光突破他的防线，进入他“自我”的核心。别人的眼光使他感到“危险”。这种感觉越来越持久；而他用以保护“自我”不被别人看见的手段越来越无效，无法缓减他的感觉。他常常感到别人能看穿他的伪装，无法摆脱这一印象。

我认为，彼得总觉得被看见的先入之见，出于一种补偿的企图。他老觉得自己是无人（没有人，没有身体），他试图补偿的也就是这种感觉。在他对自身身体化的经验现实中存在着根本性的不适，由此导致他的先入之见：他的身体是为他人而存在，换句话说，他的身体是让（而且能够让）他人看见、听见、闻见和接触的。无论这一“自我”意识对于他来说是多么痛苦，它还是必然要产生于这样的事实：他的身体经验与自我是如此相脱离，因而他需要意识到自己是他人之真实的客体。他试图通过这种兜圈子的方式使自己确信：他拥有一个可把握的生存。

不仅如此，与此同时，他关于自身气味的幻觉也变得更加顽固了。

然而，面对特别的焦虑，彼得还找到了另一种方式调整自己。这种方式恰好带给他另一种相反的好处，也带给他相反的不利。彼得发现，如果与他相处的人对他一无所知，那么他就能保持自我。然而，这种要求是难以达到的。这意味着他必须不断移居，改名更姓，始终保持“陌生人”的形象。如果能做到这点，那么他（几乎）可以快乐。然而，这种快

乐必然只能是昙花一现。他可以“自由”，但却只能“偶尔”。他甚至能跟姑娘们发生性关系，在这种时候，他既无“自我意识”也没什么“想法”。它们不再产生，因为他的自我与身体的脱离此时已不必要了。在这种时候，他能做个身体化的人。然而，问题在于，一旦他处于被人了解的境况，他就不得不回到非身体化的状态中去。

隐姓埋名、不为人知、在陌生的世界里作一名陌生的过客，彼得这种见诸行动的幻想，在具有自我意识倾向的人身上是常见的。他们想象，如果能离开同事，离开家乡，重新开始生活，就会没有烦恼。他们常常变换工作，搬家迁徙。然而，这种策略只有暂时的效果，一旦他们与环境彼此熟悉，效果就化为乌有。要不被“发现”是非常困难的。这些人就像潜入敌国的间谍，容易变得疑神疑鬼、小心翼翼，而别人正试图通过他们“出卖自己”的言行“抓住他们”。

例如，即便在一个陌生的城镇里，彼得也对去肉店一事犹豫不决。屠夫引发他的焦虑，从根本上来讲，这倒不是通常意义的阉割焦虑。令彼得感到不适的是，在肉店里他不得不回答一些关于他自己的问题，屠夫会非常“天真”地提问，如：“你喜欢足球吗？”“那家伙赢了七万五千磅，你怎么想？”等等。坐在肉店的椅子上，他就像被捉住的间谍，就像在经历一场噩梦——梦中他被剪掉头发，同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分，变成某个确定的人物。“人们总是免不掉讲出自己来自何处、干什么活儿、认识某某，而我却尽可能逃避……”

与此相似，彼得也不能持之以恒地进某一个图书馆，在借书卡上填写自己的真实姓名。他总是去不同的图书馆借书，并在借书卡上填写假名和编造的地址。一旦他认为管理员“认出”了他，就再也不去那里了。

这后一种防卫机制确实需要很大的功夫、技巧以及高度的警惕和戒备——正如潜入敌国的间谍，这样才能使他感到自己未被“发现”，未被“认出”。虽然如此，这种方法的确有助于满足他对“脱离”和“分离”的不断需要。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始终保持格外的警觉，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抓住。不过，就此而言，彼得的处境非常困难，但非完全绝望。当然，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情况就会严重了：当他那分裂性的防卫体系变成一种自我毁灭的意象性计划时，情况就会变得难以收拾，他那岌岌可危的健全很快就会越过临界点，发展为精神病——而本来，他的防卫体系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寻求可行性生活方式的企图。

真假罪感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彼得所承受的罪感，以及它引起的后果。我们还记得，彼得不仅感到尴尬和显眼，他还“首先因为自己存在”而有罪过感。在这一层面上，他的罪感与他的思想和行动没有关系，他只是感到自己无权拥有空间。此外他还深信，他是由腐朽的材料所造就的。他关于肛门性交的幻想以及粪便制造小孩的幻想正是他这种信念的表达。

这些幻想的一般细节不是我们眼下所关心的对象，但我们将考虑，正是它们参与导致了他的统觉：他的自我是粪便做成的。他父亲骂他“废物”（原意为“大粪堆”），而他自己比他父亲走得更远。由于相信自己是一堆没用的大粪，因而，一旦他对别人显示出任何价值，他就会产生罪过感。

手淫使他不安。我相信，他的罪过感的关键在于，要是他戒弃手淫，他的无价值感就会增强；而当他真正想要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是，真正成为“没用的东西”，成为“大粪堆”时，他就会感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变得无法容忍。他后来谈到这种气味：“这味儿多少像是我对自己的看法。它的确表明一种自我厌恶。”换句话说，他对于他自己来说是如此恶臭，以至他自己都无法承受了。

事实上，彼得的罪感有两个完全对立的和相反的来源：一种促使他去生，另一种促使他去死；一种是建设性的，另一种是破坏性的。它们导致的感觉虽然不同，但都极为痛苦。如果彼得的所作所为显示他的自我肯定，表明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真实而生动，他就会想到：“这是欺骗、伪装。你是没用的家伙，没有价值。”他要是不同意这种错误的自责，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无用、虚假、死气沉沉，身上的味儿也不那么难闻；然而此时他又会被罪过感所折磨。另一方面，如果他决意让自己什么也不是，他却依然觉得自己是个骗子，依然感到焦虑，依然强迫性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他人知觉的对象。

彼得竭力让自己什么都不是，由此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僵化、死气沉沉。死气沉沉的气氛笼罩了他的整个生存，浸

透了他对自身“与外界相脱离的自我”的经验，浸透了他对自身身体的经验，也浸透了他对“被分离开去的”的世界的知觉。一切都开始停滞不前。世界变得失去现实性，而自己则难以想象自己拥有任何为他人的生存。最糟糕的是，他开始感到自己“死了”。从他后来对这种感觉的描述有可能看出，其中涉及到自身身体之真实感和生动感的丧失。这种感觉的核心在于：彼得缺乏对自身身体作为真正的为他人之客体 (object-for-others) 的经验。他变得只能 (无法忍受地) 为他自己而生存，再也感觉不到他在世界的眼睛里也拥有自己的生存。

看来，彼得多半是在与自身二重性经验之间的分裂作斗争。父母的管教剥夺了他的存在，或者说，父母未能成功地管教他。他觉得自己对于他人是可接触的、可嗅及的等等，这种令他极为难受的强迫性的偏见是一种绝望的企图，企图在自身存在中保留住一个层面，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它拥有一个为他人的存在 (a being-for-others)。但是，为此他就不得不以一种辅助的、不自然的、强迫性的方式把对这一层面的感觉“注入”他的身体。这是他的一个经验层面，它未能在最初的婴儿期状况之外得到根本性的确立；分裂倒是得到了填补，但却并非由于作为一个人而被爱、被尊敬的感情的正常发展，而是由于另一种感情：所有的爱实际上都是伪装的迫害，因为其目的是要将他变为他人之物——如他自己所说：变为老师帽子上的一片羽毛。

然而，显然彼得在学校里和事务所里就已经遇到各种麻烦，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并感到恐惧。但是，更特殊的情况

是，当他自己竭力想要填补自身存在的分裂时，他的状态就开始恶化。他说，他竭力“把自己与一切分离”，这的确如此。在此之上，他又增加了“脱离”的方法。他力图通过“脱离”的方法割断自身存在中各有关方面的联系，特别是，他力图不“在”自己的行动和表达中，不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在这里，在自身与世界之间，他利用了身体行动和表达的过渡状态。现在他试图说：“所有可作为他人之对象的我均不是我。”

在“我”和世界之间，身体明确占据了一个含糊的、模棱两可的过渡状态。从一方面说，它是我的世界的核心和中心；另一方面，它是他人世界中的客体。对于自己身上可被别人感知的任何东西，彼得尽力割断与它们的联系，使它们与自己的内自我相脱离。它们包括各种态度、意图、行动等等，是在顺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为了脱离它们，彼得还竭力将自身整个存在减缩为非在，相应地尽可能将自己变得什么也不是，变为无物。由于他相信自己是无人、无物，他还感到要驱使他成为无物的可怕力量。他觉得既然他谁也不是，他就应该成为无人，隐姓埋名便是他用以将其所信变为事实的一种魔法式的方式。正如前面所看到，彼得弃职后便四方漫游，居无定处。他不属于任何既定的地方。他老是从一个地方漂泊到不同的地方。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财产，也没有朋友。他什么也不是，谁也不认识，也没有谁认识他。他就这样为自己创造条件，使自己易于相信自己是无人。

俄南之罪在于遗精在地，因为这是对生殖力和创造力的浪费。彼得之罪，如他自己所说，并不只是他的手淫和虐待狂幻想，而在于他只能在幻想中与人们一道干有关事情，却没有勇气付诸真实的行动；而一旦他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约束（如果说不是压抑的话）他的幻想，他的罪就增加了：既因这种幻想而有罪，又因压抑它们而有罪。当他想让自己什么也不是，他的罪就不仅包括他无权做普通人所能做的一切，还包括他没有勇气超越、违背、不顾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那些事情；而他内心的想法告诉他的是：他此生与他人一道所做或所能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他的罪在于，他自己决定承认自己的感觉：他无权生活。他的罪在于他否定了自己走向生活的可能性。

彼得的罪感主要并非由于他的各种欲望、驱力，或冲动本身，而是因为他没有勇气与现实中现实的人们一道从事现实的事情，从而成为一个现实的人。彼得之罪并非在其愿望，而在于这些愿望始终只是愿望。他的一无是处之感产生于这样的事实：他的愿望只能在幻想中而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手淫使他得以用他与幻象的无生命力的关系，成功地取代与真实他人的创造性关系。他的罪感在于：他的欲望只是幻想的欲望，并非来自真实的人，并非真实的欲望；而本来，他可能拥有这种真实的欲望。

海德格尔说：罪是存在于沉默中为自己发出的呼唤。可

《旧约·创世记》第38章第9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精在地，……”——译注

以称为彼得之真罪的东西，是他对非真之罪的屈服投降，是他把放弃自己作为生活目的的企图。

不管怎样，彼得身上还存在着前面提到过的内自我的分裂。从一开始，他就被自己谁也不是的感觉所折磨和左右；现在，他被迫痛苦地为自己创造条件，以证明这种感觉。然而与此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是某个特殊人物，肩负特殊使命和目的，受上帝之托来到这个世界。这种空洞的万能和使命感让他感到害怕，他把它们当作“疯狂的感觉”置于一边。他意识到，如果他纵容这种感觉，那么就会像燕卜荪(W·Empson)所说，只会导致“疯人院以及那里的一切”。然而，相反的选择也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力图不在身体中生活、不通过身体来生活，力图成为无人。正因为如此，他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已死去。

因而，当他丢掉伪装，这伪装就会强迫他给予注意，他就会被迫回忆起这样一种东西：肮脏、恶臭、可怕——一句话，死气沉沉，没有生命。他以一种心理技巧把自己与自身身体相割离，而他那非身体化的自我以及“被割离的”身体都产生了生存的坏疽。

他自己的一段话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死了。我把自己与人群相隔离，封闭在自身内部。任何人走这条路也将遭受同样

燕卜荪(1906—1984)：英国作家和教师，以用科学方法写评论和诗歌而闻名。——译注

的命运。人不得不生活在人群中间，否则就会有什么东西在内心死去。这听起来似乎很愚蠢。我并不真正理解这一点，但这样的事情似乎正在发生。真有趣。

第 三 部 分

第九章 精神病的发生和发展

万物崩坠，失却存在的焦点，

松垮的散漫占有了世界。

W·B·叶 芝

前面，特别是通过戴维和彼得案例，我们讨论了各种精神分裂性现象，这些现象已危险地接近显性精神病的边缘。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突破这一边缘而进入精神病状态的几种发展形式。当然，在健全与疯狂之间，在正常的精神分裂性个体与精神病人之间，并非始终有可能划出清楚的界线。某些时候，病情的发作极为戏剧化和猝然，症状十分明显，因而诊断也就不成问题。然而在许多个案中并无这种突破的、明显的、本质的变化，而只有绵延数年的缓慢过渡，此时就无法对临界点作出清楚的判定。

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当精神分裂性的生存状态出现了特殊的分离形式时，就会发生由正常向疯狂的过渡。为理解这一过渡阶段的性质，有必要考虑这一特殊生存情境中发生精神病的各种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出过：自

我为了发展和支撑其身分和自主性，为了逃避外界持续的威胁和危险，便割断自己与他人的直接联系，尽力变成自己的客体——试图只与自己发生直接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的基本功能变得只是幻想和观察。

这一点达到后，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自我将难于支撑任何真实的思想感情。其原因正好是它没有“接触”现实，从未实际地与现实“打交道”，正如明可夫斯基（1953年）所说：丧失了与外界的“性命攸关的接触”。相反，正如我们曾看到的，自我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被假自我系统所取代，而这一假自我系统的知觉、感觉、感情、思想和行动只有较小的真实“系数”。

此时，个体的状况有可能还显得比较正常，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正常，却是通过进行性的、越来越反常的和绝望的手段加以维持的。自我卷入了幻想的世界，这是由“精神”事物组成的私人“世界”，也即自我自身客体组成的“世界”；同时自我观察着假自我，只有这假自我在参与那个“公有世界”。由于与现实的公有世界中的他人的直接联系已落实给假自我系统，因而，自我只有通过假自我系统这个中介，才能与外在的公有世界产生联系。这样，自我最初为避免外界冲击而设置的防线，就可能变为囚禁它自身的牢狱。

这就是说，针对外部世界的防卫机制，即便就其基本功能而言，也是失败的。原来预想的功能是防备破坏性的冲击（爆聚），维持自身生命力，避免成为他人控制和操纵之物等等，结果却未能实现。焦虑卷土重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假自我系统的症结——知觉的非真性和目的的错误性

——逐渐扩展为对整个公有世界的僵死的感觉，染及身体，事实上还染及身体的一切，最后甚至侵袭渗透“真”自我。虚无充斥了一切。内自我自身也变得全然虚幻不真，被“幻想化”，被分裂，被僵化，再也无力承受关于自身身分的不安全感。此时，内自我会试图将各种可能性用作防卫机制，例如，试图逃避被认同以保持自身身分（如前所述，身分的获取和维系是两方面的，既需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也需自己对自己的认可）；或者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保持僵死（death-in-life）状态，以逃避生活的痛苦——而这些做法将使前述情况进一步恶化。

让自我进一步退缩与让自我恢复原状这两种努力，在精神病状态中将合而为一。一方面精神分裂性个体会拼命试图作为他自己而存在，重新获得和维持其存在。然而，这种欲望与非在的欲望纠结在一起，要把它与后者分开是极为困难的。这是因为，精神分裂性个体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大都必然是含混不清的。彼得是在毁灭自己还是在维护自己，谁又能作出断然的回答呢？如果我们囿于两者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思路，那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彼得用以防卫生活的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在生活之内制造死亡。这种机制看起来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焦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像负鼠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装死。当他不为人所知、所了解时，他可以“是自己”；当他不是自己时，他可以让自己为他人所了解。这种两可的处境不可能一直继

续下去，因为，身分感需要另一个人的存在，而个体正是为这个人所了解；身分感还需要此人对个体自我的认可与个体的自我认可之间的联系。如果个体要脱离与所有他人甚而自身一大部分存在的联系，那么他就不可能以正常的方式长期生活下去。

这样一种与他人一道存在 (being-with-others) 的方式，其先决条件是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基本上是孤癖的、内向的身分来维系自身的现实。它假定，即便没有与他人的辩证关系，也能作一个人。看来，这一策略的全部目的，是想通过消除所有通向“内”自我的直接途径而防备想象的外来打击，以便维护“内在的”身分。然而，如果“自我”未得到他人认可，未承诺自己作为“客观的”元素，未生活在与他人的辩证关系之中，那么，“自我”就无力维系现有的、已经岌岌可危的身分和存在。

我们已对“内”自我所经历的变化作出了部分性的描述，这些变化可以列出如下：

1. “内”自我变得“幻想化”或“发散化”，因而失去稳定可靠的身分。
2. 变得不真实。
3. 变得贫乏、空洞、僵化、分裂。
4. 变得越来越充满厌恨、恐惧和妒嫉。

这是同一过程的四种不同侧面，是从不同角度观察所得

的结果。

詹姆斯将这一过程推到了正常的极限，事实上或许还越出了这一极限。这位 28 岁的年轻人，在他自认为的“真自我”和他的假自我系统之间处心积虑地制造分裂。

在詹姆斯的头脑中，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观察、思想和行动不是虚假不真的。看、思考、感觉、行动，都只是“机械的”和“不真实的”，因为那不过是“他们”看、思考、感觉、行动的方式。清晨上班途中，不管碰到谁，他都不得不跟别人一道笑谈那些大家都笑谈的事情。“我打开公共列车的门让别人先进去，这是不用考虑的，因为这不过是大家都遵循的行为方式。”然而，他仿效他人的努力背后，却是对他人的不满以及对自我的蔑视。他既想隐藏又想显露自己的“真实”感觉，而他的上述行为正是两者之冲突的荒诞产物。

他企图通过荒诞的想法来维护自己的身分。他是和平主义者、神学诡辩家、占星术士、唯灵论者、神秘主义者、素食主义者。看来，至少他能与他人分享他各种荒诞想法这一事实，对于保持他的正常来说，或许是最重要的独立因素，因为在那些有限的领域之内，他有时能与他人相处，与之分享自己的各种想法和奇特经验。就现时代的西方文化而言，这些想法和经验倾向于把一个人与人群相隔离，把他孤立起来；如果周围的人不把这个拖入同样“怪癖”的小团体，他的孤独就将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程度，进入精神错乱状态。例如，他的“身体图式”将扩展到生前和死后，消融了通常的时空界限。他会产生各种“神秘的”经验，感到自己与绝对融为一体，与道 (One Reality) 融为一体。他神秘地“知道”，世

界是被统辖的世界，而他据以“知道”的法则则完全是神秘的。虽然他是一位职业化学家，但他“真正的”信念并不在化学和科学法则之中，而是在炼金术、黑白巫术，以及占星术的法则之中。他的“自我”本来即便在能分享他见解的人们中也只能得到部分实现，现在则越来越卷入巫术世界，而“自我”本身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幻想或想象的对象遵循着巫术的法则，它们的关系是巫术的而非现实的。“自我”越来越参与到幻想的关系之中，越来越不是现实关系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便丧失了自身的现实性，就像它与之发生关系的对象一样，它自己也变成了巫术的幻象。这一过程的一个含义是，对于这样一个“自我”，一切都变得具有可能性，正像一切愿望必须或早或晚得到满足，突破现实性、必然性、条件性和有限性的限制。“自我”可以是任何人，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可以生活在任何时候。詹姆斯的情况就趋向于这种状态。“在想象中”，他越来越相信幻想的力量（神秘的、巫术的、不可理喻的）。这些力量的特征是朦胧而不确定，但都加深了他的想法：他不仅仅是此时此地的詹姆斯，不仅仅是父母所生的詹姆斯，他还是某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甚而是佛陀或基督的化身。

这就是说，“真”自我不再维系于现世的、终有一死的身体，它“幻想化”了，它挥发到虚空中，成为个体自身想象的变幻不定的幻影。与此相应的是，自我被孤立起来，以防御外来的、威胁其身分的危险，但反而丧失了它本来拥有的、虽然是不安全的身分。不仅如此，在现实面前的退缩导致“自我的”贫乏。它的无所不能是以无能为基础，它的自由是

虚空中的自由，它的行动缺乏生命力。自我逐渐枯竭、死亡。

在他的梦幻世界中，在他所梦见的荒凉世界中，詹姆斯感到自己是那么孤独，甚至为他真实生存中的孤独所不可比拟。例如：

1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村庄里。那是一个被遗弃了的村庄：残垣断墙，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

2 .我站在一片荒芜不毛的地形中间。那是一片空荡的平原：满目荒凉，几乎不生野草。泥浆淹没了我的双脚……

3 ……我来到一片孤寂的砂石地带。我是因为什么事情逃来这里的？我想回到什么地方去，却不知道该怎么走……

悲剧性的讽刺在于，即便到最后，也未能逃避焦虑的折磨；相反，每一种焦虑以及其余的焦虑甚至变得更令人痛苦。在梦里或在觉醒时，它们融和成各种各样的经验，以虚无和朽灭之感啃噬着人的灵魂。

只有在与真人真事的关系之中，自我才可能是“真的”。然而，自我又害怕被各种关系所吞没。如果“我”只是进入与幻想客体面对面的游戏，同时假自我却忙于应付真实的世界，那么各种深刻的具有现象学性质的变化就会在所有的经验要素中发生。

这样我们就看到：超越的、虚空的、万能的、自由的自我在幻想中可以是任何人，在现实中却什么人也不是。

这样的自我主要与其自身幻想的客体发生关系。作为这样一个幻想中的自我，它实际上变成了挥发性的。它害怕作出对客观成分的承诺，在这种畏惧中，它试图维护自己的身分。然而，由于不再与事实、与条件性之物和确定性之物保持牢固的联系，它就陷入了危险：有可能丧失它力图首先加以保护的东西。失去了条件性，自我就失去了它的身分；失去了现实性，自我就失去了在世界中体验有效的选择自由的权利。自我让自己死去，以逃避被杀死的危险。此时，个体不再像他人一样经验这个世界，尽管他仍然知道世界对于他人（如果不是对于他自己的话）是什么样子。然而，对世界真实性的直接感觉不可能为假自我系统所支撑。不仅如此，假自我系统还无法对现实作出检验，因为检验现实需要一个人自己的心智，它能够通过比较作出正确的选择。假自我缺少这种心智，这种缺乏导致了假自我的谬误。

当来自外界的经验渗入内自我，上述自我就无法再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经验或表达它自己的欲望。

社会可接受性变得只是一种手腕，一种技巧。现在，个体对事物的看法、该事物对于他的意义，以及个体的感觉和表达，如果说尚非怪异之极，至少也会是怪癖的。自我越来越裹入其自身系统之内，而对变幻不定之经验的适应和调整，就只好留给假自我来进行。这一假自我系统看起来是有可塑性的：它能与不同的人打交道，能适应环境的变化。然而，自我却跟不上现实世界的变化。它那幻想的关系世界中的客体，虽然沿着理想化的方向得到了修正，但仍然保持原来基本的形象，甚至变得更为有害。在它那里，没有要用现实对这些

幻象（心象）加以检查、检验和纠正的想法，事实上没有机会这样做。现在，个体的自我没有作任何努力去作用于现实，去导致现实的变化。

在自我及其心象经受上述修正的同时，假自我系统则经历着相应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回顾原来的情况，它是用下述公式加以表达的：

$$\text{自我} \Rightarrow (\text{身体} - \text{世界})$$

身体是假自我系统的水平线。然而，这个系统却有被个体抽象化的倾向，它扩张到了独立的身体活动之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个体“存在”中所有的有关方面，这些方面被内“自我”认为不是个体自我的表达而加以遗弃。这样，就像詹姆斯的情况所示，自我越来越退缩进排外的幻想关系之中，越来越“脱离”，越来越不参与，只是观望着假自我系统与他人的活动；而与此同时，假自我系统却越来越蚕食进来，越来越深地侵入个体的存在，直至看起来一切都将归于这一系统为止。詹姆斯最后几乎不能通过视、听、接触去感知客体，特别是，不能做他未感知的、“不是他自己”的任何事情。前面我们已经举过一些例子，但实际上的事例不知还要多多少倍，因为他在家里、工作上以及朋友中间都以这种方

一个人存在中的分裂与其各种感觉形式之间的关系，至今仍受到极不恰当的理解。——原注

式行动。就假自我系统的性质而言，这种存在方式可概括如下：

1. 假自我系统越来越扩张。
2. 越来越自主。
3. 被各种强迫性的行为所“折磨”。
4. 属于它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僵死、不真、虚谬、机械。

自我与身体的分离以及身体与他人的密切联系，把自我自己推向精神病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身体被要求不仅仅是要顺从和安抚他人，而且要为他人所实际拥有。个体开始感到，不仅他的知觉是虚谬的（由于他始终用他人的眼光来观察事物），而且这些知觉还玩弄了他，因为，他感到人们也正通过他的眼光来看世界。

詹姆斯差不多已进入了这种状态。他已经感到，他“头脑”里的思想——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不真是他的。他的大部分智力活动都是企图把握自己的思想，把他的思想和感觉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例如，他妻子在夜里常常给他送去一杯牛奶。对于这种情况，他常常不假思索地微笑着说：“谢谢！”但他随即会突然反感地想到，妻子所作的只是机械行为，而他的反应也是“社会机器”式的反应。他想要牛奶吗？他想微笑吗？他想说“谢谢”吗？不。然而，他却不假思索地做了这一切。

在詹姆斯这样的状态中，个体的处境是极为严重的。他

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真和僵死。虽然真实和生命的可能性并未丧失，但它们可能不再被直接感受或体验到。他人拥有真实和生命。真实和生命或许存在于大自然（更具体地说是大自然母亲体内），或者它们能以某些确定的经验形式予以把握，通过理智的约束和控制重新获取。然而，自我充满了对丰富的、生机勃勃的、饱满的生命之厌恨；这生命无时无刻不在，但始终在彼而绝非在此。而自我，如我们所说，是虚空的、枯竭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自我称为口欲的自我，它是虚空的，它渴望被填满，可又畏惧被填满。就其口欲性而言，它又从不能由喝、喂、吃、嚼、吞咽等等得到满足。它不能与任何对象合作。它是一口无底深井，是一只无法填满的大胃。在一个浸透了欲望的世界上，它无法遏制吞咽的需求。假如自我有可能将世界像食物一样摄入并加以破坏的话，自我本可能产生罪感。然而，实际上自我不可能出于建设性目的产生罪感。自我竭力想把世界碎为齑粉，却并不想从中汲取任何营养。它的厌恨将客体贬为无物，不用消化。因而，虽然这“自我”是孤寂的，并且极度妒羨着它想象是寓于他人的善（生命、真实等等），但它必然是破坏这善而不是汲取它。对于这样的自我来说，“获取”生命和真实而又不毁灭自己，已成了一个问题。然而此时，对现实的破坏和对现实的偷偷摸摸的需要却以一种基本上是巫术性的程序在进行。对现实的这种偷偷摸摸的需要包括以下几种巫术性的方法：

1. 触摸、接触；
2. 袭用、模仿；
3. 巫术性的偷取。

当个体能对他人身上的真实产生直接印象时，他甚至还能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这种偷偷摸摸的需要有了保障（这些方法将在萝丝个案中得到说明，参见边码第 150 页）。

个体想要体验各种真实的、有生命力的感觉，为此他将付出进一步的努力，那就是：把自己投入强烈的痛苦和恐惧。一位精神分裂的女人习惯用燃着的香烟揪按自己的手背，用拇指使劲挤压自己的眼球，慢慢地撕扯自己的头发，等等。对此她解释说，她之所以这样做，是想体验“真实的”东西。极为重要的是，这位患者并非是在追求受虐狂性质的快感，也不是麻木。她的感觉系统正常。她能感觉各种事物，就是不能感受生动的、真实的存在状态。明可夫斯基也报道过，他的一位患者也出于相似的原因而点燃自己的衣着。冷漠型的精神分裂性个体会“追求刺激”，追求极度的紧张、激动和恐怖，投身于极度的危险，以便像一位患者所说的那样，“把生命刻进自己内部”。荷尔德林写道：“哦^{多尔}，上苍的女儿，自天父的花园向我显现，如果^{多尔}不能许诺尘世的幸福，那就许诺惊吓吧，用别的什么来惊吓我心。”然而，这样一些希望是难以实现的。正如詹姆斯所说，也几乎像卡夫卡的恳求者所说：“现实离我而去。我接触的一切，我思考的一切，我认识的一切，都在我走近时变得虚幻不真……”

随着与他人的脱离，我-你共处(me-and-you-together)之

荷尔德林 (1770—1843): 德国著名抒情诗人，生前很少得到赏识，死后被遗忘，直到 20 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获得世界性声誉。1798 年后精神分裂直至逝世。——译 注

感和我们之感 (we-ness) 也将随之丧失。在这种进行性的丧失过程中，女人会变得比男人更为冷漠，更为疏离，更为危险。突破宾斯万格 (1942 年) 所谓“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之二重模式的最后希望，或许能通过同性恋而达到，或者通过与孩子或动物之间长期持续的爱之纽带而达到。博斯描述了一位男性同性恋，他的世界因孤独而萎缩了：

这个人甚至“头皮和心肌”都萎缩了，他越来越不能“达到”男女之爱中丰厚的生存性满足，再也不能获得“主的祝福”、“热情和欢乐”。这些东西，他只有在过去对表妹的爱情中曾得到过。后来他失去了这种纯洁的爱情。那个女子变成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遥远的、“异域的”生存；她越来越“苍白”、“虚幻”，是“不消化的食物”，最后终于完全脱离了他的世界。与此同时，他的生存也开始并越来越贫瘠起来，进行性的精神分裂症“耗尽了他的精力”，男性的各种感觉也大都“用光了”。这时，他突然生平第一次感到某种力量驱使他向同性恋“敞开自己”。他极为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成功：同性恋使他体验了至少一半程度的生存满足。获取这种满足并不需要他“尽”很大力气。在这种有限的爱的空间，几乎没有“失去自己”的危险，几乎没有“耗尽”的危险；相反，同性恋能“补充”他的生存，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博斯正确指出：

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所有的偏执狂都有同性恋倾向。我们的上述观察赋予这一思想新的内容。弗洛伊德相信，这种同性恋倾向是被迫害妄想的原因；而我们在两种现象——同性恋和被迫害妄想——中看到的不是别的，正是同一种精神分裂症萎缩之两种平行的表达形式，也即两种不同形式的企图，其目的都是想要重新获得失去了的部分人格（第 122—124 页）。

个体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中，在其中，他就像可怜的弥达斯一样，身边的一切都因为他走近而变成僵硬的金属。处于这样一种阶段，他所能面临的或许只有下列两种可能性：

1. 他可能决定不顾一切地“成为自己”；
2. 他可能企图谋杀自我的自我。

这两种可能性中无论哪一种，只要一旦实现，都可能导致精神病的发作。我们将分别予以讨论。

当假自我系统尚保持完好、尚未被来自自我的攻击所破坏，或者尚未被各种过渡性的疏离行为之积累所破坏时，个体表面上会显得完全正常。然而，在这种正常的外表下面，内部的精神病却在悄悄地发展。

个体表面上的正常与对日常生活之成功的调节和适应，在其“真”自我看来，越来越显得是可耻的和（或）可笑的

弥达斯：希腊神话中愚蠢而贪婪的国王。曾获点物成金术，但却无法节制，以至将一切包括食物都变成黄金，几乎饿死。——译注

伪装。与此同时，他的“自我”在自身幻想性的关系中，变得越来越发散，摆脱了各种相关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它们阻碍它成为外部世界中他人之间的客体。在这个世界中，个体知道，他应该接受对此时此地的承诺，以血肉之躯服从生与死的命运。因而，如果“自我”（它本已变得越来越发散而耽于幻想）现在决定要顺从逃离自身封闭性的欲望，决定要中止伪装和欺骗，决定要坦诚地、旗帜鲜明地揭明自己，那么，严重的精神病就发生了。

这样的个体，尽管外表正常，内部却越来越失常。对这一类情况，如果不作深入的考察，很难加以把握。因为，如果仅仅满足于对“客观”病史的考察甚至追溯，并不能发现任何可理解的突然打击，也找不到猝发前的明显指征。只有直接采自个体自身的关于其自我的历史，只有其假自我系统的历史而非通常的精神病史，才能对个体的精神失常加以解释。

下面两个精神病发作的例子是十分常见的。精神病医生都很熟悉，但都觉得“难以思议”，令人迷惑不解。

一位 22 岁的年轻人，在父母和朋友们看来，完全“正常”。一天他到海边度假，驾小船出海，远远漂离海岸，好几个小时之后才被人救回来。他说，他失去了上帝，他到海上去寻找上帝。这场精神病发作使他在医院里呆了许多个月。

另一位年约 50 岁的男子，从未有过任何“神经”问题，至少就他妻子所知是如此。直到精神失常那天，他仍表现出“通常的自我”。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到河边野餐。吃完东西后，他当着全家及其他野餐者和旅游

者的面脱了个精光，走进河里。到此为止也许一切还算正常。然而水及腰深时，他便往自己身上浇水，再也不上岸了。他说，他在清洗自己的罪，那就是，他从未爱过妻子和孩子们；在罪过洗清之前他不会上岸。最后，警察把他拖上岸，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这两个案例中以及其他类似案例中，精神正常（或者说看上去“正常的”表情、衣着、行为、动作和语言以及一切可观察的东西）是由假自我系统加以维持的，但在这同时，“自我”却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一个世界：它不是“自我”自己的世界，而是自我眼中的世界。

我个人十分相信，相当一部分精神病的所谓“治愈”，其实质是：患者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决定再次扮演正常。

不少人格解体（无论是否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声称，他们谋杀了自己的自我，失去了或让别人夺走了自我。

通常，人们把这样的话称为幻觉，但是，如果说它们是幻觉，那它们是包含着生存论真理的幻觉。只有在个体自我的参照系之内，它们包含的真理才能得到理解。

那些说自己犯了自杀罪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完全清楚，他并没有割开自己的喉咙，也未自沉运河；他会期望这一点对于谈话的对象也同样清楚，要不然这个对象就会被认为是傻瓜。事实上，许多这样的表达或许就是一些圈套，是患者为他眼中的蠢人和愚众编织的。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想要通过割断喉管来杀死自我，可能完全是无根据的推理，因为他的自我和喉管之间只有细微和遥远的关系，彼此很难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他的自我实际上是非身体化的。自我在

他看来或许是不朽的，或由几乎不朽的、非身体的物质所组成。他可能会把这自我称为“生命物质”或“灵魂”，或者以自己的姓名称谓之，并且感到它可能被夺去。这是施雷伯（Schreber，1955 年）著名的精神病理论的中心思想之一。

通过比较对失去“自我”的恐惧和更常见的对性无能的神症焦虑，我们能得以接近这一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性无能的个体身上，可以发现下述潜伏的幻想：个体害怕失去性功能，因而，他通过假装被阉割的样子，将性功能藏而不用，以避免被阉割，消除被阉割的危险。精神病人也采用了相同的原理作为防卫机制，只是他考虑的不是其性功能而是其自我。这是根本性的防卫机制，也是最为自相矛盾的防卫机制，没有什么巫术性的防卫机制能比此更为根本和更为荒诞。就我所知而言，它是一切精神病的基本防卫机制，虽然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此，我希望作出最具普遍性的概括：拒绝或反抗存在，以此作为维护存在的手段。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他杀死了他的“自我”，这显然是为了避免其“自我”被消灭。为了活下去，他让自己死了。

各种各样不同的因素汇集起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促使个体摆脱他的自我。自我努力想要与身体分离，反抗与身体的同一，但最终仍无法摆脱焦虑，所有为之付出的思想、感情、感觉、行动、知觉也是徒劳；它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进一步整个陷入它最初想要逃避的焦虑之中。

陷入这种状态的个体将感到极为痛苦，下面两个案例将表明这一点。

我认识萝丝时，她 23 岁。那时她对我说，她就要疯了，

事情真是如此，她怕得要死。她说，那些恐怖的记忆又回到脑海，她怎样也无法忘掉；而关于这一点，她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她说，她眼下正想通过忘掉自己而忘掉那些记忆，她现在总是只注意别人，而绝不注意自己。最初，她还感到某种安慰，索性放任自己，不加反抗，但内部总有什么东西在抵制这种倾向，迫使她作些相反的努力。但是，相反的努力越来越困难，到最后，几乎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要让她付出很大的意志。紧接着她开始感到，她再也没有意志了——她已将它用光了。不仅如此，她开始不敢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不敢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任何个人责任。与此同时，她感到再也无法为自己而活着了，为此她痛苦不堪。“我的生命在其他一切人手里，就是不在我自己手里。”她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她仅仅活着而已。她说，她感到“她”眼下已经“每况愈下”，她试图摆脱“它”，趁还来得及。然而她又感到，事情已走得太远，她“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握住自己”，而“它”则从她身边“溜走了”。她说，如果她能喜欢别人，情况就会好一些。

几天以后，她对我说了以下一番话：

这些想法越走越远，一直越过了边界。我真正的自我掉下去了——通常它就在我的喉头，而现在它掉得更远了。我正在失去自己。它掉得越来越深，每况愈下。我想告诉你事情，但又不敢。我的头脑里满是各种想法、恐惧、厌恨、妒嫉。我的头脑无法把握它们；我无法控制它们。我就在我的鼻梁后面——我是说，我的意识就在

那儿。它们裂开了我的头，这就是精神分裂症，不是吗？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些想法。我想，我上次谈出这些想法，只是为了得到治疗。哦，如果我能够喜欢和爱而不是厌恨，那该多好。我愿意喜欢人们，然而我又想恨他们。我也是在消灭我自己。

接下来几个星期，她一直这样谈下去。所谓她正在杀死自己，现在变成她相信她已经杀死了“她自己”。她几乎始终坚持认为，她真的杀死了自己，有时又说她失去了自己。当她偶尔没有感到自己已完全“失去”或“死去”的时候，她反而会感到“奇怪”、“陌生”，感到她和别的事情都不再具有真实性。她痛苦地意识到，她失去了以真实的方式体验事物的某种能力，失去了思考真实思想的能力。她同样强烈地感到别人拥有这种能力。她还描绘了她目前为“重新把握现实”而使用的各种有意无意的手段。例如，如果有人对她谈起被她分类归入“真实”的事情，她就会对自己说：“我得想想。”接着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个单词或片语，希望能由此得到一些其中所包含的真实性。她觉得医生是真实的，因而自始至终努力记住医生的姓名。她总想在别人身上制造效果，例如谈论一些她希望能使别人困窘的事儿。她觉得这事儿很容易，因为她感到她与别人的感觉相去甚远。如果别人显出困窘的迹象，她就会对自己说：她必然是真实的，因为她能够在真实的他人身上引起真实的效果。只要有人“进入她脑子里”，她就会对自己说她就是那个人。现在她觉得，既然她能够喜欢某人，那么她就应该像这个人。她常跟在人们

后面，模仿他们走路的样子，学他们说话，模仿他们的各种姿态。她在这种时候会同意别人所说的一切，也常常以此激怒了别人。然而，在这种时候，她又总是说她离真实的自我越来越远了。她希望能“接近”别人，也希望让别人接近她，可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随着绝望的加深，她反而不那么感到恐慌了，可是仍摆不脱一种顽固的畏惧。她变得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了。看到别人做各种事儿，可她却认为她“无法理解。那是一种盲目的感觉”。她相信人人都比她聪明。他们都在干聪明的活儿，可她却无法明白他们最简单的行动的意图。她没有未来，时间也停滞了。她无法前瞻，过去所有的记忆也变得凝固而僵化，挤满了头脑。显然，她正在失去的，是区分事件之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感觉——用明可夫斯基的话说是“体验”时间的感觉。

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是：萝丝越是感到她和人们无法彼此接近，越是觉得置身于她自己的世界中——“他们进不来我也出不去”，那么，她这个私人的、封闭的世界就越是从外面受到精神病的威胁。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世界就变得越是“公开”。她变得越来越猜疑他人，开始藏东西，觉得别人要偷她的东西，不时地检查手提包，清点个人财物，以便确信没让别人偷走什么。萝丝这种越来越退缩同时越来越脆弱的矛盾，由她自己给出了最清楚的表达。她认为，一方面，她正在谋害她自己；另一方面，她又害怕她的“自我”会失去或被别人偷走。她只有别人的思想，只能想别人之所谈。

萝丝又谈到自己是两个人。“有两个我。”“她总是我，我也总是她。”她听到有声音叫她去谋杀她母亲，她知道这是

“其中一个我”的声音。“这儿（她用手指着额角）全是棉花。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完全糊涂了，总是我、我、我。我无法区分我和我、我和我自己。说到我自己，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正对我发生，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就是说，尽管她害怕失去自我，但她试图“重新把握现实”的努力却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逃离自我或谋杀自我的企图，继续被她用作基本的防卫机制，事实上，它们变得更强烈了。

个体之所以要“干掉自己”，不仅是出于焦虑的压力，也出于其罪感；在这类人身上，罪感特别强烈，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压倒性的力量，常常使个体走投无路。

前面已经看到，沉重的罪感使彼得成为无物，成为无人——什么也不是，谁也不是。下面我们将看到另一个例子。一位患者也走上了与彼得相类似的道路，但幸运的是，她及时挽救了自己。更确切地说，她没有让自己发展到精神病的状态，一旦进入那种状态就很难恢复了。

这位患者名叫玛丽 (Marie)，20岁。在大学里念书的第一学年一直未能通过任何一门考试。她总是在考试之前或之后几天来到考场，不是太早就是太晚。如果偶尔赶上考试，她也不耐烦答题。第二学年，她索性连课也不上了，别的事儿也不干了。很难找出其中的具体原因。有人建议她来找我咨询。我安排她两周见一次面。然而，无法知道她将于何时到达。说她不准时，还算是为她开脱了。她完全不遵守约定。谈话时间实际上安排得很松散随便，以便尽可能将就她。本来安排在周四下午的谈话，她可能要到周六上午才来参加；或

者，她可能在下午5点打来电话，说她刚起床，因而无法参加安排在4点的谈话，不过，如果她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是否还来得及？等等。她不打招呼就放弃了5次谈话。有6次准时到达，也未作任何解释。每次都接着上次中断的地方继续下去。

玛丽苍白、瘦弱，面带倦容，头发也不梳，披散在肩头。她的装束没有定准，含糊而怪异。关于她自己，她表现得十分闪烁和隐秘。她跟许多人都有着一般性的接触，就我所知而言，其中没有一人知道她的生活方式。她家住伦敦郊外，自从上大学后，她即在城内寄宿，并老是搬迁。父母从不知道她的地址，她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让父母来看她；跟他们打招呼的方式，就好像偶然认识的熟人，而事实上，她是家中的独女。她走路轻快，几乎是踮着脚尖。她讲话柔和而独特，但是散漫、离题、平静而做作，没有生命力。她不喜欢谈论自己，但对政治、经济一类话题却有兴趣。她对我显然冷淡。她通常明确向我表示，在她眼里我不过是无数熟人之一，不过是一次谈话的对象。然而有一次她又说我很有趣，只是我生性恶毒而污浊。她从不暴露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的欲望或期望，而对于她的确感到从我这儿得到了什么，也绝不会很清楚。当她发现自己对我很冷淡时，感到很奇怪，因为，为了见到我，她常常是不辞长途。

总之，这位姑娘的种种表现，与临床精神病学关于早发性痴呆或单纯型精神分裂症的典型描绘相符，她似乎是很难治愈的了。

然而，有一天她却按时到来，举止言行都有着惊人的变

化。就我所知而言，她这是第一次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衣着举止都不再那么奇怪，不再让人总觉得不对头；动作和表达都明显有了生命力。谈话一开始她就说，她认识到自己过去割断了与别人的真实关系，这种生活方式使她感到害怕；与此同时她也明白了，这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显然，这意味着什么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据她自己所说（我看不出理由对此表示怀疑），是看一部电影导致了这场变化。有一个礼拜，她每天都去看一部意大利影片《斯特拉达》，该片描写一位男子和一位姑娘。这位健壮的男子是一个巡回剧团的演员，总是从一座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扮演他的角色，包括突然鼓起胸膛挣断锁链这样的动作。他向一位姑娘的父母要求，让她做他的助手。这个男人强壮、冷酷、下流、恶毒，他把姑娘也当作下流货色看待，随意强奸、毒打、抛弃，毫无良心和自责；他不把姑娘当人，即便后者尽力让他满足，对他表示忠诚，他也毫不感激。他明确表示，她做的这一切并不比别人做的更好，也不可能做得更好。因而，姑娘看不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她的一切都被这个男人拿走了，但在他眼里她却没有任何价值。她又悲伤又孤单，虽未被痛苦所压倒，但却因没有意义而绝望。她跟马戏团里一位走钢索的演员交上了朋友，向他诉说她的苦恼。然而当他叫她一起逃走时，她却拒绝了，她说：如果她离开了，就没人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了，他又该怎么办呢？走钢索的演员捡起一块石头说：他不敢相信她竟是如此毫无用处，她至少应该跟这块石头一样，因为这块石头至少还存在着。他还指出：既然她知道自己是那个男人唯一不从身边赶走的人，那么就凭这一点，她也应该看到

自己是有用的。这位姑娘单纯透明，一点不懂狡诈和欺骗，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内心的感情。当那公牛般的男人就在她眼皮底下杀害了那位走钢索的演员，并毫无忏悔之意时，她只有哭泣：“这蠢货没救了，这蠢货没救了。”此后她形同木偶，也不吃东西。那男人见她没有回转的迹象，趁她睡着时将她遗弃在风雪交加的路旁。

玛丽把自己认同于那位姑娘，同时也看到相反的地方。那个强壮、恶毒、冷漠、残酷的男人，正好体现了她关于她父亲（以及某种程度上关于我）的幻想。不过，最让她感到震动的是，尽管那么绝望和不幸，尽管生活是那么可怕，那姑娘却没有割断与生活的联系。她从未变成自身的破坏者，也没有扭曲自己的纯洁。那位姑娘并不特别具有宗教感。她不像玛丽，没有玛丽那种对在（她可能称之为上帝）的信仰；她的信仰是一种无名的信仰。然而，尽管如此，她的生活方式不管怎样总是对生命的肯定而非否定。就在这位姑娘的生活方式和玛丽自己的生活方式之间，玛丽看到了令她震动的对比。她感到，她一直在阻碍自己走向造物的勃勃生机和宽怀大度。即便电影里那位悲惨的姑娘，也还能让剧团里的小丑逗得大笑不止，因为一位走钢索的演员而激动不已；也还能从一支歌里找到慰藉，至少像一枚卵石一样有她自己的价值。

从“客观的”、临床精神病学的观点看来，玛丽的变化意味着进行性的或许是器质性的精神分裂症恶化过程的中断。然而，从生存论精神病学的观点看来，玛丽的变化意味着：她中止了谋杀自己的行为。她看到，她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有系统的企图，其目的就是要破坏她自己的身分，使自己变

得什么人也不是，变成无人。本来，通过某些事情，她可以让自己被确定为特定的、具体的人，通过特定的工作与他人发生联系，可是，她却避开了所有这些事情。她试图让自己的行动没有任何真实的结果，以使自己相信，它们并非真实的行动。我们普通人都是特定的人，我们都通常通过特定的行动来达到现实的目的，并因而在行动中找到越来越确定的位置；她却不是这样，而是试图把自己贬低为无限消失的点，其手段则是：绝不做任何特定的事情——绝不让别人看到她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与特定的人一道，做特定的事情。事实上她跟我们普通人一样，自始至终都是特定时空中的人。但她总想把自己抽象化，让自己“事实上又在别处”，以此逃避特定时空的含义。她行动的方式就好像有可能不“把自己置身于”行动中。把自己与自己的行动相分离这样的做法影响到她的一切行为，包括她要干的工作、她希望缔结的友谊，以及她的一切姿势和表情。她试图由此成为无人，什么人也不是。可见，她与彼得的状况十分相似。两位患者都同样感到越来越相信，对于他们来说，成为某人是虚伪，成为无人是坦诚，因为无人正是他们“真正”感到自己之所是。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但对于“客观的”、临床的精神病学家而言，它只是恶性发展的单纯型精神分裂症。

彼得和玛丽的案例表明，处于这种状态的个体，如果说他们有罪感的话，那么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喜欢或承诺的特定思想或行动。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罪感被另一种范围更广的一蹶糊涂之感和无价值感取而代之，正是后者打击了他们特定存在的权利，打击了他们成为什么的权利。个体感到敢

于成为什么之罪，相应地也感到未能成为什么之罪，以及过分害怕成为什么之罪；个体还感到企图谋杀自己——如果不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也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之罪。这些罪感是强大的因素，阻碍个体积极地参与生活，让“自我”陷于孤独状态，并迫使“自我”进一步退缩。可以说，罪感一直附着于个体的防卫机制之上，而这一防卫机制最初也是由罪感促发的。

例如，詹姆斯曾做过一个梦，他用手比划着描述了这个梦境：

“两个原子沿平行轨道运动，接着又原路返回，停下来的时候几乎相撞。”他恐惧不已，带着可怕的不祥之感从梦中醒来。

詹姆斯对这个梦的解释是：那两个原子正是他自己，它们没有沿“自然轨道”继续运动，而是“返回自身”，因此“触犯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这个梦的进一步的含义是：詹姆斯对于他与自己的“返回自身”式的关系有着深深的罪感，因为这种关系意味着：

1. 手淫，换句话说，浪费自己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2. 从实际的异性恋关系向后倒退，在自身存在的两部分之间建立关系，其中一部分代表男性，另一部分代表别的女性。
3. 从与其他男性的关系中向后倒退，在自身内部建立与自身的排他性的同性恋关系。

这就说明了更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在所论的情况中,自我与它自己的关系是一种罪感的关系,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自我在自身内部(或试图在自身内部)形成一种关系,“就事物的自然秩序而言”,这种关系只能存在于两个人之间,而不可能通过排他性的自我得以实现。

自我的分裂(萝丝的“两个我”、詹姆斯的两个原子,等等)为一种幻觉提供了基础。分裂后的一部分自我通常似乎保留了“我”的感觉,而余下的“自我”则会被称为“她”。但是,这个“她”却仍然是“我”。萝丝说:“她是我,我是她,始终如此。”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告诉我:“她是一个在寻找着我的我。”〔在严重的精神分裂状态中,自我似乎会碎裂为几个部分,每部分都有自己的内核,都包含某种确定的“我”感(I-xence),而且都把其他部分感知为部分的非我〕属于“别的”自我的某一“思想”容易具有某种性质的知觉,这是因为,在感知着“别的”自我的那个自我看来,这一“思想”既不属于它,也非它之幻想的产物。这就是说,别的自我是幻觉的基础。更具体地说,自我解体后,每一保存有残留的“我”感的自我内核都可形成一个自我断片;而幻觉,则是所谓“别的”自我断片的一种“宛如”知觉。在症状明显的精神病患者身上,这一点变得更为明显。不仅如此,这种自我-自我关系还为患者内心各种好斗幻象之间的激烈冲突提供了内部环境,这被体验为幻象的凝固或具体化(见下一章)。事实是,正是来自这样一些内心幻象的这些冲突和相互攻击,使得个体声称他被谋杀了,或者说“他”谋杀了他的“自我”。然而,即使用“精神分裂症性言语”来说,虽然一

个人可以割开自己的喉咙，事实上却始终不可能谋杀其内在的幻象“自我”。鬼魂是杀不死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内在的幻象“自我”之位置和功能几乎完全被一些原始形态的代理者“取而代之”。这些代理者看起来处于完全的控制之下，同时也支配着个体之存在的所有方面。因而，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要与个体的原始“自我”保持接触，并且必须要相信这一“自我”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实在性的话；并且必须相信可以帮助它回到具有可行性的生活中去。然而，只有对精神病的过程和现象加以进一步的研究，才有可能承担和圆满完成这一任务。下一章我们就将进行这一工作。

第十章 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和假自我

在本章中，我们将以一位美国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后的描述为主要材料来进一步展开我们的讨论。这一病案是由两位美国作者海沃德和泰勒 (Hayward and Taylor, 1956 年) 报道的，他们中的一位还参加了对该患者的治疗过程。他们写道：

琼 (Joan) 是一位 26 岁的白人女子。第一次发病时间为 1947 年，当时她 17 岁。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她在 4 家私人诊所接受了大量的心理治疗，包括 34 次电休克和 6 次胰岛素治疗。此间发生了 50 次昏迷。然而她几乎——如果不是完全——没有显出任何好转的迹象。最后，她到作为笔者之一的海沃德处就诊，此时其病情已显得难以逆转了。

在海沃德着手治疗时，琼的精神状态是冷漠、退缩、孤僻、猜疑；视、听幻觉都很活跃。她不配合治疗，常常进入木僵状态，以至难以从她身上引出任何反应。如果向她强调治疗的重要性，她就会闷闷不乐，拒不听从；

或生气地表示她希望一个人呆着。她曾 3 次企图用碎玻璃或过量的镇静剂自杀；很多时候变得暴怒好斗，以至被关进隔离室。

我引用这上述材料是出于以下几个理由。首先，后面将看到，琼对其精神病的描述似乎为本书的看法提供了惊人的证明。不仅如此，本书的初稿是在上述材料出版之前写成的，这一事实使得上述证明得到了强化。其次，两位美国作者使用的是经典的精神分析术语——自我、超我、本我（ego, superego, id）等等，在我看来，这就限制了对上述材料的理解。而琼自己的描述看来基本是用自己的眼光打量自己，并未受两位作者之看法的左右或暗示。这样，就此病案而言，就避免了可能的材料上的错误。这种错误曾在我的一位患者身上出现过，她对自己的描述，只是对我的理论的模仿而已。

最后，就我所知而言，琼对自身作了清晰的、有洞察力的描述和说明，她使用的是“普通”语言。我希望这将表明，如果我们用精神病患者自己的观点来打量其反常行为，这种行为就将大都是可理解的了。

现在让我把本书已表明观点简要归纳如下：

自我与身体的分离意味着难以承受的痛苦，使得个体强烈渴望别人帮助他补救这种分离。然而，这种分离也被用作基本的防卫手段。这一点决定了根本的难题之所在。自我希望与身体相结合，但是，自我又总是害怕进入身体，因为它害怕由此而可能遭受的各种攻击，以及各种无法逃避的危险。与此同时自我还发现，虽然它置身于身体之外，却无法支撑

它希望自己在這個位置上所應支撐的東西。我們已經描述過所發生的有關情況：

1 .其定向力屬原始口欲型，關注的事情是如何維持自身活力，然而卻害怕被別的事物“攝入”。它將因焦渴而枯竭，並變得荒敗、孤寂、淒涼。

2 .它變得對別人那儿的一切充滿了厭恨。無論是否破壞那儿的一切，它所能作的似乎只能是破壞它自己。

3 .謀殺自我的企圖可能是有意識的。這一方面是防衛性的（“如果我自己死了，就不可能再被殺死”）；另一方面是希望認可那壓倒性的罪感，這種罪感使個體深受壓迫（感覺不到活着的權利）。

4 .“內”自我自己分裂了，喪失了其統一性和完整性。

5 .它喪失了自身的真實性，喪失了接近外界真實性的途徑。

6 .(1) 自我的安全空間變成了一座牢獄，它幻想的天國變成了地獄。(2) 它甚至不再有安全的藏身之地。它的藏身之地變成了刑訊室。在這刑訊室里，為自我遭到其自身分裂後的凝固部分的殘酷迫害，或者遭到自身那些變得無法控制的幻象的殘酷迫害。

如果我們記住，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存在中，有着從精神分裂性狀態中遺留下來的基本的分裂，那麼，患者言行中相當數量的不可理解性就會變得可理解了。個體的存在分裂

为二，产生了一个非身体化的自我和一个身体。在自我眼里，这身体是一件东西，自我常常把身体看作这世界上的另一样东西。整个身体以及众多的“精神”过程都与自我相分离，转而在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幻想和观察）内运行，或者表现出全面的功能停滞（僵死、被谋杀、被偷窃）。当然，这只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回顾，不可避免会有着过度简化的缺陷。

一旦出现分裂，就可能无法再维持正常的经验，并有可能由此导向精神病。本书前面已描述了这一发展趋势的某些形式。

在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自我-身体之分裂尚能保持在某个基本的水平上。然而，当“中心”无法再把握时，无论自我-经验还是身体-经验都无法再保持其统一性、完整性、连贯性，或无法保持其生命力。个体会突然陷入一种状态——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状态之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所谓“混乱的非在”（chaotic nonentity）。这样一种全面性解体的最终形式是一种假定的状态，没有适当的语言可以描述。然而，我们仍然感到有理由假定这样一种状态的存在。就这种状态之最极端的形式而言，它与生活可能是不相容的。完全崩溃型的、紧张型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是这样的个

在文学作品中，我在W·布莱克的《预言书》中找到了关于这一状态的最好的描绘。在古希腊以及但丁对于地狱的描述中，幽灵或鬼魂虽然远离生活，但仍保持着内在的连贯性。在布莱克那里，情况就不同了。他笔下的人物自身即经受着分裂。布莱克的这些著作需要深入的研究。当然，其目的不是要阐明“布氏心理疗法”，而是要学习他在保持精神健全的前提下，以真切的方式所了解到的东西。——原注

体，在他身上，上述过程已经发展到最极端的程度，使得他只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保持着生命状态。

阻碍我们了解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最大障碍之一，正是患者之极端的不可理解性：在所有我们所能知觉之处，他都表现出怪癖的、不可思议的、含糊不清的行为。这有多种原因。患者之焦虑和经验的结构与通常情况大为不同，因而，即便他尽力想通过直接明白的方式让我们理解他表达的内容，我们也必然很难跟上。不仅如此，患者语言的语法要素本身就是以非正常的方式加以安排的，至少就某种范围而言；这正是患者经验中的两种倾向在语言中的反映：在我们认为应该连贯的地方却出现了分裂，而在我们分而论之的地方却混为一谈。

实际上，至少在与患者初次接触的过程中，上述难以简化的困难还得到了增强，因为此时患者竭力要将事情弄得含混不清、复杂不堪，以作为掩藏自己的烟幕。这就导致了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常假装精神病，或假装要成为精神病。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装假和装糊涂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使用的手段。在具体病案中，这种手段可能瞄准了不止一个目的。其中最明显的目的是，它使得自我的秘密和隐私不至于受到侵害（如吞没、爆聚）。正如一位患者所说：即便是在一场普通的交谈中，自我也感觉到被碎裂和被宰割的痛苦。为了自己的“真自我”，患者渴望被爱，尽管如此，他仍然恐惧被爱。任何形式的理解都威胁着他的整个防卫系统。他的外部行为就是他的防卫系统，这座防卫系统有着数不清的出口通向地道。很容易认为，这些

地道会将人引向内部的要塞，可实际上它们却不能把人引向任何地方，或者只能把人引入歧途。患者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讯问和检查，不会随便向一个人表露自己。当自我不为人所知，那么它就是安全的，就能逃避洞察内心的注视，就能避免为爱所窒息和吞没，也能免除因厌恨而导致的破坏或毁灭。只要是在陌生人中间，患者就可以让他的身体任你摆布——控制、操纵、爱抚、逗弄、打、注射，怎么都行；而“他”作为一位旁观者，却是不可侵犯的。

在这同时，自我却渴望被理解。实际上，个体渴望有一个完整的人来接受他的整个存在，同时却又“让他自由自在”。要接近这样的患者，必须十分小心谨慎，正如宾斯万格所说：“别太近，也别太快。”

琼说：“我们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说和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不重要的。然而，我们在其中混进重要的东西，看医生是否很仔细，能够看出它们，感觉出它们。”

把重要的东西掺混进“一大堆不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技巧。我的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通过一个实例，向我解释了这种技巧的随机运用。他在与一位精神病医生初次见面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轻蔑感。他非常害怕表露这种轻蔑感，因为他担心一旦表露，就会被送去做脑白质切断术；可他又禁不住想要表达。与此同时，两人之间能对话在进行，他越来越感到对话十分虚假，毫无意义，因为他只是以假面具出现在医生面前，而对方却极为严肃地信以为真。他想，这人越来

越像个蠢货。对方问他是否听到说话的声音。他想，这问题真蠢，因为他只听到对方的声音。他回答听见了；接着又回答是男子的声音。接下来的问题是：“那声音对你说什么？”他应声回答：“你是一个蠢货。”这样，用装疯这种办法，他终于得以表达了对对方的看法，并且没有受到惩罚。

相当一部分精神分裂症只限于胡言乱语、分散注意力的语言，以及无休无止地阻挠扰乱，其目的是要使他人感到厌烦、无趣，以此摆脱被患者认为是有危险的人。患者常常对自己和医生干些荒唐的蠢事。他是想通过装疯尽量避免表达连贯的思想或意图，因为他害怕连贯的思想和意图可能引出他无法承受的后果。

琼给出了别的例子：

有些医生说他能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却不会或不能提供帮助。患者们一旦看透了这样的医生，就会在他面前大笑或摆弄姿势。就一位姑娘而言，摆弄姿势有挑逗的意思，但也是想通过女人的特点尽力分散医生的注意力。患者会尽力转移和分散医生的注意。他们想逗医生高兴，也让他糊涂，以便使他无法接近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发现了真能提供帮助的人，你并不需要去分散他的注意力，而只需正常行事。如果哪位医生不仅想而且还能提供帮助，那么我是能感觉出来的。

琼的这番话为荣格的一个论断提供了惊人的证明。荣格认为，当精神分裂症患者遇上某个他觉得能够理解他的人，他

就不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了。他那些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行为原本是他的“病征”，现在却烟消云散了。

遇见你才使我感到像是远行人失落在异乡，那里没人讲他的语言。最糟糕的是，远行人甚至不知道该去何方。他茫然无措，孤单无助。那一刻，突然问，他遇见一个人能讲他的语言。现在，总算能有人分担你的苦恼，总算能有人理解你的心情是多么难受。即便这人也不知该往何处，事情也变得好多了。只要不再孤单一人，就再不会感到绝望。不管怎样，你又获得了斗争的力量和意志。

疯狂是我们的噩梦，在梦中我们呼救，但却没有回应。我们呼救，却没人听见或理解我们。我们无法逃离噩梦，除非的确有人听见我们，并帮助我们醒来。

要接近患者的心灵，要让那些破碎的片断汇聚起来，重新变得连贯，主要靠精神病医生的爱——这爱无条件地承认和接受患者的整个存在。

然而，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中，这只是一道门槛而并非终结。即便越过了这道门槛，即便表面上不再有那么突出的“病征”，但患者的存在中仍然有着顽固的分裂，患者仍然处于精神病状态。

我们已经指出，患者的自我失去了与真实性的接触，因而无法感到自己是真的或活生生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试图凭空相信自己的真实存在。患者认

为，既然能意识到自己被别人看见，那么自己至少是在那儿。患者没有能力从内心坚信自己的真实存在。琼举例说明了这一点：

当患者不能确信医生能看到自己时，就又踢又叫，打架斗殴。最令人恐怖的感觉就是：你发现医生无法看到真实的你，他自顾想自己的问题，不能理解你的感觉。要是这样，我会觉得自己是隐形人，或者完全不存在。于是我会大喊大叫，看医生是仍只顾想问题呢，还是作出反应。

在她的整个叙述中，这位患者不断把自己的真我与一个痛苦而不满的假自我对立起来。下面这段文字生动地表明了她的“真自我”与她的身体的分裂：

如果你实际上只能对我施加压力，那么一切都会给毁了。我会认为你只对我动物性的身体有兴趣，却并不真正关心我身上作为人的部分，这意味着，在我尚不是一个人并正需要大量的帮助让我成长为一个时，你却把我当成一个女人来使用。你只看到我的身体，而看不到真实的我，这真实的我还只是一个小姑娘。这真实的我会从一旁看着你对我身体的所作所为。你似乎很满意让真实的我死去。面对一位姑娘，如果你向她给予，那么你就让她感觉到：她的身体和自我都有人需要。这就帮助她重新融为了一体。相反，如果你向她施加压力，她

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是分离的、僵死的。人们总是威逼僵死的身体，可他们从不给予。

为了达到名副其实的完整的状态，不得不以她的“真自我”为出发点。然而，由于那些具有威胁性的危险，这“真自我”又并非是立即可接近的：

交谈是我唯一感到安全的场合。在交谈中，我可以把我的感受都表达出来，看它们真是什么样子，而不用担心你会受到惊扰，离我而去。我希望你像块巨石，任我推搡，你却纹丝不动，仍在我身边。你能容我不安分，使我感到安全，因为跟别人一道时，我总要尽力改变自己去取悦他们。

然而由于那“真自我”又是充满了厌恨和破坏性的潜在力量，因而，所有进入“真自我”的东西都将无法存留：

恨首先产生了。患者恨医生，因为他把伤口又打开了；患者也恨自己允许医生那样做。患者相信，这将导致更多的伤害。他真想死或者藏身到一个地方，没有什么能触及到他，也没有什么能把他拖出来。

医生不得不足够小心谨慎地与患者打交道，直至他产生敌意。在敌意中，你不会像在爱中那样受到那么多伤害，而你还能再次保持生气勃勃，不老是冷漠和僵死。别人对你来说又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了。

医生必须跟在患者后面，直至他产生敌意。舍此别无他路。然而，绝对不能让患者因自己的敌意而产生罪感。医生必须坚信自己有权进入患者的世界，正如父母知道自己有权进入孩子的房间，而不管孩子对此有何感受。医生必须坚信自己是对的。

患者对自己面临的难题非常害怕，因为这些难题摧毁了他。因而，对于让医生卷入这些难题，他感到巨大的罪感。他相信，医生也会像他自己一样被摧毁。鉴于此，医生不必囿于患者是否同意他卷入。医生必须强行进入；一旦进入，患者也就不再有罪感。他会觉得自己已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医生；而医生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宣称：“不管你怎么想，我进来了。”

又：

精神分裂症患者们的问题是，他们无法信任任何人。他们不能孤注一掷。医生常常不得不强行进入，而不管患者怎样反对。除非患者真的介意了或深受激怒，他并不会伤害你。一个人之所以要杀人，是因为他的确希望他人得到复活，而不仅仅是躺下死去。

爱是不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把你变成孤弱无助的小孩。患者无法感到爱是安全的，除非他完全确信医生理解他的需要，并能满足他的需要。

这就是说，患者害怕他人或他物卷入自己的世界，这种

畏惧将沿好的方向和坏的方向发展。坏的成分将破坏自我，自我转而又将破坏好的成分。

因而，自我同时既空虚又饥饿。它的整个定向是渴望摄入食物，然而又破坏食物或被食物所破坏。

有些人一生都在呕吐。你能感觉到他们可怕的饥饿，可他们却藐视你的给予。

最悲惨不过的是：你被给予那幸福地盛满爱意的乳房，可你又知道，接近这乳房会导致你对它的敌意，正如当年你对母亲的乳房一样。它使你产生巨大的罪感，因为，在你能够爱之前，你不得不也感到恨。医生必须表明他能感觉到这敌意，但他能理解它，也不会被它伤害。如果医生将被伤害，那就太可怕了。

悲惨的是，你多么需要乳汁，可同时又被因对乳房的敌视所产生的罪感所撕裂。结果，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得不同时努力进行三件事：尽力得到乳汁，尽力去死，尽力不死。

后面我们将回到这最后一句话所涉及的问题上来。而眼下，我们只能继续讨论：自我如何尽力避免任何东西进入它内部，以免它（自我和对象）遭到摧毁。

我们已经说过，自我总想成为身外一切，因为所有存在俱在彼，无物在此。

这一点最后将发展到这样的状态：患者之所是的每一样东西，都会被觉得是“非我”。患者将拒绝一切他之所是，因

为那仅仅是异己的现实之镜中的影象。患者之存在中的这种全面拒绝，使“他”、他的“真正的”自我变成一个逐渐趋于消失的点。“他”不可能是真实的、实在的；他没有实际的身分或统一性，或没有实际的人格。因而，他之所是的每一样事物，最终必然落入他的假自我系统范围之内。这一倾向将超出行动和语言，扩展到思想、念头，甚至记忆和幻想。这一假自我系统是各种偏执狂恐惧的温床，因为接下来这假自我系统很容易被看作是属于个体的异己的存在或人。事实上，假自我系统本来已扩展到包括一切事物的程度，因而被自我看作异己的现实之镜中的影象（一个对象，一种机械的东西，一架无生命的机器人）而拒绝承认。“自我”拒绝参与到假自我系统中，后者变成了被敌国侵占的领土，是由异己的、敌意的、破坏性的伪政府所控制和左右；对于自我来说，这假自我系统存在于虚空之中。然而，这虚空被封闭了，缩小下去，虽然开初或某些时候这种封闭和缩小是以一种相对温和与保护性的方式进行的。

我觉得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瓶子里面。我能感到一切都在瓶子外面，都没办法碰到我。

但这很快就变成了噩梦。瓶子变成了牢狱，把自我与一切隔离开来；同时，自我也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迫害——这迫害即便过去在其自身牢狱的限制之内也未遭受过。于是，最终的结局至少跟自我最初试图避免的那样可怕。于是：

没有温柔，没有温和，没有温暖
在这深深的洞穴。
手摸索着石壁，
道道裂缝，潜藏着黑暗。
在深穴之内
我尚能呼吸，可不时
感到可怕的窒息，
活着，但渴盼新的空气。
没有门，没有路。
我囚禁此地。
此地非我一人。
这么多人挤着我。
从岩间的细缝，
投进一线光亮。
此地黑暗如漆。
此地阴湿，空气如此陈腐。
此地人群众多而拥挤。
他们彼此用回声交谈。
影子也跟随他们，
在石壁上游移。
我不知道自己的模样，
也不知道人们的尊容。
他们践踏我，
有时只是无意，
我想，我希望。

多沉的人群。
此地越来越挤。
我畏惧。
外面更可怕。
外面人更多。
我将粉身碎骨，因为
与此地相比，我想，
外面的人群更沉。
很快，这里面的人群会如此经常
（只是无意，我想）践踏我，
此地于我没有余地，
我会变成石壁。
再变成回声和影子，
伴随此地的人们，他们
早已变成影子和回声。
我有些弱。
我畏惧。
外面也没我的余地。
那儿人更多，会把我
推回洞穴。
外面的人，不需要我。
里面的人，不需要我。
我不介意。
石壁如此粗砺僵硬。
很快，我也要变成石壁，僵硬

而僵死。是如此僵硬。

在此地，在人们脚下多么痛苦，
可他们并非有意，
仅仅出于粗心，
我想，我希望。
我很想看看自己的模样。
可我够不着那一线光亮，
它畏怯地溜进此地，而人群
挡住我，出于无意，我想，我希望。
可我又怕看见自己的模样，因为
那会让我看见自己
跟此地的人们一个模样。
我不。
我希望。

摧毁这洞穴！
让光线倾泻而入。
石壁曾磨破割裂我的四肢，
摧毁所有残忍的石壁。
扫除旧世界！
让回声和影子出去！
淹没人们的呓语！
给我甘油炸药！炸毁这洞穴！

然而，我不——现在还不。
我等待，直到从这角落挺身而出。
眼下，我开步走。
看哪，我已把你们踩在脚下，
你们，你们，你们！！
你们感到我脚踵的分量？
你们没感到被践踏的痛苦？
哈！眼下，是我践踏你们！
你们哭了？
好。

瓶子变成了洞穴，那些残忍的石壁磨破了、割裂了她的四肢，人们用回声和影子迫害她，她又反过来迫害人们。

然而，她仍然不敢抛弃洞穴，即便这洞穴里充满了恐怖。因为，只有在这洞穴里面，她才能感到自己保留了某种身分或统一性。

看哪！那儿无洞穴。
洞穴已消失。可我
何时离去？
我找不到自己。
自己在哪里？
早已失去。
冷，我只感到冷，
可与洞穴中相比，这儿更冷。

如此、如此的冷。
而人们——他们践踏我，
纵然我已不在他们中间——
但只是无意，我想。我希望。
是啊，我需要洞穴，
在那儿，我知道身在何处。
在暗中，我能探索，
感觉洞穴的石壁。而那儿的
人们也知道我在那儿，
他们践踏我，并非有意——
我想，我希望。
可外面——
何处是归宿？

用沙利文恰当而可怕的用语说，即便在最具“破坏性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中，即便到末了，要说“自我”完全失落了或被彻底摧毁了，恐怕也绝不会是正确的。仍然存在一个找不到“我”(me)的“我”(I)。这个“我”(I)并未停止生存，但它没有实体，它是非身体化了，它缺乏真实性，它没有身分或统一性，它没有“我”(me)相伴随。如果说“我”(I)缺乏身分或统一性，那么就显得自相矛盾，但事情看来确系如此。精神分裂症患者既不知道自己是谁或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另外变成了谁或变成了什么。不管怎样，如果没有那样一些自我的残屑剩片，那么，任何“我”(I)式心理治疗都是不可能的。在任何尚能谈话，或至少尚能实施某些

完整运动的患者身上，看来并无充分的理由否定这样一种残片的存在。

在琼的病案中我们还看到，她竭力想要维护的，正是她的身分或统一性。然而，她又感到既不可能、不应该，也不敢是她自己，是一个身体化的人。她的罪感、她的不完整性、她的假自我系统之性质、她用以区分自身存在与他人存在的不稳固的能力——这些主要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童年的回忆，那时他有一个爱他的妈妈，她爱他，爱他整个人，甚至爱他的大、小便。每个人都应该确信，那时母亲爱他，只是因为他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因为他能做什么。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童年，否则他会感到没有生存的权利，他会感到自己从未降生。

一旦有了这样的爱，那么无论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人始终能回顾过去，感到自己是可爱的。他能够爱自己，并且无法被摧毁。如果他无法回去，他就可能被摧毁。

只有当你本已破碎，你才有可能被摧毁。由于我儿时的自我从未被爱过，因而我本已破碎。要是你在儿时给我爱，你就给了我完整的人生。

又：

我始终要你揍我，因为我知道你绝不会喜欢我的屁

股；然而如果你揍它，那么你至少就以某种方式接受了它，因而我就可以认可它为我的一部分，就用不着为怎样摆脱它而苦恼。

发疯赋予她某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并非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对于我来说，要不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太困难了。我知道我不想成为一个史密斯（她的家姓），因为那样除了当史密斯教授的孙女，我什么都不是。我无法确信我能觉得自己是你的孩子，我无法确信自己。我唯一明确的是：我是一个“紧张症患者、偏执狂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我的病情记录上就是这样写的。这至少具有实质性，给我一种身分、一种人格。〔导致你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当我确信，你会让我感到我像你的孩子，你会用爱来关心我，变化就发生了。既然你能喜欢真实的我，那么我也能。我能让自己刚好就是我。

最近我回去看了看过去就诊的医院，有一刻，我差点就要失落到过去的感受中了。在那里，我经常被独自撇在一边。世界在身外走过，可我内心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没有人能走进那个世界，扰乱那个世界。有那么一刻，我强烈地感到想回到过去，那儿是如此安全而宁静。但当我想到我能在真实的世界中拥有爱和快乐，我立刻又讨厌那座医院。我讨厌那四堵墙壁，讨厌那被囚禁的感觉。我讨厌那记忆，在记忆中，我只能幻想，可从未

得到真正的满足。

她一直未能从内心找到自足的理由以成为自己，成为自主的人。

她无力支撑真实的自主性，因为，在她父母眼里，她只能是个整天抱怨不停的家伙。

我的医生们尽想着要让我成为“好姑娘”，他们总想要弥补我和父母之间的裂痕。他们尽力让我适应父母。这完全没有希望。他们不明白，我渴望着新的父母和新的生活。似乎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严肃地考虑我的问题。医生们看不出来：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我多么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似乎没有人认识到：如果我回到家庭中去，我就会走上老路，失去我自己。就像从远处为一个大家庭拍摄的照片，你只能看到里面有人，可就不敢确定谁是谁。我就会像这样失落在家庭中。

然而，她唯一能解脱自己的方式，只能是空洞的超越：超越到一个由幻象组成的“世界”中。即便当她着手“成为自己”之时，她最初也只敢完全模仿医生的现实。而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还是因为，尽管医生的现实（他对她的愿望）仍只是别人的现实，但这些现实对于她来说不是异己的，它们与她想要成为她自己的真实欲望相一致。

我只是因为你希望我生存而生存，也只能是你希望

看到的样子。我仅仅因为我能在你身上引起的反应而感觉到真实。如果你连我抓你都没有感觉，那我就真的没救了。

只有当你在我身上看到好的东西，我才可能是好的。只有当我通过你的眼睛看着我自己，我才能看到任何好的东西。否则，我只能把自己看作饥饿的、痛苦的家伙，每个人都讨厌他；而我也因此而讨厌自己。我的胃这么饥饿，我真想把它掏出来了事。

在这一点上，她没有真正的自主性。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罪感是怎样阻碍他成为他自己。对于他来说，争取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简单的行动，意味着把不属于他的某种东西没来由地归于他自己，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式的自大（hubris）。实际上，我们记得，普罗米修斯所受的惩罚是被铁链锁在一块岩石上，同时被一只鹰啄食内脏（“我的胃这么饥饿，我真想把它掏出来了事”）。事实上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神话：普罗米修斯部分地丧失了其独立的身分或统一性，而变得与他被缚其上的岩石融为一体。如果不追求对这个神话的完满的解释，那么岩石和鹰可以看作母亲身上的两个方面：个体被缚其上的方面（即岩石：“绝望的巨乳”），以及个体被其吞食的方面（即鹰）。内脏被啄食后又再次长出，以便再次被啄食。这内脏和鹰两者合起来，就成了正常进食周期的可怕的变体。

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喜欢某人意味着像那个人。也就是说，像一个人即等于跟那个人一样，因而即等于失去身

分。因而，患者可能觉得，爱与被爱与恨和被恨相比，更使他丧失身分的危险性。

我们已指出，在精神分裂性的人格身上，基本的分裂是自我与身体的分裂：

自我/（身体 - 世界）

这样一种分裂把个体自身的存在一分为二，其方式是：“我”感 (I-sense) 被非身体化了，而身体则变成了假自我系统的中心。

由于个体的存在被分裂为自我/身体，因此，经验的整体也被同一根分界线一分为二。

当这种分裂是根本的分裂时，或者当这种分裂伴随着进一步的自我/身体/世界纵向分裂时，身体就会占据一个特别模棱两可的位置。

经验的两个基本部分是：

此 彼

在正常情况下两者进一步区分为：

内 外
(我) (非我)

精神分裂性的裂痕通过将“我”感 (the sense of “I”) 非

身体化，干扰了正常的自我感 (sense of self)。这就可能导致此与彼、内与外交界处持续不断的混合、融合或混淆，因为身体并非始终明确地被体验为与非我相对立的我。

只有当身体能与他人相区别时，独立的、完整的个人之间的各种关联性/独立性难题才有可能开始得到正常解决。自我并不那么特别需要把自己封闭在防卫性的超越性中。个体可以像某人，而并不需要是那个人；感觉可与他人分享，而并不需要与他人的感觉混淆或融合。这样一种分享只需在此——我 (here-me) 与彼——非——我 (there-not-me) 之间确立明确的界线。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这时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内与外之交界处作出微妙和精神的区分，并鉴别出真正属于真自我的有关表达和显露。要是这样，自我就能变成真正身体化的自我。

在我开始大哭的时候，你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用手巾擦掉了我的眼泪。你不知道我多想让那些眼泪从脸上滚下。我至少有一些对外部世界的感情。要是你用舌头舔去那些眼泪，我会无比幸福，因为那样你就分享了我的感情。

琼有好几次都想死，她说，患者“的确想死，或藏进一个地方，什么也碰不着他，什么也把他抱不回来”。

在我们看来，死的欲望、非在的欲望，或许是人类身上最危险的欲望。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两种主要动机合并为一种力量，其作用是在个体身上激发一种僵死状态。人的

基本罪感首先是源于觉得自己无权生活，其次便是源于觉得自己只能过僵死的生活。另一方面，放弃生活或过僵死的生活，也是所能采取的防卫姿态中最极端的形式。这时，个体不再恐惧被真实性和生动性（无论它们来自他人，还是自己“内在的”感觉或情绪，等等）所摧毁，所吞没，所压倒，因为他已经是僵死的了。既已僵死，就不会再死，就不可能被杀死。这样，通过生活于幻想的无能状态，精神分裂症患者得以消除跟随幻想的万能而产生的焦虑。

琼，由于她不能违背父母的愿望而成为别的什么，由于父母希望她是个男孩，结果她只能是——无，什么也不是。

我希望被控制、被支配，我希望知道你想要我成为什么。在父母面前，我无法是个男孩，他们也从不清楚地表明除了希望我是男孩之外他们还想我是什么。因而，我只能是一个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只好由此走向死亡。

她对整个事情作了如下极端简洁的表述：

作为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竭力让自己僵死、阴沉、呆滞。我想母亲会喜欢我这样。她会把我像玩具娃娃一样抱着四处转悠。

我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一只瓶子里面，一切都在外面，都碰不着我。

我不得不以死来逃避死。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有

一次，一个男孩大大伤了我的感情，我想跳到地铁列车的轮下。可我没有，而只是进入了轻度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状态。这样，我就不会感觉到什么了（我想，一个人要么在情感上死去，要么就只有被情感杀死）。很好。我想我宁可干掉自己，而不愿伤害别人。

当然，本章涉及的材料还有许多不同侧面，还可用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我的努力主要集中于琼对自身“真”“假”自我之经验的本质。我希望表明，这种理解方式看来未对患者的自述强加扭曲，也未否定与这种方式不相“符合”的其他侧面。对于琼的病案，我们只需要作很少的努力加以分析重建，因为她本人已用简捷明了的语言对她的精神病作了清晰的现象学表述。当然，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位病情处于活跃期的精神病患者，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冒着被患者导入歧途的危险，突破“精神分裂症性言语”（缺陷）（schizophrenese）的阻碍，将患者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这就是我们在下一章的病案中所面对的问题。

第十一章 荒园之魂： 对一位慢性 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研究

因为，真理胜过一切怜悯……

马克西姆·高尔基

我认识朱莉亚 (Julie) 时，她 26 岁，在一家精神病院的隔离室里已经关了 9 年。在这 9 年里，她变成了一位“不可接近的、退缩性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她有幻觉，爱摆弄姿式，做各种刻板的、稀奇古怪的、不可思议的行为动作；她几乎沉默不语，即便说话，也是最为“退化的”“精神分裂症性言语”。入院以后，她被诊断为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接受了一个疗程的胰岛素治疗，未获效果；此后就再没有为让她恢复正常作出任何特别的努力。既然问题还是还给了她自己，那么毫无疑问她很快会在生理上完全“崩溃”。幸而，在护理员的看护之外，她母亲承担起了隔离室外几乎全部的日常护理。

17岁那年，她表现出一些奇怪的、让人吃惊的言行，父母于是带她去看精神病大夫。从医生的记录来看，在她与医生的谈话过程中，她的非言语性的行为并未有任何特别的不正常之处，但她所说的东西已足以据之把她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用临床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说，她患有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孤独症、虚无妄想、迫害妄想、万能妄想。她差不多有你能想象的任何想法，有世界末日感，有幻听、情感枯竭，等等。

她说，她的麻烦在于她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她竭力想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她生活中没有幸福，她竭力要寻找幸福。她觉得自己不真实，觉得自己和他人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界线。她担心自己太具破坏性，因而认为最好别碰任何事情，以免引起损害。她关于她母亲谈得很多。她说她母亲正在窒息她，她母亲不会让她活着，她母亲从来就不想要她。由于她母亲总是鼓励她多交友、跳舞、打扮等等，因而，她对她母亲的指控表面上看来是显然荒唐的。

不管怎样，朱莉亚基本的精神错乱性言语是：“有个孩子被谋害了。”关于这一点的细节，她相当含糊。她说是她弟弟（她没有弟弟）的声音告诉她这件事的。不过她也不敢断定这声音就真不是她自己的。那孩子被害时穿着她的衣服，有可能就是她自己。她无法确知她是被自己还是她母亲谋杀的，她准备报告警察。

朱莉亚 17 岁发病那年所说的多半就是上述这些内容。从她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生存真理 (existential truth)：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不真实的。我们也能明白她说她竭力想成

为一个人是什么意思，以及她感到自己如此空虚却又如此具有破坏性是意味着什么。但是在此之外应该指出，她的表达方式是“寓言式的”。我们猜想，她对她母亲的指控必然与她未能成为一个人有关，但这些指控在表面上看来是相当荒唐而不着边际的（参见后面）。不管怎样，当她说到“有个孩子被谋害了”，一般人的通感就很难跟上了。于是，她被独自留在一个无人能与之共享的世界中。

下面，我希望对这一精神病的本质作出考察。这场精神病是从 17 岁那一年发作的，因此我认为首先应对她此前的生活作出考察。

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传记

要得到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早期生活的恰当而充分的材料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想对单个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出有创见性的研究，那么，对其生活史的每一考察都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仅仅通过几次谈话所得到的“例行报告”甚或所谓动态定向生活史，也许几乎无法向一项生存论性质的分析提供必要的关键信息，但对此不可过分强调。在朱莉亚这一特殊病案中，有好几个月，我与她母亲每周见面一次，并与她父亲、大她 3 岁的姐姐（朱莉亚于此外别无兄弟姐妹）以及婶婶各有若干次谈话。然而如所周知，收集任何一种事实都无法完全不受偏见的影响。例如，塞尔斯（Searles，1958 年）（在我看来是绝对）正确地强调指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

母亲之间，存在着一些积极主动的感情。这一发现独独被大多数别的观察者所“错过了”。我并不幻想本章的研究能完全免除我未能觉察到的偏见的影响。

父母、姐姐和婶婶形成影响朱莉亚成长的人际小环境。患者在其人际小环境中的生活，是精神病临床传记的核心内容。因而，从自我意识的角度说，这种传记的眼界是有局限性的。患者的家庭只是更大的社团中的单元，而在社团水平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却没有与我们关注的问题直接相关联。这并不是说，这些因素没有深刻影响家庭的性质以及患者的本性。但是，正如细胞学家一样，作为细胞学家，他把关于亲代关系宏观组织结构的知识用于细胞现象描述，与此同时即占有了这一知识。与此相似，为了理解朱莉亚怎样变成精神病人，我们研究她的家庭关系；而在这种研究中，范围和规模较大的社会学问题，是作为非直接的相关因素引入的。因而我认为，这份门诊传记的主人公是一位苏黎士的工人阶级姑娘，还是一位林肯郡的中产阶级姑娘，或是一位得克萨斯州百万富翁的女儿，并不会导致本质的区别。处于上述这些不同社会及阶层的人们，其人际关系中会产生非常相似的人之可能性 (human possibilities)。总而言之，我所描述的，是发生于 20 世纪西方世界而不是其他世界的事情。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根本特性是什么，只知道这些特性使各种大致相似的人之可能性得以产生。然而，作为心理学家，我们绝不能忘记，如果越出我们的 20 世纪西方世界观，那么即便在同样的临床人际小环境之内，也会得出极为不同的模式。

上述简单的说明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我感到，当代

西方临床精神病学有向被我一位精神分裂症朋友称之为“社会性笨拙”发展的趋势，而苏联精神病学却在人际层面表现出相当的笨拙。尽管我相信，一份临床传记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人际环境，但是我們不应由此构造一个封闭体系，把家庭关系之外对研究有意义的相关因素排斥在一边。

回到朱莉亚的病案上来，尽管不同的交谈者对朱莉亚的生活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她的生活可分为如下三个基本阶段：

(1) 患者是好的、正常的、健康的孩子，直到她逐渐开始(2) 变坏，其言行使人极为不安，总的说来“越来越糟糕”，直到(3) 越出所能容许的界限，此时，只能认为她完全疯了。

父母一旦“知道”女儿疯了，便责怪自己未能及早认识到这一点。她母亲说：

开始我只是讨厌她对我说的可怕的事情，但随之发现她无法把握自己了……本来是个多好的姑娘啊。后来她开始胡言乱语……唉，要是我们早知道多好啊。如果我们认为她应该对自己说的东西负责，那恐怕不对吧？我知道她不会故意向我说那些可怕的事情。一方面，我责备自己；一方面，我又很高兴这只是一场病，可要是我早点带她来看医生就好了。

我们并不知道好、坏、疯的精神含义，但是现在却了解了很多。当然，一开始，正如朱莉亚的父母所回忆的，她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完全正常。她是好的、健康的、正常的。接着，她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使身边所有重要的人都一致认为很“糟糕”。不久，她就“疯了”。

关于最初这孩子的具体什么行为在父母看来是好，是坏，还是发病，上述过程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但它却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她最初的行为模式完全符合父母心目中好的标准和赞扬的标准。后来一段时间，她变“糟糕”了，变“坏”了，也就是说，她“做出了”父母最不希望在她身上看到的、也最不相信在她身上能存在的言行。眼下我们还无法说事情为什么是如此，但是，朱莉亚能做出这样的言行，这一点对于她父母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一开始，他们试图让自己相信事情没那么严重，但随着朱莉亚的触犯言行越来越多，他们又拼命加以否定。因而，当朱莉亚不再说她母亲不让她活，而是说她母亲谋害了一个孩子时，他们一定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此后一切都可原谅了。“可怜的朱莉亚病了。她自己没有责任。我怎么能有一丝这样的念头：她是故意对我说那些话呢？我一直努力让自己做她的好母亲。”后面我们还将回到这最后一句话来。

朱莉亚家庭的成员普遍认为她的病情发展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好—坏—疯。发现患者环境中的人们对患者行为的理解方式，与获得患者行为本身的历史一样重要。后面我将概括地证明这一点，但眼下我将先考察有关朱莉亚的一件重要事情，这是她父母告诉我的。

朱莉亚的父母没有隐瞒事实，也不想回避问题。总的说来，他们俩人都非常希望能为我提供帮助，因而没有蓄意保留有关事实的信息。值得注意的倒是在于，有些事实被忽略了或低估了，更确切地说，有些事实中明显的可能的含义被忽略或低估了。也许，我们最好先按他们的框架把朱莉亚生活中的有关事件归纳起来，对朱莉亚的生活作出一个简要的说明。我的说明主要是根据她母亲的话作出的。

第一阶段：正常的好孩子

朱莉亚幼时从不是个好要求的孩子。很容易就给她断了奶。从1岁零3个月撤尿布后，没有出现什么麻烦。朱莉亚从不是个“麻烦”。她总是按吩咐去做事情。

这是朱莉亚母亲的基本结论，它支持朱莉亚当时始终是个“好孩子”的看法。

然而，按照这样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孩子从来是缺乏生命力的，因为，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孩子是好要求的，是一个麻烦，并且决不会总是照吩咐去做。情况多半是，小朱莉亚绝非像她妈妈希望我相信的那样“完善”。然而极为重要的事情是，正是这个“好”，体现了X夫人关于什么是完善的孩子的理想。也许这孩子并非那么“完善”；也许她母亲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害怕我对她作什么指责。对于我来说，关键的事情看来在于：X夫人显然把孩子身上那样一些东西当作了理想的好、健康和正常，而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则表明了内在的死亡。因而，如果我们不单只考虑从家庭抽象出来的患者，而且考虑患者所属的整个家庭关系系统，那么，

重要的问题就不在于患者的父母和婶婶全都描绘了一个在生存意义上没有生命的孩子，而在于：患者的环境中没有一个成人知道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生与死的区别。相反，生存意义上的死亡状态却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让我们依次考虑朱莉亚母亲在前面所说的每一句话：

(1) 小朱莉亚从不是个好要求的孩子。她从不真为吃东西而哭喊。她从不贪婪地吮吸。她从不把奶瓶吮吸一空。她总是“嚶嚶咽咽”的。她不会一下子长胖。“她从不想要什么东西，可我觉得她从未满足过。”

照此描述看来，这孩子口欲的饥饿和贪婪从未得到表达。她没有表现出健康的、饱满的欲望本能：激动的哭喊，有力的吮吸，把奶瓶吸光，然后满意地饱足地呼呼大睡。相反，她老是亏待自己，看来很饿，但得到奶瓶时却懒懒散散地吮吸，从不满足自己。从这个婴儿自身的眼光来重建这些早期经验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在这里，我希望限制自己，只考虑她母亲在 20 年后所回忆的那些可观察的事实，并从中得出我们的结论。

正如前面指出，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侧面并非简单地在于我们得到了小朱莉亚的肖像——她虽然在生理上活着，但在生存的意义上却没有生命；最重要的侧面在于：她母亲完全没有理解实际情况，她记忆中小朱莉亚的有关行为本来是最没有生命力的，可她却始终为之感到高兴。我相信，这一点从病因学上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孩子不“为要求”而哭喊，也不吸光奶瓶，这并未引起她母亲的警觉；她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朱莉亚基本的口欲本能驱力未能得到表

达和实现；相反，她把这看作“好”的象征。

X 夫人反复强调，朱莉亚从不是个“好要求的”孩子。这并没有意味着 X 夫人本人不是一个奉献的人。事实上，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向朱莉亚“奉献了她的生命”。我们将看到，朱莉亚的姐姐小时候即是好要求的、贪心的孩子，她的母亲从未对她抱太大的希望：“我只是让她走自己的路。”总之，看来正是朱莉亚从不好要求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她母亲给予了她这么多。可朱莉亚长大后不仅没有为这一切表示感谢，反而开始指责她母亲从不想让她活着。这时，她母亲当然会感到事情非常可怕。在我看来非常可能的是，由于某种遗传因素，小朱莉亚的器质生来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不容易表现出本能的需要和本能的需要性满足（need-gratification）。然而，用最一般的话说，朱莉亚环境中所有的其他人都把这一特征当作了好的象征，对这种缺乏自我行动（self-action）的倾向表示了赞同。一方面，小朱莉亚几乎完全不能实现其本能需要的自我满足；另一方面，她母亲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两方面合起来，成为她母亲与小朱莉亚最初关系中一个正反馈因素。对于这一结合的特殊性质，我们需要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2）很容易就给她断了奶。在喂奶的过程中，婴儿首次与他人建立了积极的、生动的关系，首次主动地与他人一道生活。到断奶时，一般的婴儿可望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拥有“自己的方式”，也感觉到母亲是一个持久的榜样。在此基础上，断奶不会太困难。这时，婴儿通常会玩“断奶游戏”。例如，他会把线卷扔掉，再找回来，再扔掉，再找回来，如

此循环往复。他玩的游戏看来正好体现了断奶过程中的中心问题：对象失去了，又回来了，又失去了，等等。而且，这种游戏通常还是以他的方式进行的，使我们觉得它“很自然”，还使我们觉得他能控制游戏。在前面（边码第 115 页以下）弗洛伊德的那个病案中，小男孩握住线卷的线头把线卷扔出去；但在实际中，他却无法通过握住母亲的“围裙线头”控制母亲。而在这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如果朱莉亚在最初几个月内没有形成自主性（有了这种自主性，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拥有自己的头脑），那么毫不奇怪，她会显得很容易就被断了奶，虽然这很难说是真正意义的断奶——因为这位婴儿放弃的东西，原来却是她从未拥有过的。事实上，在朱莉亚的病案中，甚至很难说有断奶这件事。当时，各种事情都很顺当，以至她母亲后来很难回忆起具体的事情。然而，她却的确记得，她曾与患者一道玩过“扔出去”的游戏。朱莉亚的姐姐按通常的方式表演了这一游戏，唤起了她母亲的回忆，她生气地回顾说：“当时我相信，她（朱莉亚）不打算跟我一道玩这种游戏。那时她刚能爬，我把东西扔出去，她却爬过去捡回来还给我。”

几乎没有必要来评论这种角色颠倒的含义，可以说，朱莉亚为什么未能发展出真正是她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这种角色颠倒有着密切关系。

据说她很早（刚满 1 岁）就能走步，而且，如果她不能很快穿过屋子的地板走到她母亲跟前，她就会尖声叫喊。当时屋里的家具都作了调整，其原因是“朱莉亚害怕有任何家具挡在她和我之间”。她母亲认为，这表明了她女儿始终是多

么爱她。到三四岁时，如果她母亲有一会儿不在她视线之内，她“差不多就要疯了”。

这一点似乎证明了我们前面的看法——朱莉亚并没有真正断过奶，因为，在多少高于生理学的意义上说，她从未达到过能够发生断奶的阶段。由于她从未确立自主的自我存在（self being），因而，她无法着手通过在与不在的问题而达到形成独处的能力。她无法认识到，他人之生理性的在场对于她自己的生存并非必要，虽然他人的不在场可能使她的需要或欲望遭受很大的挫折。如果个体需要他人来让他成为自己，那么，这就使得他争取自主性的努力很难得到实现。换句话说，他让自己的生活卷入了一种基本的存在性不安状态。就朱莉亚而言，无论她母亲在与不在，她都不能成为她自己。她母亲记得，一直到朱莉亚近3岁时，她母亲实际上从未离开她到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外。

(3)从1岁零3个月去掉尿布后，朱莉亚没任何麻烦。在这一点上，可以指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发现早熟的身体控制能力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们怎样与他人比较。当然，患者的父母常常告诉我们，他们怎样为自己的孩子骄傲，他们表现出各种早熟的能力：爬、走、吃饭、解便、说话、不哭，等等。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父母所骄傲的东西和孩子所达到的状态之间，到底具有何种联系呢？或者说，孩子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其自身意志的表达呢？问题不在于孩子有多听话或多顽劣，而在于孩子是否感到，自己就是自己行动的源泉；或相反感到自己的行动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源于母亲，尽管表面上好像

源于他自己（例如，处于催眠状态的个体本来处于别人的控制之下，却要假装具有自主性）。有可能，此时身体会完善自身技巧，以便完成所希望它完成的一切，但真正的自我行动看来绝不会得到任何程度的确立；相反地，所有的行动都与外在指向保持了几乎完全的顺从和一致。就朱莉亚的病案而言，她的行动方式显然系她母亲培养训练所致，只是“她”不在“其中”。朱莉亚后来说她从来没有变成一个人，其含义正在于此。作为一位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朱莉亚老说自己是口“一撞一响的钟”（或“听话的乖乖”）。换句话说，她完全为别人的要求所左右。

（4）她总是按吩咐去做。关于讲真话和撒谎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有过讨论。要顺从、要听话可以有很多理由，但无法不顺从不听话却不是最好的理由。从X夫人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出，除了朱莉亚自己所谓“听话的乖乖”，这位母亲并未承认朱莉亚身上别的可能性。她向这听话的乖乖“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完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这位很乖的、听话的、干净的小姑娘，这位如此爱她母亲以至一把椅子的阻隔就会令她几乎发疯的小姑娘，被僵化成了一样“东西”，由于过分惊吓而未敢成为一个人。25年以后，这位母亲仍然否认这一点。

（5）她从不是个“麻烦”。事情现在清楚了，从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开始，朱莉亚就没有自主性。从她母亲的回忆可以判断，她从未发展形成自己的行为方式，各种本能需要从未通过身体活动得到表达和满足。

从一开始，对真实的乳房的真实的欲望的真实的满足，在

朱莉亚身上从未发生过；这一点一表现出来就得到她妈妈的认可，后来也是如此。

“她从不会多拿蛋糕。你只要说‘朱莉亚，够了’，她不会拒绝。”

前面我们曾指出，厌恨或敌意怎样可能只是通过假自我系统的顺从表达出来。朱莉亚的母亲嘉奖她的顺从，但朱莉亚却进一步发展这顺从，以至使其变得“不可能”。到10岁左右，朱莉亚每天要列一个日程表，把这一天她被告之所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她要做的事情预先记下来，然后照此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她母亲拒绝遵守这一惯例，她就会哭哭啼啼。她母亲回忆说，这时只有一顿痛打，才能使她不哭哭啼啼。再长大一些，给她的钱她也从不自己去花。即使鼓励她表白自己想要什么，鼓励她自己去买衣物，鼓励她像别的姑娘一样去交朋友，她也不会表明自己的愿望。她要她母亲给她买衣服，也没有交朋友的意图。她决不会自己作任何决定。

除了上面提到的哭哭啼啼，朱莉亚小时候还有一些其他事情使她母亲不安。约5—7岁时，她常常一面啃咬指甲，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从一开始，她就喜欢把话倒着说。到8岁时，她突然开始很能吃，持续了几个月，一直到恢复她通常随便吃点的习惯为止。

然而，她母亲把这些都简单看作过渡阶段。可是，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却得以瞥见一个具有强烈破坏性的内在世界，它竭力要表明它的欲望。但是，这欲望是短命的，很快就被约束和淹没了。

第二阶段：“糟糕的”阶段

从 15 岁开始，朱莉亚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从那么一个“好”姑娘，变得很“糟糕”。这时，她母亲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她认为朱莉亚应该尽可能跟她呆在一起，可现在她开始鼓励她多出去玩，交朋友，看电影，甚至跳舞和交男朋友。然而，患者“固执地”拒绝这一切。相反，她或者闲坐无事，或者独自逛街，从不告诉她母亲何时返回。她把屋子弄得凌乱不堪。她继续珍爱着一个玩具娃娃，而她母亲认为她早该“摆脱”这种爱好了。后面我们还将回到这个玩具娃娃上面。朱莉亚对她母亲的漫骂无休无止，可却总是集中在同一个题目，总是指控她母亲不想要她，不让她成为一个人，不让她呼吸，试图窒息她。她对母亲破口大骂，但对其他人却可以显得很可爱。

到此为止，我们只考虑了朱莉亚与其母的关系。在作更深入的讨论之前，必须对整个家庭的情况略作考虑。

近年来，引进了“具精神分裂症形成因子的”母亲（“schizo-phrenogenic” mother）这一概念。最初，人们认为这一概念中含有“政治迫害”的倾向，幸运的是，这种认识现在开始逐渐淡化了。这一概念可通过各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加以运用，但它可以由如下的术语加以规定：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成为这样一种母亲，她阻止而非促进或“强化”孩子身上可能存在的遗传决定的、与生俱来的趋向，这种趋向有利于孩子形成不同阶段之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不限于母

亲，整个家庭都可能阻止而非促进孩子形成这样的能力：参与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自我与他人共同享有的世界。

精神分裂症是这样一种可能的结果：个体希望在与他人相处中作一个完整的人，但却遭遇到异乎寻常的困难，不能跟他人一样以通感（即社会共同感觉）的方式在世界中体验自身。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一样，是“一个被给定和被建构的整体单元”（黑格尔语）；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用父母（首先是母亲）所策划的东西所组成的整体单元，是孩子用这些东西组成的整体单元。为了自己幼小的孩子，妈妈和爸爸把这个世界作了很大的简化。随着孩子能力的成长，他开始从混沌中摸索模式，把握越来越复杂之事物的独特性和内在联系，正如布伯（Buber）所说，他渐渐被引进“一个具有可行性的世界”。

然而，如果母亲或家庭的策划不适合孩子生存的要求，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孩子不得不发展形成自己具有洞察力的眼光和想象力，并以此支撑自己的生活——正如威廉·布莱克成功地所做的那样，正如兰波成功地所指出的那样（当然，他们的生活本身可能不是那么成功的）；或者，孩子只能走向疯狂。正是在与母亲之间最初的爱联系之外，婴儿开始发展形成自己的存在（being-for-itself）；而母亲一开始也正是通过这些联系向婴儿推行她所“策划”的环境。对

布伯（1878—1965）：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译注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象征主义的典范。——译注

于婴儿来说，所给的环境也许是可以设法进入的，但也可能当时刚好没有可行性。然而，不管个体头一岁的生活是多么重要，个体置身于其中（从婴儿期、童年期直到青春期）的环境也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产生巨大的作用。在婴儿期以后的各个阶段中，父亲或其他重要成人就会在孩子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与孩子的直接关系中，也通过对母亲的影响间接地体现出来。

这些考虑提醒我们，不应该只考虑具精神分裂症形成因子的母亲，还应更全面地考虑具精神分裂症形成因子的家庭。这样做至少能鼓励人们更多地着手研究作为整体的家庭环境动力学，而不是或多或少地脱离家庭动力学，仅仅对母亲、父亲、兄弟姐妹等作孤立的研究。

朱莉亚的姐姐比她大3岁，已婚，直率而决断，却不乏女性的魅力和妩媚。据她母亲讲，她从生下来就“难对付”，好要求，始终是个“麻烦”。简言之，她看来是个相当“正常的”孩子，而她母亲对她绝不太认同。可是，她们看上去却相处得很好。她姐姐认为，她母亲是个喜欢支配的人物，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她。“她为朱莉亚做各种事情，朱莉亚永远是她喜欢的对象。”很清楚，她姐姐很早就达到了完整的自主状态。如果对她姐姐的人格作较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神经症成分，可这并未妨碍她达到朱莉亚从未达到的基本的存在状态。小时，她有许多同龄朋友，都比朱莉亚大得多，朱莉亚似乎难以接近他们。她只能耽于对一位大姐姐

的幻想，那是一位“仁慈的姐姐”，是她的“世界”里不多几个重要的美好形象之一。

朱莉亚的父亲扮演了显然较重要的角色。在她母亲眼里，他是个“性动物”；而在他眼里，她母亲冷淡，缺乏热情。除必须要交谈的内容，俩人别无多话。他在其他地方得到性的满足。在与我的交谈中，他们彼此的指责很多，却很少有关于女儿受虐待的问题。事实上，正如朱莉亚的父亲所说，他没有很多可以告之的东西，因为在朱莉亚生下来之前，他就“在感情上离开了”家庭。

患者的姐姐向我讲述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对朱莉亚必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件事情她母亲或许不知道，而第二件事情她母亲不会自己告诉我。第二件事情后面再讲。第一件事情发生时，朱莉亚大约十四五岁。尽管在朱莉亚和父亲之间存在着距离，尽管父亲不那么容易接近，朱莉亚似乎还是喜欢她父亲。他偶尔带她一道散步。可有一次，她哭着回到家里。她母亲曾对我提到这件事，她相信在朱莉亚和他丈夫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可她无法知道；朱莉亚坚决不告诉她。此后，朱莉亚就不再跟她父亲打什么交道了。然而，朱莉亚却向姐姐吐露了秘密：父亲当时把她带进一个电话亭，在那里，她偷听到了他与他情人之间一场“可怕的”谈话。

X 夫人从不放过机会向两个女儿骂她的丈夫，她试图不公正地拉大女儿和丈夫之间的距离，争取她们站到自己一边。然而，姐姐保持了中立，而朱莉亚显然也绝不愿意与她母亲公开结盟反对她父亲。电话亭事件之后，她只是中止了与父

亲的来往，可从不向她母亲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而父亲，如他自己所说，已在情感上脱离了家庭。他不向两个女儿指责自己的妻子，因为他并不需要她们支持他反对她们的母亲。尽管他认为她是个没用的妻子，但他认为：“公正地说，她是个好母亲。我承认这一点。”姐姐看到了双方的问题，但竭力保持理智和平衡，不让自己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不过如果要她抉择的话，她会站在妈妈一方反对爸爸，而且站在妈妈一方反对朱莉亚。这后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从一般的观点看来，朱莉亚对她母亲的指控压根儿就是荒诞不经的，压根儿听起来就是疯话。朱莉亚老说别人要窒息她，不让她活，不让她成为一个人。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胡言乱语”对这个家庭是毫无道理的。她说她母亲不想要她，可她母亲恰好最喜欢她，为她操持一切，给予她一切。她说她母亲是在窒息她，可她母亲却在催促她成长。她说她母亲不想让她成为一个人，可她母亲却希望她交友、跳舞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夫妻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和分歧，但至少在一个方面他们却采取了相同的立场。他们双方都对患者的假自我加以肯定和赞赏，而将其余一切都加以否定和拒绝。这种同盟在朱莉亚的“糟糕”阶段可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这时朱莉亚彻底背离了父母眼中真实的人的标准，背离了那种顺从的、毫无生命的生活方式。于是他们对朱莉亚整个儿加以否定；不仅如此，对于朱莉亚针对他们所作的指责，他们竟然毫不“介意”。

在这一阶段，朱莉亚和她母亲都在垂死挣扎。处于精神病状态的朱莉亚自称为泰勒夫人。这意指什么？这意指“我

是裁缝 做的”。“我是缝制的少女；我是被别人制造、喂养、服侍和裁剪的。”这是精神病语言，倒不是因为它们可能不“真实”不“正确”，而是因为它们有着隐晦的含义，正如密码一般。如果不是患者自己来解码，这些含义常常很难被揭明。然而，即便这些精神病语言，看来也表达了难以反驳的观点。朱莉亚当时十五六岁，她用这些疯话扼要地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指责。这些“胡言乱语”是她的“糟糕”表现。在这一阶段，最有利于精神分裂症形成的因子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并非简单地只是朱莉亚对她母亲的攻击，甚至也不是她母亲的反击，而是她身边完全没有人能够或愿意从她的观点看到某种意义，无论其正确与否。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她父亲和姐姐都未能看出朱莉亚一方的合理性。正如我们治疗小组中的那位患者（参见边码第 43 页），她并非为争论本身的胜负而战，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而朱莉亚，她并非只是简单地维护其生存而战，而是竭力实现其生存。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出，一直到十五六岁，朱莉亚还几乎未能发展形成所谓的“通感能力”。家庭的通感未给予“她”生存。妈妈总是对的，只能完全正确。因而当她母亲说她很糟糕时，她觉得这是谋杀。朱莉亚任何自主性的观点总是遭到否定。她母亲随时准备接受一个顺从的、虚假的自我，随时准备去爱这个幽灵，为它奉献一切。她甚至试图要这个幽灵像人一样行动，但是她却从不承认女儿的世界中真实的不安和痛苦，不承认她的各种可能性。朱莉亚困境中生存性的真理在于：她

的各种真实的可能性被窒息了，被勒毙、被谋杀了。为了生存，为了呼吸，朱莉亚觉得她母亲必须承认自己有什么事情做错了；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女儿所说的可能是对的，是有意义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认为，朱莉亚需要人们允许她把自己某些坏的自我投射到她母亲身上，并主动地从她母亲身上取出某些好的东西，而不总是只能被给予。然而这样的想法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颠倒黑白。现实不会让步。朱莉亚不得不将生存性的真理转换为生理性的事实。她开始产生妄想。她最初是要在生存的意义上指责她母亲不让她活着，但后来她的言行多半让人觉得她母亲真是在法律的意义谋杀了一个真正的孩子。后来朱莉亚被认为是疯了，于是家庭可以不再通过谴责朱莉亚来为自己辩护，而是对她加以同情和怜悯——这对于家庭显然是一种宽慰。只有朱莉亚的父亲以严肃的方式把她看作能对自己负责的人。他从不承认女儿疯了。对于他来说，朱莉亚只是蓄意捣乱而已。

朱莉亚的父亲没有“卷入”她的游戏。在他看来，那整个儿是恶意、忘恩负义和忤逆不孝的宣泄。我们所谓的紧张型违拗症，在他看来纯粹是“胡搅蛮缠”；她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症状，在他看来只是愚蠢的报复。家庭中只有他不同情和怜悯朱莉亚。有几次，他甚至紧紧抓住朱莉亚使劲摇晃，扭她的胳膊，以便让她“停下”。

第三阶段：疯狂

朱莉亚的基本指控是：她母亲试图干掉她。在她 17 岁时，一件事情发生了，可能正是这件事情，导致了从糟糕向疯狂

的转变。

这就是朱莉亚的姐姐告诉我的第二件事情。从幼时到 17 岁，朱莉亚一直保留着一个玩具娃娃，她在自己屋里为它穿衣打扮，一道游戏，但谁也不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这是朱莉亚生活中的秘密。朱莉亚把这玩具娃娃叫做朱莉亚娃娃。她母亲越来越坚持，朱莉亚应该放弃这个娃娃了，因为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有一天，娃娃不见了。没有人知道是朱莉亚还是她妈妈扔掉的。朱莉亚指责她母亲，后者加以否定并反而认为是朱莉亚自己弄丢的。此后不久，朱莉亚即听见有声音告诉她：一个穿她衣服的小孩被她妈妈打成了肉酱。对此，她还打算去报告警察。

前面我说过，玩具娃娃是朱莉亚或她母亲扔掉的。这是因为，对于这一阶段的朱莉亚来说，她内部的“妈妈”已经成为比外部的真实的母亲更为典型的破坏者。当朱莉亚说她“妈妈”扔掉了玩具娃娃，很有可能是说“她”扔掉了玩具娃娃，也即她“内部的”母亲扔掉了玩具娃娃。不管怎样，这一行动是灾难性的，因为，朱莉亚显然十分认同于玩具娃娃。在她与玩具娃娃的游戏中，玩具娃娃是她自己，而她是玩具娃娃的妈妈。有可能，朱莉亚在游戏中越来越变成了坏妈妈，这个坏妈妈最终杀死了玩具娃娃。后面我们将看到：在朱莉亚的精神病状态中，“糟糕的”“坏”妈妈的言行在她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如果娃娃是被她实际上的母亲消灭的，如果后者承认这一点，那么事情可能不那么具有灾难性。在这一阶段，朱莉亚本已破碎不堪的正常依赖于是否可能把一些坏的、糟糕的东西转移到她实际的母亲身上。由于不可能以正

常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这就促使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

荒园孤魂

.....在某一阶段，一部过去是按整体方式装配的机器会发现自己的内部联系发生分离，变成零部件，各自具有或高或低的独立性。

诺伯特·维纳：《人之为人用》

下面的讨论不仅针对朱莉亚，也针对其他青春型-紧张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些讨论并不打算概括所有类型的慢性精神病状态。在这些精神病状态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分裂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讨论对于类偏狂精神病最不适用，这种精神病患者的的人格比朱莉亚一类患者的人格具有较大的整合性。

就朱莉亚而言，她的自我存在（self being）变得如此破碎不堪，她的生存状态最好描述为：一种僵死的生存（a death-in-life existence），逐渐向混乱的非在状态发展。

在朱莉亚的病案中，混乱或统一性的缺乏并非是绝对的。但是，如果跟她在一起呆得太久，就会产生德国精神病学家

所描述过的“早发感”(praecox feeling),也即:虽然跟另一个人在一起,但却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即便听到确有人在说话,但通过有关言行体现出来的破碎的自我却不是朱莉亚。听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我们说话,很难知道是“谁”在说话;同样,也很难知道我们是在对“谁”说话。

听朱莉亚说话,常使我感到好像是参加对一个患者进行的小组治疗。我不得不面对一大堆胡言乱语,或者各种杂乱无章的态度、感觉、冲动的表情。患者的语调、姿势、表达方式变幻莫测。一开始,我就不得不着手辨认在不同时间收集起来的言行断片,根据语调、词汇、语法和前提上的相似性将其语言归类,或根据确定的刻板姿势或表达方式找到行为之间的联系。这就好像同时面对各种不同“人格”的不同片断或不完整的元素。朱莉亚的语言就好像是由各种亚自主的子系统杂拌而成的“沙拉”,这些子系统拼命都想于同一时刻在同一张嘴里表达自己。

朱莉亚不仅谈自己,也谈第三者,这就使上述印象得到加强,尽管也几乎造成同样程度的混乱。如果要进一步讨论这一点(这一点对于精神分裂症行为的所有侧面都是如此)的

早发性痴呆这一术语,过去通常用指常见于年轻人的一种精神分裂症,一般认为其结果多为慢性精神病。我认为,这种“早发感”类似于观众对发疯后的俄菲莉亚(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译按)的反应。从医学上说,俄菲莉亚后来无疑属于精神分裂症。她疯了以后,好像就不存在了。她好像不是一个人。她的言行表现不出完整的自我。她的疯话无法理解。她已经死去,只剩下一片曾一度是人的虚空。

——原注

含义，那么首先需要对个体患者作更深入的了解。

雅内 把分裂区分为克分子和分子 两个水平。癔症分裂人格系克分子分裂，精神分裂症则包含分子分裂。在朱莉亚的病案中，看来两种分裂同时存在。她的整体存在分裂为若干“零部件”或“子系统”（亚自主“情结”、“内容体”），它们各有其小型的刻板“人格”（克分子分裂）。进一步，实际连续行为分裂为更细微的表达方式（分子分裂）。例如，甚至语言也将分裂，无法保持完整性。

因而，对于朱莉亚这一类病案，感到“棘手”并有“早发感”是很自然的。不难与朱莉亚进行某种语言交流，但是，由于她似乎未能保持完整的整体，而只是一堆亚自主的子系统集合，所以很难和“她”进行谈话。但是，绝不能在根本的意义上用机器来作类比，因为，即便这种几乎是“混乱的非在”的状态，也绝不是不可逆的。有时，她也会极大地振作起来，为摆脱困境作出感人的奋斗。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她也害怕这些为整合而斗争的时刻。在他人中间，她不得不承受强烈的焦虑；而且，解体或崩溃的过程在她的记忆中显得是如此可怕。因此，分离的、不真实的、僵死的状态就成了她的避难所。

也就是说，朱莉亚作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其特征是

雅内 (P. Janet, 1859—1947): 法国心理学家、神经病学家, 主张学院派心理学应同精神病的临床治疗相结合, 因而在法、美等国很有影响。

——译 注

此处借用化学术语。克分子代表比分子较高一级的行为单位。

——译 注

缺乏整体性，是分裂——分裂后的片断可能被称为“零部件”、情结、子系统，或“内容体”等等，不一而足。每一子系统具有其自身可辨认的特征和独特方式。从这些假定出发，朱莉亚行为的许多特征就变得可解释了。

朱莉亚的自我存在未能以整体形式组装起来，而是分裂为不同的零部件或子系统。这一事实使我们得以理解：朱莉亚身上不可能存在各种有关的功能，这些功能是实现人格整体或至少达到较高水平人格整体的前提；事实上，朱莉亚身上也的确不存在这些功能。

人格整体是反射性意识的先决条件，反射性意识是这样一种能力，使个体相对无自我意识地意识到其自我的行动。在朱莉亚身上，每一子系统都有意识对象的能力，但是，彼此分离的子系统，就可能意识不到对方身上正在进行的过程。例如，当朱莉亚与我交谈时，可以设想她身上某一子系统正在“讲话”。然而，由于朱莉亚身上看来并无完整的整体，因此“她”不能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意识到该系统正在进行的言行。

反射性意识看来是“记忆”的先决条件，由于反射性意识的缺乏，“记忆”就变成了七零八落的大杂烩。过去的所有生活好像都是同时发生的。朱莉亚整个存在中总体经验的缺乏，意味着她缺乏统一的经验作为基础去为自己的存在划定清楚的思想“边界”。不过，这样一种完整的“边界”并非完全缺乏。这样，费登的用语——自我（ego）边界，是不令人满意的。我们需要另外的用语来描述总体，费登的自我（ego）只是这总体中的一部分。我们宁可说：每一系统看来都有自己的边界。这就是说，相对于某一系统特有的意识而言，

别一系统是可能向外表现自己的。在一个完整的整体中，如果朱莉亚的存在之某一不同侧面对于其余侧面是充分“肌张力不全”的，那么，就会发生痛苦的冲突。但是就不具整体性的朱莉亚而言，她内部不可能产生这种痛苦的冲突。我们只有“从外部”才能看到，朱莉亚的存在之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子系统同时处于活跃状态。每一子系统内部看来都有着自身意识的焦点或中心——有自己有限的记忆图式、有限的知觉组织方式；有自己亚自主的驱力或分驱力；有维护自身自主性的趋向，有威胁其自主性的各种特殊危险。她会把这些不同侧面看作“他”或“她”，或把它们当作“你”来交谈。也就是说，对于自身这些侧面她没有反射性意识；相反，子系统的活动在“她”看来好像不属于“她”，而属于外部世界。换句话说，她产生了幻觉。

不把自身存在的不同侧面作为自身之所有加以接受，这是朱莉亚身上的一种倾向；与此相应，朱莉亚不能在属于她的东西与“客观上”不属于她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实际上，这只不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朱莉亚缺乏完整的存在性边界。例如，她会觉得脸上的雨水是自己的泪水。

威廉·布莱克在其描述存在之分裂状态的《预言书》中描述过这样一种倾向：变成自己所知所觉之物。在朱莉亚身上，所有的知觉似乎都有与对象客体混淆的危险。带着这种困难，她花了大量时间跟自己打交道。“那是雨。我可能是雨。”“那是椅子……那是墙。我可能是墙。姑娘做墙是多么可怕。”

所有的知觉看来都使她感到融没消失的危险；被他人所知觉，也使她感到同样的危险。这意味着，她生活在一个无

法不受折磨的世界中，并且觉得，她对别人所做的事情，正是发生在她身上使她感到害怕的事情。几乎每一知觉性的行动看来都无法摆脱自我和非自我的混淆。这种混淆的基础在于，由于朱莉亚其人的大部分侧面都部分地跑到她的“自我”之外去了，因而，朱莉亚存在中那些分裂的侧面容易与他人产生混淆。例如她的内心恶念与她母亲的混淆，以及她母亲与她的内心恶念的混淆。

这样，对于朱莉亚来说，爱是十分危险的。喜欢= 像= 一样。如果她喜欢我，就等于她像我、她是我。因而，她开始说她是妹妹、我妻子，是好新娘。我是生活，她是生活的新娘；她赋予我新的格调。她内部有生命之树。她就是生命之树。换成我们的说法：

她在思考思想 a、b、c。

我表达了与之十分相似的思想 a'、b'、c'。

因此，我偷窃了她的思想。

这种精神病的表达方式发展到极端，就是指控我把她的脑子窃为己用。

相反，如果她抄袭或模仿我的言行，哪怕她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东西“显得”是偷窃于我，那么，她就会准备接受我所加予的惩罚。当然，融没或混淆的程度因时而异。例如，偷窃这一说法预先就在自我与非自我之间划出了某种界线。

下面我们将举例说明和阐发以上各点。

最简单的例子之一是，当朱莉亚向自己提出指令并着手

执行时，她的存在便分裂为两个“零部件”。她不断通过默念、出声或幻觉的方式表现出这种行为。“她”会说：“坐下！起立！”同时“她”就会坐下和起立；或者，来自某一子系统的幻觉的声音会给出指令，而“她”作为另一子系统将按指令相应行动。

另一常见的、简单的情形是，当“她”谈论某件事情时，“她”会发出嘲讽的笑声（思想和情感的不一致）。例如，A 子系统对我说：“她是女皇。”与此同时，B 子系统便发出嘲笑。

在此过程中，许多类似于“干扰”的东西参与进来，A 子系统会述说一些相对连贯的东西，接着又变得混乱起来。于是 B 子系统便开始述说，但 A 又会突然插进来说：“她（B）偷窃了我的声音。”

在认识了解朱莉亚之后，至少就某种范围可以认为，在朱莉亚身上，各种具有连贯性的角色组成了所谓内部人格“集合”；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可以根据这一集合中的不同角色予以识别。

例如，在这集合中会有一个专横的恶棍，总是命令朱莉亚干这干那。这同一个恶棍会老是向我抱怨“这孩子”：“这孩子真讨厌，这孩子是废物，这孩子是个贱货。跟这孩子你别想干什么……”这儿，“你”可能直接指我，也可能指她的一个子系统；或者，我可能代表了、体现了这一子系统。

朱莉亚内部这一恶棍形象多数时候明显是一个“头儿”。“她”不大考虑朱莉亚。“她”不认为朱莉亚会变好，也不认为应该帮助朱莉亚变好。“她”既不站在朱莉亚一边，也不站在我一边。这一自主的子系统可以适当地称为“内部的坏

母亲”，她基本上是朱莉亚内部的一位女性迫害者。在她身上集中了朱莉亚归咎于她母亲的一切糟糕的东西。

另外两个子系统也能识别出来。其中一个在我面前充当朱莉亚的捍卫者，反对“头儿”的迫害。对于朱莉亚来说，“她”通常把朱莉亚看作她的小妹妹。从现象学上说，可以把这一子系统看作“她的好姐姐”。

我要谈到的第三个子系统是一位完善的、顺从的、善解人意的小姑娘。她看来是几年前某个系统的产物，这一系统十分接近于我所描述过的精神分裂性假自我系统。她会说：“我是个好姑娘。我按时去洗手间。”

此外还有一些大概来自“内”自我的产物，它们几乎完全被抽象成了纯粹只是可能性的东西。最后，正如我早先指出过的，还存在一些不稳定的正常阶段。在这些阶段，朱莉亚讲话的声音显示出感情上受到惊吓，几乎刚刚能听见。然而，在这些阶段，她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近乎“自身其人”在说话。

下面让我们考虑这些不同系统共同运作时的情况。我给出的例子来自她更连贯的语言：

我出生在一轮黑色的太阳之下。我不是生出来的，我是崩裂出来的，跟你知道的这种事情不一样。我不是妈妈哺育的，我是被她窒息的。她不是一位母亲。我正在选择一位母亲。停下！停下！她要杀死我了！她就要割开我的喉咙！我坏，我下贱。我让人讨厌。我是废物……

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我将对此作出解释，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是以自身其人的语言开始的，其内容仍是几年来对她母亲的指控。然而，她这一次的表述特别清晰易懂。“黑色的太阳”（sol niger）显然象征她的破坏性的母亲。那是一个不断浮现的意象。最初6句话是正常的。接着，她好像突然遭受了某种可怕的打击，这一打击大概来自她的破坏性的母亲。在某种内部人格危机中，朱莉亚崩溃了。“停下！停下！”她简短地说，并又声称：“她要杀死我了！”接下来的几句话是对自己防御性的诋毁，使用的语言跟她的坏母亲对她的指责一样：“我坏，我下贱。我让人讨厌。我是废物……”

对母亲的指控总是容易激发这样一些灾难性的反应。在后来一次对话中，朱莉亚又像往常一样指控她母亲。这时，那位坏母亲用通常的指责打断“那坏孩子”的话：“那是个坏孩子，那孩子真讨厌。那孩子是废物。”我打断这些话说：“朱莉亚害怕因为说这些东西而自己杀死自己。”我说完这话，谩骂即不再继续，但“她”非常平静地说：“是啊，是我自己的内心恶念在杀害我自己。我始终害怕我母亲，将来也是如此。你认为我能活下去吗？”这一相对完整的表述清楚地表明她的“内心恶念”和她真实母亲的混淆。她的内心恶念是对她进行迫害的坏母亲。正如前面指出，朱莉亚无法让她真实的母亲真实地接受她的需要，让朱莉亚得以将自身部分内心恶念投射到她母亲身上，这一点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形成因子之一。

如果她母亲的确承认朱莉亚的指控具有某种合理性,那么,通过对她母亲缺点的了解,朱莉亚“内心恶念”的迫害就会得到某种缓解。

这孩子不想到这儿来,你看出来没有?她是我小妹妹。这孩子不知道不该她知道的事儿。

这是朱莉亚内部的“大姐姐”在说话,要我明白朱莉亚单纯、不懂事,并因而不知道害羞和责任。与单纯无知的“小妹妹”系统相对照,“大姐姐”系统是一个十分懂事和负责的“人”,善意而懂得保护别人,但也喜欢以保护人自居。她并不站在成长中的小妹妹一边说话,而总是“为”小妹妹说话。她希望保持现状。

这孩子的脑子坏了。这孩子脑子不开窍。你想给她开窍。为这件事我决不会饶恕你。这孩子是死的又不是死的。

最后一句的含义是,如果让“这孩子”在某种意义上是死的,那么在另一种意义上她就可以不是死的。但是,如果要担起责任让她“真是”活的,那么,她就可能“真的”被杀死。

不过,这位“姐姐”也会说这样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孩子。你必须让她受欢迎.....你必须关

心照料这姑娘。我是个好姑娘。她是我小妹妹。你必须带她去洗手间。她是我小妹妹。她不懂这些事情。她不是不可救药的孩子。

这位大姐姐有经验，有知识，有责任感，有条理，与单纯、无知、不懂责任、任性的小妹妹恰成对比。在这里我们还看到，朱莉亚的精神分裂症并非简单地在于她身上没有“正常”的核心，而在于她完全缺乏整合机制。这位“大姐姐”作为朱莉亚存在中的一个成分，能够以有条理的、正常的、有分寸的方式说话，但那不是朱莉亚在说话；朱莉亚的正常，可以说是分裂了，被封闭了。朱莉亚的真正的正常并不依赖于能够通过一位“大姐姐”正常地说话，而依赖于对其自身整个存在的完整的整合。她把自己看作一个第三部分，而在大姐姐说话的当儿小妹妹又突然闯入（“我是个好姑娘”），这就使她的精神分裂症变得复杂起来。

当朱莉亚确实向我表现她自己的言行的时候，她由此表现出来的“自我”完全是精神错乱的。她那些的确是含义隐晦的、浓缩的语言，似乎大都属于她自我系统的残片。这些语言一旦被解码，就会揭示出，这一自我系统或许是幻想化的内自我的产物。在关于正常的精神分裂性阶段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描述过这种内自我。

这一自我会同时经验到幻想的万能/无能等等如此极端的悖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努力作过说明。这一自我之经验的现象学的诸特征，在朱莉亚身上看来原则上也是相似的。但是，如果想要对朱莉亚这一“自我”的经验进行现象

学的构建，那就需要先把朱莉亚的精神分裂症翻译为正常的语言。我必须再次指明，在这样的前后关系中使用“自我”一词，并不包含说：这是她的“真正的”自我。然而，这一系统中看来的确包含着一个生长点，围绕着它整合是可能发生的；而在解体中，这一点看来则是无法维系的“中心”。它看来是向心或离心倾向的原点，是朱莉亚存在中真正的疯狂之核心，是朱莉亚存在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侧面；它似乎不得不保持混乱和僵死的状态，以免朱莉亚真的被杀死。

我们将试图描述这一“自我”的本质，为此不仅要借助直接来自这一“自我”的语言，也要借助看来是来自其他系统的语言。至少就这“自我”其人本身而言，这种语言并不是很多的。在朱莉亚住院的几年中，大量的这种语言或许已压缩为不断复现的电报式短语，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

正如我们前面所见，朱莉亚说她身上有着生命之树，而这生命之树的苹果即是她的乳房。她有 10 个乳头（她的手指）。她拥有“整整一个苏格兰高地步兵旅中士兵的全部骨骼”。她想什么，就拥有什么。她想要的一切，她都拥有，同时立刻又没有。现实没有向她的任何意愿或恐惧投下影子。每一意愿瞬间便得到幻想的满足；同样，每一恐惧也在幻想中瞬息即逝。于是，她可以是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置身任何地方。“我是丽塔·海沃丝，我是琼·布隆戴尔。我是女皇。我的皇族姓氏是朱莉亚尼。”她告诉我，“她自我满足，自我占有”。然而，这自我占有是双重含义的，自有其黑暗的一面。她是一位被自身存在之幻象所“占有”的姑娘。她的自我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自由、自主性或力量。她喜欢是谁就是谁，但

正因为如此，她谁也不是。“我是众生。我在你们所有人中间。我是个非人。”（也可以说：是个修女，是个名词，是个无人称的单数）作一个修女有许多含义，其中之一与作一个新娘恰成对比。她经常视我为兄长，自称为我的新娘或“忠实的、可爱的、生气勃勃的生活”之新娘。当然，对她来说生活与我某些时候是同一东西，正因为如此，她害怕生活，或者说害怕我。生活（我）会把她砸成肉浆；生活（我）会用炽热的钢铁灼烧她的肝脏；生活（我）会砍掉她的四肢、舌头、乳房。生活被她用可能想象到的最激烈的破坏性语言表达出来。它并非我的有关性质，也不是我所拥有的某种东西（例如，男性生殖器也可看作炽热的钢铁）。它是我之所是。我即生活。虽然她体内有生命之树，但她总的说来觉得自己是生命的破坏者。因此，我们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害怕生活会摧毁她。生命通常用男性或男性生殖器形象加以象征，但是，她所希望的似乎不只是成为男性，而且还同时拥有加强了的全套两性装备，拥有苏格兰高地步兵旅士兵的全部骨骼和 10 个乳头，等等。

她生于黑色的太阳之下。

她是西方的太阳。

黑色的太阳，那是古老的、极为不祥的意象，常常独立地升起在各种文学作品的地平线上。朱莉亚 14 岁离开学校，

她读得很少，并且也不特别聪明。她几乎完全不可能涉及到这方面的材料。不过，我们不打算进一步探讨这一象征的起源，而只把她的语言看作一种表达——表达她对存在于自身世界 (being-in-her-world) 的体验。

她总是说她母亲根本不要她，她母亲以某种可怕的方式把她崩裂出来，而不是让她正常地降生。她母亲一直“想要又不想要”一个儿子。她是“西方的太阳”，换句话说，她是意外的儿子；在降生时，她母亲出于厌恨把她变成了姑娘。黑太阳的光芒烤焦了她，使她枯萎。在黑太阳下面，她无生气地生存着，像一件僵死的事物。因而：

我是大草原。

她是荒毁的城市。

在大草原上，唯一有生命的东西是野兽。老鼠占领了荒毁的城市。她的生存只能通过完全荒芜枯瘠的废墟表达出来。这种生存性的死亡，这种僵眠状态，是她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的通式。

她是荒园孤魂。

在这种死亡中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没有可能性。一切

在英文中，西方的太阳 (Occidental sun) 与意外的儿子 (accidental son) 音形俱近。——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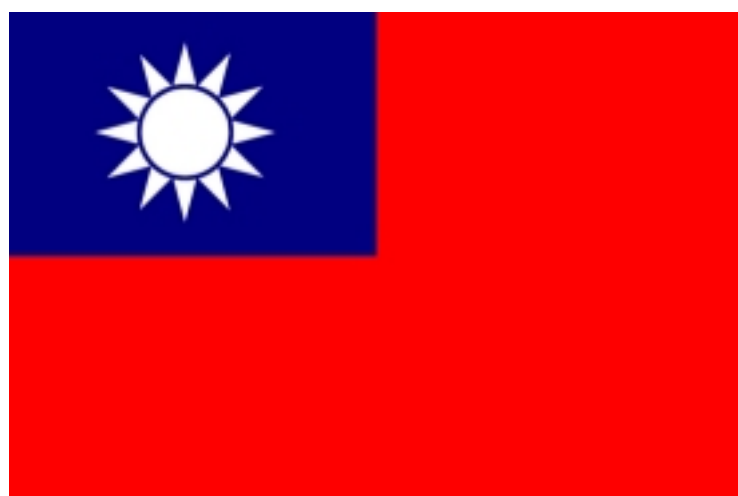
都已发生过了。没有快乐，没有可能的满足或满意，因为那个世界跟她一样空虚而僵死。

水罐破了，井也枯了。

她完全茫然无措，看不到一丝希望。她无法相信什么地方还会有爱。

她只是这世上众多姑娘中的一位姑娘。人人都假装想要她，她又不想要她。我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地活着。

然而，在更前面的地方我们看到，她在自己眼里是有价值的——哪怕这自我评价也只是一种幻想的方式。信念（不管这信念是怎样精神错乱，它还是表达了对自身内部某种巨大价值的信心）并未熄灭：什么极有价值的东西深深地失落或埋葬到她内部了，只是，她自己和别人都尚未发现。如果谁深入到黑暗的泥土深处，他就会发现“闪亮的金子”；如果谁潜进深不可测的水里，他就会发现“海底的珍珠”。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